

“捷克事件”与周恩来的“六八”讲话
狱中斗争一千日

新中国初期的禁烟禁毒运动

西花厅组织机构和人员序列情况

毛泽东、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苏关系的恶化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央档案馆

72
总第七十二辑

1999年12月出版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七十二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央档案馆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年·北京

主 编:李海文

副 主 编:杨公之
陈 夕

文献编辑:罗一恒

责任编辑:王林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资料 第72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12
ISBN 7-80136-266-7

I. 中…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IV. D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17181号

中 共 党 史 资 料 (72 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 央 档 案 馆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9723 信箱 邮编:100029

地址:北京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 10 号院(北门 10 号楼)

电话:(010)64946059 传真:(010)6496801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朝阳科普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6.875 印张 160 千字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ISBN 7-80136-266-7/K·232

定 价:10.00 元

目 录

文献资料

-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报告 (1)

回忆录

- 狱中斗争一千日 彭镜秋(6)
我在二十九军的短暂经历 刘 昭(23)
“捷克事件”与周恩来的“六八”讲话 蒋本良(36)

专题资料

- 新中国初期的禁烟禁毒运动 白云涛(45)
从清华大学的两派谈“文化大革命”
 群众组织结构、功能 唐少杰(66)
重庆“一二四”事件 何 蜀(82)
西花厅组织机构和人员序列情况 张作文(93)

人物介绍

- 毛泽东、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蒋建农(98)
中国人民之友——史沫特莱 梁海江(118)

本刊专稿

中央档案馆建馆 40 年 特约通讯员(128)

地方党史

山西“反右倾”运动..... 牛崇辉 贾玉英(139)

小资料

解放战争中南下干部的两次派遣..... 王伟红 李翠艳(149)

译文选登

中苏关系的恶化

——俄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三) 马贵凡 译(157)

信息窗

中共党史重要著作、论文目录索引(1998 年)

..... 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馆(187)

封面照片: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
和杨尚昆出席中央档案馆开馆典礼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报告

(一九五一年二月)

一、一贯道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事实

一贯道是本市数量最大的反革命组织，拥有二十万道徒，其首领都是汉奸、特务、流氓、恶霸地主之流，一贯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匪帮相勾结，进行破坏革命，残害人民的罪恶活动。

远在抗日战争初期，该道即叛国附逆，认贼作父。道首张光璧被聘为汪精卫的外交专员，在日本特务头子头山满的指挥下，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北京一贯道道长张五福为日本宪兵队的顾问，以传道为掩护，到各地为日本特务机关搜取情报。大汉奸如褚民谊、周佛海、王揖唐、胡毓坤、江朝宗等都是一贯道的上层分子。他们散布顺民思想，宣传“不抵抗主义”，麻醉人民的民族意识，成为日寇统治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之一，其组织就是在日伪政权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国民党统治时期，一贯道又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勾结。如张五福、孙鸿亮等，都是当时北平军统特务头子马汉三的情报人员；道首刘燮元、刘景泰、吕翰卿、吕善庭等都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任中心组长。从此，该道即完全变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工具，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解放以后，前华北人民政府虽曾在一九四九年一月明令取缔

道会门活动，但一贯道不但不停止作恶，反而变本加厉。各地道首纷纷潜入本市，进行秘密活动，暗中整顿组织，“化整为零”，企图长期隐蔽；并训练道徒，抗拒政府法令，妄图颠覆人民政府。该道惯于造谣，许多反动谣言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如本市解放初期，他们散布变天思想，说：“穷人富不了，有钱人穷不了，共产党胜不了，国民党败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人民欢欣鼓舞，而一贯道则造谣污蔑，说：“万邦统一势不久，满街怪物扭”。他们破坏生产，破坏土地改革，说：“分了地，将来还不都是人家的”。本市西郊挖掘长河时，他们又策动群众罢工，煽惑群众抗拒挖河修堤的紧急命令。美帝侵朝战争爆发后，该道妄图策应，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夸张美帝力量，散布亲美恐美思想，制造“割蛋”、“割乳房”的谣言，扰乱社会秩序，对群众的生活影响很大，夜间不能睡觉，白天不能生产。

一贯道除进行反革命活动外，对被诱入道的无知落后群众也极其残酷地加以剥削压迫。他们制造出“入道免灾”之类的鬼话，诱骗群众入道，甚至以各种手段胁迫群众入道。待入道后则又以“功德费”、“开荒费”、“渡仙费”、“超拔费”、“尽孝心”等名目勒索钱财，道徒因而倾家荡产者难以胜数。而那些作恶多端的道首，则把掠夺来的财物任意挥霍，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张光璧到四川去时，一次就运走黄金一万五千两。他们又以开办“仙佛研究班”等名义进行“考色”，奸污“坤三才”、“女道亲”。道首还常假借所谓“仙佛之命”，拷打道徒，不少道徒被活活打死。他们又以“圣水”、香灰给道徒“治病”，仅西郊海甸一地，因此而致死的道徒就有九人。

以上各种事实，充分说明一贯道无恶不作，罪行累累，对人民危害极大，必须严厉取缔。

二、取缔一贯道是十分必要的措施， 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

我们为保护人民利益，镇压反革命活动，维护社会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于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再度明令取缔一贯道的组织，宣布所有封建反动的道会门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两个月来，由于广大人民的积极协助，干部及人民警察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

第一、摧毁了一贯道的组织，惩办了首恶分子。共逮捕了首恶分子三百零一名，并将其中罪大恶极，怙恶不悛，解放后或登记中仍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如刘燮元、穆肇增、赵俊卿、王钟麟、安松樵、刘凤林、胡春霖、金景煦等判处了死刑。这些反动的道门头子早为群众所痛恨，若不坚决镇压，就会脱离群众，而取缔一贯道的工作也就无法贯彻。正因为这样做了，人民才满意地说“该崩”，“崩得好”，“给人民除了大害”。被骗道徒也认为政府给他们“作了主”，“出了气”，“申了冤”，有效地推动了登记和退道工作。共登记了点传师以下，三才以上分子六千零三十一名，一般道徒声明退道的十七万五千九百五十三名，封闭了大小道坛一千二百八十八个，搜出了一贯道秘密做的国民党旗、美国国旗和许多武器子弹，查获了大批反动证件、道具。并有道首六百三十人已退还或将退还道费四十余亿元，有五分之二的退道者得到了退还的道费。一贯道基本上被摧毁了。

第二、我们对被骗的道徒，进行了耐心的教育，争取与挽救了许多误入歧途的道徒。因为他们入道动机和那些反动道首截然不同，大多数是由于落后迷信或被骗、被迫参加了一贯道。许多道徒作了道首的骗人、害人的工具，或被陷害、被欺骗而不自觉。为此，

我们在各区、各街道、村庄、工矿区召开了群众会，运用了报纸、广播、戏剧、宣传队、展览会等宣传方式，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特别是在中山公园举办的一贯道罪证展览会，一月以来，观众已超过二十余万人，群众从这里可以看到一贯道勾结敌人进行反革命反人民活动的许多证据，道首所诈骗来的大量金银财宝，以及觉悟了的三才、坛主、点传师在这里现身说法，表演一贯道如何用扶乩来对道徒进行欺骗，揭发了一贯道的种种黑幕，这个展览会起着很大的教育作用。此外，经过道首的当众坦白，道徒的控诉，声明退道和清算道费，道徒们的觉悟已普遍提高，认识了一贯道的丑恶和可耻、可恨，改变了他们原先的“道正人邪”的想法，认识到一贯道真是“邪道”、“恶道”；有的道徒羞愧不已，不少受过害、受过骗的则痛哭流涕，对一贯道深恶痛绝，并敢于起来控诉道首，向他们清算道费。许多人在登记退道后感到轻松愉快，有的得到了很多退道费，过了一个快活年。道徒们对政府挽救他们走出歧途，普遍表示衷心感激，他们说：“过去被五字真言拴着，没有得到解放，这次政府把我们脖子上的绳套摘下来了”，有的说：“政府帮助我们脱下了虱子皮袄”，又说：“我们参加了一贯道，政府不但不处罚我们，还帮助我们把丢掉了的钱找了回来，从来没有这样好的政府”。有的道徒得到了退道费立刻就买了毛主席的像片挂了起来，感谢毛主席给他们的好处。不少觉悟了的道徒积极参加了取缔一贯道的工作。

第三、取缔一贯道后，谣言显著减少，道徒纷纷转向生产。过去许多谣言，反动标语文字，都来源于一贯道。自从取缔一贯道工作进行以来，反动标语和谣言已很少发现，治安情况显著好转。过去许多道徒受了骗，不敢安心生产，在退道后，由于提高了觉悟，也有信心来搞生产了。如东郊区小庄村一百六十多个道徒，用追回来的道款组织起了合作社，买了农具，有的道徒把破产了的铺子恢复起来，有的买了三轮车，有的摆起了小摊，走向安居乐业。

今后还须继续努力,务求彻底肃清一切道会门组织,目前有少数应登记的分子还没有履行登记,其中,有的是因为仍有顾虑,不敢登记,有的则是有意顽抗。因此,取缔一贯道的工作,还须继续进行下去。没有登记和退道的分子只要进行登记、退道,政府决准予改过自新。但对有意顽抗,不肯悔过,或暗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经查出,定予严办。已登记分子,只要安分守法,停止非法活动,即可免于追究。

狱中斗争一千日

彭 镜 秋*

一、被 捕

1934年11月12日深夜,我和儿子一起被捕,被押到上海浦东拘留所。看守打开一扇铁门,我和孩子刚进去,门就“当啷”一声关上了。5岁的毛毛吓得惊叫起来:“妈妈,门锁了!出不去了!”他挣脱我的手,绝望地拍打着门,哭喊着:“快开门呀!我要出去……”

牢房里空荡荡的,连块床板都没有。我抱着毛毛坐在冰凉的地上,劝他,哄他,但是任何语言都不能解除他对冷酷现实的恐惧,声声撕碎人心。

过了几天敌人将我们押到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西北风嗖嗖吹来,床上没有被褥,我们娘俩紧紧地偎在一起,仍被冻醒,不能入睡。后来难友们知道了借给我一件棉大衣,才好一点。

号子门上有一个洞,20厘米见方,这是看守巡视检查用的。张越霞住在我的对面,乘人不备,我俩利用它交谈。洗衣服时碰到夏娘娘和周惠年,她俩装扮成婆媳俩,带着两个孩子,大家喊他们的

* 世纪同龄人彭镜秋,原名曾朴,湖南宜章人。早年受邓中夏同志的影响参加革命,参加过广州起义,曾在海陆丰坚持斗争,1928年加入共产党,在安徽安庆、上海坚持地下斗争。本文记叙了她和战友们在狱中斗争情况。

孩子为囚童。那个小二就是后来的民航总局副局长李钊。

姚钱氏是政治犯，她年龄大，又是小脚，象个家庭妇女，敌人让她干杂务。她利用这个机会，了解情况，传递消息，帮助大家买零用东西。

敌人审讯了我2次就宣布判5年徒刑。1935年1月将我解到南京模范监狱。

二、钱瑛挺身而出

到了模范监狱，看守把我带去见二科长。二科长满脸横肉，凶神恶煞，问了我姓名之后，就训话：到这里来，要守这里的规矩，刑满了可以出去。否则，就送回司令部，加重判刑！我望着窗外，不加理睬。那个女看守点头哈腰连连说是，然后将我娘俩押到大号子。

女牢的大号子是个弄堂，两边各有几间房子，每个房子里关了20几个人，主要是普通犯，只有黄海民、张金保和我是政治犯，因为带着孩子关在这边。大部分政治犯都关在后面的一排小号子里。中间有一个院子隔开，这是放风的地方。

监狱每天开两顿饭，饭前大、小号子的犯人各有15分钟放风的时间。放风时，我有意朝后排的窗子望，政治犯都站在铁窗里，亲切地同我的儿子毛毛打招呼。

我在第5个窗里看到钱瑛同志，分别7年的战友，想不到在此见面。众目睽睽，我俩会意地望了望，好象第一次认识似的，寒暄了几句。

钱瑛当时化名彭友姑。1928年春我从海陆丰撤到香港，和她住在一间大房子里，她在广东省委工作，每次出去都带回不少书刊，好学不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周恩来、李立三分别找我们谈

话后，我和吴展^①离开香港就同钱瑛同志分手了。

监狱里，倒马桶，打饭是统一时间，大家都可以出来。一天钱瑛在弄堂碰到我，见左右无人，轻声问：“你承认是共产党员了吗？”

我吃惊地说：“没有”。“那你的判决书上写的已承认”，她严肃地说。

“我没有承认，敌人硬这样说。”我坚定地表示：“虽然马列主义的书读得不多，可是我站稳立场，决不动摇。”

“好，斗争在第一线，要站稳立场。”她鼓励我几句，匆匆离去。

钱大姐不仅在政治上关心同志，而且在生活上处处照顾别人。数九寒天，我没有被子，常常冻得难以入睡。钱瑛知道后，想方设法送来一床被子。这是很危险的，敌人严禁共产党活动。

过了几天，看守发觉我有了被子，马上来盘问。我不能连累同志，缄口不言。看守凶恶地说：“不说？！那就是你偷的。”把我带到看守长那里。看守长平时打扮得妖里妖气，我们背后叫她“花瓶”。“花瓶”指着我骂道：“看你面黄肌瘦的样子，是个大烟犯子，不是政治犯。被子从哪里来的？！”

我天天挨饿受冻，能不憔悴吗！我瞪了她一眼。

“花瓶”拿起鸡毛掸子，在我头上抡来抡去，威胁我，要我跪下。共产党员就是杀头，也不能给敌人下跪。无论她怎样威胁，我都是一句话：“我没有偷。”

“花瓶”又气又恼，把我押到二科。二科长马上命令打我的手心。板子抡圆了，重重地打下来，1、2、……20，右手马上像发面馒头一样肿得老高。

“被子哪里来的？不说，看我板子硬，还是你的嘴硬。再打，打

^① 吴展，安徽舒城人，中共党员，彭镜秋的丈夫。黄埔第一期学员，广州起义时任营长，率部队撤到海陆丰后，到安徽安庆做地下工作，1929年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1931年春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后被张国焘杀害。

左手。”又是20下，我的左手顿时又青又紫，成个紫茄子。我还是一句话：“我没有偷。”二科长嘶叫着：“再打5下”。一共打了我45下，我仍不改口。他们给我加上手铐，押回牢房。

十指连心，双手火辣辣地疼得钻心，又戴上沉重的手铐。我慢慢捱回牢房。等在门口的小毛毛一下子扑过来，抱着我的腿大声痛哭。凄厉的哭声在弄堂回荡，难友们面有愠色，沉默不语。我望着孩子心疼如绞，悲愤难平。但我内心是平静的，我没有玷污共产党员的称号。

消息很快传到小号子，钱瑛不愿我背上小偷的罪名，为了保护我，挺身而出，质问二科长：“这么冷的天气，伍金华（我当时的用名）带着孩子，没有被子盖，谁无恻隐之心。被子是我给的，要杀要砍问我吧。你们要她母子俩冻死不成？！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说忠于孙中山吗，你们的民生主义哪里去了？”

二科长张口结舌，恼羞成怒下令给钱瑛钉上手铐。

小号子里的全体政治犯立即宣布绝食，抗议虐待犯人。二科长见事闹大了，自知理屈，把钱瑛和我的手铐都取下来。这场风波才结束了。

事隔几十年了，钱瑛舍己为人，赤胆忠心的高贵品质仍激励着我。敌人惨无人道的折磨没有使她倒下，而林彪、四人帮的肆虐使她含冤而去。

这次绝食是女牢中第4次绝食斗争。第1次是抗议洗澡水不干净，第2次是声援牛郎夫妇，第3次是何宝珍同志质问二科长为什么不履行允许亲友送食物的规定，遭到毒打。全体政治犯绝食抗议。在我入狱之前，何宝珍已于1934年秋英勇牺牲。

三、绝食斗争

我想到小号子和同志们在一起，下决心把孩子送走，写信给吴展的哥哥。大哥把孩子接回家，我对敌人说是我的表兄接走了。母子一别14年，直到1949年在组织的帮助下，毛毛才回到我的身边，他已是20岁的年轻人了。

孩子走后不久，我和刘张氏一起转到小号子，一起关在4号。刘张氏是江西人，大高个子，小脚，只有20岁。

本来监狱的伙食标准定的很低，再加上狱吏的层层盘剥，我们吃得更差了。发霉的米，里面掺了不少沙子、稗子。菜更是量少质差，2个人的菜，连汤带水约一碗，泥沙、虫子、草根、烂纸就占了一半。我们把菜打回来，首先将菜叶子在汤里洗洗，挑出来。等汤渐渐澄清了，再将浮在上面的虫子、草根拣出去，将碗底的泥沙倒掉，每个人才能喝口汤。

在敌人的折磨下，刘张氏体力渐渐不支，染上了伤寒病，肚子疼得厉害，呻吟不止，不能吃东西，拉的是酱色的稀便。有些同志要求来护理她。这种病传染性很强，我的年龄大，学过几天护士，我俩在大号子时关在一起很有感情。我谢绝了同志们，独自护理她。狱中伙食差，又没有药，刘张氏的病一天天沉重。政治犯要求监狱当局送她到医院治疗。监狱当局一再延宕，直到刘张氏气息奄奄，病人膏肓，才派人拿了一副担架来了。这几个人粗暴地把刘张氏摔到院子里的担架上。刘张氏恋恋不舍地望着我们，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我们站在铁窗前，都知道她是凶多吉少，心情十分沉重。我们安慰她：你病好了，很快能回来。看守把刘张氏抬走了。一日、二日……十几天过去，刘张氏再也没有回来，她让敌人折磨死了。不久，杜凤鸣同志也病死在狱中。这一笔一笔的血账我们总有一天要算

的。

刘张氏被抬走后，我调到了7号房间住，有廖金波、严淑芳、林玉娟、傅承敏。洗衣服时是2个号子的人一起洗。我渐渐和同志们熟了。

小号子里关了30多个政治犯，帅孟奇、夏之栩、耿建华、熊天荆关在3号，钱瑛关在5号。年龄最大的是耿建华大姐，她43岁，满头白发，缠着小脚，原是家庭妇女，后参加了革命。大家尊敬地喊她白头发大姐。第二位大姐是帅孟奇。我的年龄是第三大，35岁，大家喊我老伍。狱中最小的3个小同志，一个是肖明，大家都喜爱她，叫她小宝，都跟她学文化，另一个是罗靖松，她是李维汉的女儿，小小的年龄参加了革命，她聪明好学。第三个是纪均，她不但年龄小，个子也小。原是新闻记者，她消息灵通，善于反映情况。

从难友的口中听到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共产党人虽然身陷囹圄，从未放弃斗争，她们的事迹在难友们中传颂。比如帅孟奇。敌人见枪毙、死刑吓不倒她，就说：“不让你痛快死，也不能好好地活着。”对帅孟奇同志动用重刑，灌汽油使之七孔出血，遍体鳞伤，坐老虎凳把她的筋骨折断，打掉她满口的牙齿，打得她死去活来。敌人失败了，酷刑没有使大姐屈服，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最后宣布无期徒刑，把大姐从宪兵司令部押到南京模范监狱，企图使她慢慢死在狱中。英雄的事迹在难友中传颂，激励着每一个人的斗志，使政治犯更加团结。普通犯人无不表示敬佩，觉得同这样的英雄一起坐牢，也不枉活一世。在司令部时有个女看守赞美大姐是少有的英雄，骂敌人太残忍，偷偷地买了一只老母鸡，用泥纸包起来送给大姐吃，补养身体。狱中的难友们纷纷献药帮助她治好了外伤。她因深度近视大家喊她“趋趋”。

我们在狱中虽然没有正式地建立支部，但是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以帅孟奇、钱瑛、夏之栩为核心领导的无形支部。这3位大姐

对敌斗争有策略、斗争火候掌握得好，领导我们进行了有声有色的斗争。我们在狱中流传着一首囚歌，歌词是这样：

囚徒，不是囚徒是俘虏，
黄饭和苦菜，臭虫和蚊蝇，
只能瘦了我们的肉，
不能瘦我们的骨。
铁窗和脚铐只能锁住我们的身，
不能锁住我们的心，
不能锁住我们的思想。

.....

我们誓把牢房坐穿，把监狱变成学校。大家以自学为主，能者为师，钱瑛、薛迅对政治经济学有研究，帅孟奇讲工人运动史，熊天荆讲算术。有的同志学习语文、世界语、英语，我学习政治经济学，但没有学好。

监狱当局不准我们看报纸和马克思列宁的书。但是邹韬奋编的《读书生活》，伊里奇写的书也可以看。愚蠢的敌人不知道伊里奇就是列宁。我们通过各种关系，请亲友给我们送来书刊，大家争相传阅、学习。

薛迅大姐不仅善于言辞，而且会绘画，她经常在纸上画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栩栩如生，印在白布上，绣成美丽大方的枕头。耿建华心灵手巧，用布头或绸缎作成小猫、小狗各式各样的玩具，千姿百态。以我们全体同志的名义送给汪得珍同志的孩子。这个小男孩只有八九岁，他对这些礼物爱不释手。

汪得珍和牛郎是国际友人，一起在中国做国际互济会的工作，人都称为牛郎夫妇。1931年不幸被捕。1933年他们要求释放进行绝食斗争，小号子的政治犯为了支持他们的斗争并要求改善生活进行了绝食斗争。这次斗争轰动了社会，进步知名人士李德全、曹

孟君冲破敌人的阻挠到狱中慰问牛郎夫妇，并把狱中非人待遇公布于众，引起公愤。敌人不得不答应改善监狱生活。汪得珍每天可放风1小时，他的孩子每月探监1次，带来糖、板鸭，生活也得到改善，10天可以买1次牛肉、鸭蛋。每月可以接见1次亲友，外面可以送东西、杂志。

汪得珍不同我们关在一起，午饭前，到我们前面的院子里放风。每次放风时，她见旁边没有人就走到5号窗前，用外语同钱瑛同志交谈，把外面的政治斗争，国内外新闻告诉钱大姐，并把孩子送来吃的东西交给大姐，请她转给同志们。有时她把孩子也带到院子里来，孩子活泼可爱，增添不少生气。钱大姐利用倒马桶、洗衣服等机会，把外面的消息告诉同志们。

监狱长秉承主子的意图，妄图把我们政治犯折磨致残、致死。所以管理越来越严，不时地搜查号子，把我们学习用的铅笔头、我们用罐头皮做的小刀（切咸菜头的）统统搜去。把每天放风的时间，由10分钟逐渐缩短。倒马桶、洗衣服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还不等我们做完，就往号子里赶。最后连开饭也不开号子门，敌人的虐待有增无减，激起了众怒。

钱瑛、帅孟奇、夏之栩3位大姐根据这些情况，先找了骨干分子研究对策，而后把办法交给群众酝酿、讨论。我们在敌人的魔掌中，力量对比是绝对悬殊，是背水一战，宣布绝食后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任何一个人的动摇、叛变都会导致斗争失败。必须要群众反复酝酿讨论，真正达到思想认识统一，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只有大家团结一致，才能使斗争有始有终，做到不胜利不收兵。条件成熟了，3位大姐宣布绝食，要求恢复吃饭开门、给洗衣服的时间、延长倒马桶的时间。

1936年的一天，小号子的全体政治犯都躺下了，宣布绝食、绝水。放风的时间到了，看守故意把门大开，可是没有一个人起来。开

饭了，看守把勺子敲着饭桶吆喝着，仍没有一个人起来。

绝食的头一两天，起来小便时，头昏眼花，头重脚轻，只能扶床而行。小号子里寂静无声，到第三、四天耿大姐饿得吐起来，我在7号房间能清晰地听到。号子的难友们很镇静，互相鼓励着，安慰着。不一会儿，有咚、咚、咚的敲墙的声音，这是隔壁的难友问候我们。

绝食斗争轰动了监狱，住在大号子的难友乘着放风的机会，扒在窗上看我们，善意地劝我们吃饭，有个别的难友甚至边哭边劝我们进食。更多的人是竖起大拇指敬佩地说：你们有种！有义气！有的人说：我们大号子也绝食，支援你们，我们都予以劝阻。

绝食进行几天后，敌人慌了，把饭菜抬到通道来。几天没有吃饭了，没有喝水了，饥肠辘辘，口干舌燥，闻到饭菜的味道，更是饥饿难忍，可是没有一个人吃饭，更没有人自首。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破坏绝食。绝食斗争坚持到第5天、第6天，一直到第7天。敌人坐不住了，监狱长带着“花瓶”、看守来了，找钱瑛同志谈判，基本上答应了我们全部要求，当场把全部号子门打开了。绝食斗争胜利结束了。

7天来我们滴水未进，口干得嘴唇都裂了口子，嗓子眼直冒烟。饿得头晕眼花，站不起来，绝食斗争结束了，不能马上吃干的，大号子的难友送来糖，给我们冲糖水喝。难友们之间的战斗友情更加深厚了。

罢饭胜利后，敌人又调整房间，我调到2号房，住在上铺，对面的上铺是郭英，黄隽和肖明在下铺。郭英又叫郭纳琳。她是深度近视眼，被捕后敌人将眼镜没收，她时常将眼睛眯成一条缝，仍是看不清楚，大家叫她“三瞎子”。每天晚上我们睡下后，因为住在对面，长谈不已，友谊日渐加深。她在政治上坚定，斗争有策略，有水平，她嫉恶如仇，性情耿直。在生活上活跃、风趣。有一天她接到外面送来的食物，便写了一张字条，请大家来吃，我记得最后一句是“来

者不拒，不来不请”。同志们喜爱又尊敬她。陈同生写过《不屈的女战士郭纲琳》，详细地记述了她在狱中的斗争。

四、反省院的斗争

1936年5月我已刑满(国民党法律规定未判刑之前，在押一天顶两天)，本应释放恢复自由。但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热潮日益形成，红军东渡黄河，高举团结抗日的大旗。各个群众团体纷纷要求释放政治犯。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反共的政策，为了遮人耳目，又办了反省院，将刑满的政治犯都押送到反省院，威胁我们说：只有悔过认罪合格，才可以从反省院“毕业”。否则，不能自由。反省不好送回监狱再加刑，刑满后仍要到反省院反省。我们知道我们永远也毕业不了，我们抱定牢底坐穿的决心到了反省院。

5月的一天上午，我告别了帅大姐、钱大姐等难友们，被押到反省院。

反省院在南京太平门晓庄附近，是专门为关政治犯新盖的。女牢的3个看守，两个是叛徒，一个是叛徒的妹妹。有的人意志薄弱，为了“毕业”和看守打得火热，情况比监狱复杂。敌人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法，讲课，个别谈话，组织娱乐活动，看电影，无非是显示蒋介石的威风，炫耀国民党兴办的工程。一天到晚宣传“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一套。胡说地球上只有一个太阳，中国只能有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攘外必先安内等等谬论。妄图以此动摇我们的信仰，改变我们的主张。

一天敌人让我写自白。我装着不懂，故意问：“什么叫自白，怎么写？”敌人说就是写口供，我把在司令部编的假口供，简略地写了一遍。有意写得歪七扭八，错字连篇。

敌人为了分化瓦解，不时地找我们个别谈话。有一次把我找

去,问道:“你想出去吗?”

我理直气壮地说:“你不开门怎么出去。”

他嘻皮笑脸地说:“你反省了我们可以给你介绍工作。”

“用不着,我在这里有饭吃。”

有一天我正在房间里,听见走廊里噤、噤皮鞋声,越来越近。我估计敌人要开门进来,就背对门,面壁而坐。果然是国民党员郑大伦进来了,他虚情假意地问:“你不是有个孩子吗?我们可以负责送到孤儿院。”

我头也不回冷冷地说:“用不着,我的孩子早送到表兄家里去了。”

他见无隙可钻,悻悻地走了,临出门时哼了一声,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大约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的难友——模范监狱的政治犯全部转到反省院。见到诸位姐妹们,格外地高兴,感到有了力量。我把了解到的情况悄悄地告诉了钱瑛和其他几个同志。

国民党见屠杀吓不倒共产党人,就改用感化、反省,企图用软刀子杀人的办法来使共产党人屈服。为了“感化”政治犯,敌人有心把伙食办得很好,让我们到饭厅吃饭,白天不关号子门。大约有1个月的工夫,敌人发现不但没有“感化”了我们,反而被我们利用互相联系,互相鼓励,开展工作。敌人马上改变办法,不准随便出号子,每顿饭送到号子里吃,就是上厕所也要请示。

这时敌人不仅强迫我们做“纪念周”,唱“党歌”,而且按文化程度把难友分成甲、乙、丙班。在男牢还设研究班。班次越高,麻烦也越多,敌人要求研究班的人写文章。

我早已有提防,装成不会写字的样子,并说当了几年姨娘,在师范学的东西早已还给老师了,被编在丙班。丙班有8个难友:肖明、黄海民、纪均、姚钱氏、阿妹等。阿妹是农村姑娘,据说在被捕时

陪斩中得了羊角疯，到反省院后时常犯病。敌人知道她出去后不能再工作了，过了半年就把她放了。

夏之栩、熊天荆在甲班。

乙班人最多，有钱瑛、帅孟奇、薛迅、郭英、朱凝、罗靖松、黄隽，她们常常利用上课的时间和敌人斗争，搞得教官张铁君下不来台。张铁君有时也给全院讲课，他专讲辩证法，是讲精神决定物质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他把诸葛亮的八卦搬出来，说这是中国的辩证法，用不着到外国搬什么马列主义。还攻击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三民主义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只能讲一个主义，等等，一派胡言乱语。我有一次乘敌人不备，到乙班门口去听，听到钱瑛正质问张铁君：“你说马列主义不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最好请把马克思主义著作拿来让大家看一看，也好同三民主义比较比较，看看究竟哪个好。”问得张铁君瞠目结舌。

丙班的课程比较简单，有党义、三民主义、家事、珠算。由一个烫发的“花瓶”讲党义和三民主义。她时常在课堂上提问。轮到我对答，我就说：“你讲得我记不住，脑子不好用。”拒绝回答问题。

有一次考试，我第一个交卷。“花瓶”打开卷子一看，偌大的一张纸写了一句话：“民者民也，生者生也，民生者民生也。”脸一沉问道：“我是这么讲的吗？”

我不紧不慢地说：“我记不得那么多。”

她暴跳如雷：“不准你出教室！”

我见她气得脸红脖子粗，暗暗高兴。走回位子，坐下练字。

反省院强迫每个人写反省日记，我们却在日记中写吃了一碗面条、散步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少有人按照敌人的要求写。

丙班的难友还要做工，我们为可以学到技术，就去了，一看是给敌人洗衣服，我下定决心不为敌人干活。洗衣服的地方，清清的水从石板上流过，像小溪一样。有一天我谎说洗衣服，让看守给我

开了门。我边洗边玩把自己的衣服洗完了就回到号子休息。吃晚饭时，瘦高个子的看守来检查，她是个叛徒，张口就骂：“你有没有良心！”

我反唇相讥：“你有良心，你的良心早让狗吃掉了。”

她骂了我一阵，拿我也没有办法，就在别的地方整我。我要上厕所，她装作听不见，不来开门，拖延时辰。在敌人的折磨下，我得了肠胃病。

1936年秋，绥远驻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奋起抗击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消息传到反省院，人心振奋。钱瑛、夏之栩组织女难友们做一面红旗，送给绥远抗日前线，同志们还把从亲友处接到的一些零用钱，慰问前线抗日的战士。

在反省院应特别提到郭英(郭纲琳)同志，她因眼睛看不清楚，有一天开午饭时在走廊撞着看守。看守破口大骂。郭英忍无可忍，痛斥看守。看守把她关到警备室。警备室是四面不透光的黑屋子，暗无天日，大小便、吃饭都不准出来。郭英同志在隔离室里坚持斗争，每天痛骂不止，在老远的地方都能听到。不久敌人又将她押回原判机关——南京宪兵司令部，惨遭杀害。她宁死不屈，高唱《国际歌》，直唱到雨花台。

1937年春天，四方面军西路军在甘肃失败，不少同志被俘，有的同志被押到南京。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关在反省院女牢里。她们长期在根据地、红军部队工作，和我们做地下工作，又坐了几年牢的同志风格完全不同。她们朝气蓬勃，爽快、豪放，走起路来咯咯响，讲起话来嗓门大。

1917年至1927年我在家乡宜章女子学校教书，吴仲廉是我的学生。我知道她进来后，很想嘱咐她，告诉她反省院情况，及如何应付敌人，可是一直也找不到机会。一天我正在院子里散步，她站

在窗里看见了，又惊又喜。她大声地喊道：“你不是曾朴老师吗？”我赶紧溜到她看不见的地方。以后我碰到一个机会，见旁边没有人，赶快上前低声地说：“敌人问你做什么的，千万别说是干部，就一口咬定是红军家属，在洗衣队洗衣服的。不要说是宜章人，否则敌人到宜章调查，你就被动了。”她后来按照这个口径，编了一个假口供。在党组织营救下，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3个同志比我们早出狱。

五、周恩来、叶剑英讲演

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扣住，他不得不同意联共抗日。对西安事变的消息敌人严加封锁，直到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反省院当局才做了一个歪曲事实的报告。尽管敌人封锁，国共合作的消息通过各种途径传入反省院，在难友间不胫而走。因是传闻，大家半信半疑。同志们一方面高兴，知道出狱有盼头了，另一方面有的同志对这个政策不理解，有些迷惑。大家多么盼望听到来自党中央的消息。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谁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是那么幸福。至今一闭上眼睛，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1937年8月18日上午，全体难友到礼堂集合。这个礼堂平时是做纪念周的地方，前面是台子，台下是一条条长椅，几十个女难友坐在右边，几百个男难友坐在左边，中间是个过道。看守们照例站在边上监视我们，但没有往日的凶神恶煞，气氛不同一般。

今天并不是纪念周的日子，大家都在猜测，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突然，大家看到周恩来、叶剑英同志来了，在反省院当局（即院长）的陪同下走进会场。有的人站起来喊“是恩来，周恩来！”“啊，伍

豪(周恩来的化名)!”“老杨(叶剑英的化名)!”大家欣喜若狂,掌声如雷,一边鼓掌一边高呼:乌拉!乌拉!我们大都坐了三四年的牢房,受尽了折磨,但最痛苦的是和党失去了联系,如同孤儿远离母亲一样孤单。今天见到了中央负责同志,见到了大家熟悉的周恩来、叶剑英同志,我们怎么不高兴,怎么能不鼓掌,怎么能不欢呼!

周恩来、叶剑英微笑着一再招手,等掌声渐渐静下来后周恩来第一个讲话,他那浑厚的声音传遍礼堂的每个角落。礼堂的人都屏声静气地听着,生怕漏掉了一点。

他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他说: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进攻上海,继而侵占华北。从“七七事变”以来,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我们中国人民一定要奋起抵抗,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他接着分析了抗日民族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现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为了挽救民族生死存亡,不同党派、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部队都要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同志回顾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他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反对革命,为了讨伐陈炯明,广东革命政府组织了两次东征,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奋斗取得的。共产党流了血,国民党也流了血,革命先烈的血,也分不清哪摊血是共产党流的,哪摊血是国民党流的。那时为了北伐,国共两党可以合作,现在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国共两党可以实行第二次合作。

第三点,他阐明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有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我们的最低纲领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新三民主义是基本吻合的。

最后，他批驳了托派的诬蔑，托派诬蔑中国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周恩来同志讲话很艺术，他说：这是造谣！我们共产党人是有骨气的，委员长也决不会和没有骨气的人合作。他分析西班牙内战的教训，指出再打内战，中国就要亡国。我们坚决反对打内战，一定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只有这样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听了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大家茅塞顿开，彻然大悟。

周恩来同志是在敌人的监狱里作报告，分寸掌握得好，既不能让国民党官员挑出错来，又不能泄露党的机密，还要让我们全体难友能听明白。周恩来善于言辞，博大精深，讲得十分得体，事后反省院当局不得不表示钦佩。

叶剑英同志讲话时，周恩来同志走下台来，在每排凳子上坐一会儿，敏锐的目光打量左右两边的同志，细细地端详着每个同志。他是抓紧时间调查，看哪些同志落入敌人的魔掌，以便向国民党交涉释放这些同志。

我的心跳动得很厉害，老盯着周恩来同志，期待着他那明亮的目光能落到我的身上，希望他能走到我的面前。心里暗暗想：你还记得我吗？还认识我吗？1928年我从海陆丰突围后，在香港周恩来同志曾找我谈过一次话，年代久远他怎么会记得呢。我见到他，如同见到久别的母亲，真想跑到他的面前讲讲心里话，有千言万语向他倾诉，想向他倾诉失去组织关系的苦闷，汇报在狱中的斗争，向他表示对党的事业的耿耿忠心。可是在监狱里不能这样做，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

当天周恩来、叶剑英同志离开时，从反省院带走了夏之栩、熊天荆、王根英3位女同志。他们走后的几天反省院白天把号子门敞开，允许我们串门，谈话。看守也不敢大声训斥了。但是敌人还不放弃对我们进行政治压迫，有意歪曲说：你们党的领袖也说在中国要实行三民主义，给每人发了一本旧三民主义，强迫我们学习。并

给我们作报告，说联合战线是两个拳头并在一起，但随时都可以分开。应是建立统一战线，一个拳头把另一个拳头包起来，这样永远成为一个拳头。敌人是要通过国共合作达到溶共、灭共的目的。敌人的讲话使我们认识到抗战中，国共两党的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必然有斗争，有流血。

不几天敌人把号子门关上了，不准我们随便往来。

这时日本飞机不断地轰炸南京，每天炮声隆隆，不讲我们心里也知道战事紧张。敌人开始分期分批释放政治犯，但仍在耍花招，一天把我找去，让我在自首书上签字。我严肃地回答：我不是共产党员，没有什么可自首的，我把自首书用墨涂得一片黑，翻过来在背面改写抗日书。我历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最后写道：国家兴亡，匹夫（匹妇）有责。当今日寇要灭亡中国的时候，应该让我们出去，到前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

1937年9月25日，日本飞机在南京狂轰滥炸。女牢里只剩下钱瑛、朱凝、肖明等13个女同志。南京国民党政府准备撤退，反省院乱作一团，顾不了那么多了，把我们13个女同志一起释放。

在钱瑛大姐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受到办事处同志的热情接待。由他们安排，我们坐火车到了西安，在七贤庄见到邓颖超大姐，她同我们谈了话。而后送我们到陕西云阳接受党组织审查。钱瑛同志分配到武汉担任湖北省委领导工作，我们这些同志被送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统一战线的政策，而后分配工作。在狱中有自首行为的人不予恢复组织关系，到白区重新锻炼，和党的外围组织发生关系。

10月份，天高气爽，凉风习习，我来到革命圣地——延安，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

我在二十九军的短暂经历

刘 昭

1937年，我参加了宋哲元二十九军的南苑学兵队。在北方局领导下，做下层秘密兵运工作。也就是在这一年，七七事变爆发，我亲眼目睹了北平的沦陷。在二十九军短短的几个月，所发生的、所经历的一幕幕，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

一、到南苑当兵

1936年10月，在党的营救下，我和黄健纯、朱今、张建勋等15人终于结束了长期的监禁生涯，跨出了草岚子监狱。

出狱后第二天，安子文（原名徐子文）来到我的住处宣武门外储库营四川会馆找我，他代表市委向新出狱的同志表示慰问，并请我去东安市场东来顺吃了一顿涮羊肉，算是组织上对出狱同志的一次犒劳。安子文还代表市委通知我转为正式党员。他说，组织上决定你去延安住红军大学，同去的还有其他几个人，你就在四川会馆等着，什么组织活动都不要参加。

等着去陕北，我一直等到1936年12月。就在这时候西安事变爆发了。我听说张学良在西安成立了抗日军事训练队，在北平通过共产党组织，为他招收学生。我急于想走上抗日的岗位，就向安子文提出：不能去陕北，让我去西安入张学良的抗日军训队好了。我的要求得到了组织上的同意。但没想到不久西安情形混乱，我们走

到了侯马，又被迫返回北平。这已是1937年1月上旬，我仍旧暂住四川会馆，等候重新分配工作。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宫维桢，他是民先队队员，思想进步，也很有救国热情。

阴历年后，听张建勋说，平津危急，要保卫平津，保卫华北，关键是争取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抗日。党已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现在要派人去南苑当兵，做宋哲元二十九军下层士兵工作，因为很艰苦危险，找不到适当的人去。我想出狱的难友们在各地都很好地工作了，我不能再等着，二十九军下层工作需要人，我就去吧，艰苦危险的工作正可以锻炼和考验自己。我决心去南苑埋头苦干一番。得到安子文同意后，我把名字刘光书改为王凯南。张建勋拿了一封介绍信给我，交给我的任务是：在士兵中宣传抗日，交朋友，秘密发展党的组织，争取二十九军抗日。这封介绍信是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写给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参谋处长雷××的。雷参谋处长很高兴地接待我，让我当场考试小学毕业程度的作文、算术，这当然很容易了，参谋处长看了我的答卷很满意，又以为我同张克侠副参谋长有什么亲友关系，对我好象有了亲近和信任感，要我帮助给学兵队招几个青年学生。回来我向张建勋汇报，他说：“这是难得的机会，要赶快找人。”宫维桢把他的同事高亚林找来。高亚林是个精干热情的青年，身材高壮，是个当兵的标准个儿。张建勋也介绍了一个河北农村知识青年刘××给我。我带着高、刘俩一起去南苑见雷参谋处长，他很高兴，对他俩简单地进行作文、算术的考试，认为合格，就写张条子，叫传令兵送我们去学兵大队当学兵。我们分散编在新成立的第三中队的三个班里，我在第一排第一班，当时就脱掉便衣，从头到脚穿上了灰布的新兵军装，成为二十九军的一员。

二十九军一直保持着冯玉祥军队的传统，对部队还进行保国卫民的教育。部队纪律严明，作战勇敢，训练极为严格艰苦。尤其

是学兵，在学兵队毕业后要分配到连队当班长，训练要求更严。学兵队操练最苦最累是扒慢步，操练正步的分解动作，搞不好就要挨骂挨揍，轻的当胸几拳头，重的挨军棍。我虽然在武汉军校当过班长，以后在国民党第六军当过排长，小心勤苦操练，仍挨过一二次拳头，揍得我胸腔发痛，头脑发昏，好象有一股力量在逼我、推我，走吧！这太苦了，实在受不了啦！但想到我是来为党工作的，再苦也要忍受，也就安心地干下去了。

2月下旬，张建勋来南苑同我联系，我向他讲了在学兵队的情况，他鼓励我：“任务很重要，要艰苦奋斗。”

宋哲元虽与日本有些勾搭，但还标榜“保国卫民”，部队中还把岳飞的《满江红》当军歌。连队中每餐之前要集合站队唱《吃饭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一般官兵还是有爱国心，愿意抗日的；特别是喜峰口战斗，二十九军抗日有功，有名，他们的大刀片杀得日本鬼子很苦。我就公开极力宣扬二十九军喜峰口抗日的战功，提出“拥护宋军长抗日”的口号，取得了队上官兵的好感。队上的一些学兵弟兄愿意和我接近。我想以我和高亚林、刘××为核心在学兵队成立一个半灰色的组织，先团结一部分最热心抗日的学兵，再从中培养选择忠诚可靠的发展为党员。3月，朱令代表省军委接替张建勋来同我联系，我向他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他同意我的计划。我同高、刘两人商谈，他俩很赞同。在一个星期日，检查内务完了，利用休息时间，我们3人就到南苑北小街一个饭馆里饮血酒为盟，结为“抗日兄弟”，我年岁比他俩大，成了大哥。我们的誓词是：“我们3人王凯南、高亚林、刘××愿结为‘抗日兄弟’，决心抗日救国，患难相扶，生死与共，谨此盟誓。”我鼓励他俩努力学好学科、术科，争取信任；找决心抗日的学兵交朋友，秘密结为“抗日兄弟”，扩大我们的抗日组织。经过他俩积极活动，结交了一些抗日朋友，成为“抗日兄弟”。

一天晚上，二排长在教室里给全中队讲课，怎么扯到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讲不上来，用教鞭指着一名20多岁像书生样的学兵，要他出来讲。他得意地走上讲台，讲道：“近朱者赤，朱是指朱毛，朱毛是共匪头子，意思就是说，不能接近朱毛，接近朱毛就会赤化成为赤匪。”二排长在一边点头赞扬说：“你们说他讲得好吗？”“讲的好！”很多声音回答。

我贸然地站起来说：“报告，他讲的不对。”

大家都惊异地望着我。二排长用教鞭指着我说：“你不服气，好，你讲吧，你要讲不出个道理来，我的教鞭会好好地教训你。”

“‘近朱者赤’，从字意上讲，这里的朱字不是指人的姓名，可以查字典，朱是当赤色或红色讲，说是指朱、毛就错了。这句话的意思是接近赤色或红色的就会变成赤或红。下句‘近墨者黑’，墨字就是黑的意思，这句话是说接近黑色的，就会变黑。总括两句话，是比喻说：接近人要慎重，接近好人就会变好，接近坏人就会变坏。从时间上来说，朱、毛是现在的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古人说的，隔着一二千年，怎么能说朱字就是指现在的朱、毛呢？这不是乱说吗？”

全堂哄笑起来。二排长在讲桌上一拍教鞭：“不许笑！”大家立刻静下来。二排长接着说：“王凯南，没有叫你起来讲，你自己站起来，违犯课堂纪律，应该受到处罚。看你还讲得有点道理，这回宽恕你，以后要注意遵守课堂纪律！”他转向呆在一边的书生学兵：“好啦，你下去吧！”

书生学兵红着脸走下来回到他的座位上，这节课就算结束了。据说这位书生学兵自称是大学生，还是国民党员，平时很傲慢，看不起队上的学兵兄弟，只向当官的吹拍讨好，引起大家的厌恶。这次在课堂上出了丑，大大地杀了他的傲气，我在大家的心目中，成了有点文化的人了。

不久,学兵大队要出墙报,大队长指令各中队选派一名文化程度较好的去参加编写。三中队选派了我去。一中队选派的是王之江,二中队选派的是张××。吃过晚饭,我们3人去大队部报到。大队长出来接见我们,看他是个粗矮个儿,30来岁,中校军衔。他问了我们的姓名,就指定我任大队墙报的主编,鼓励我们要把大队墙报办好,每10天出一期。我想能掌握大队墙报,扩大宣传抗日,总是难得的好事,因此决心尽力把它办好。

我们3人商量好,墙报以宣传抗日救国以及二十九军抗日战功和好传统,鼓励学好学科术科为主旨,材料可以从墙报上选摘,并可报道一些各队学习操练的情况。编写、改稿、排版面、画报头、题头,我都包了。他俩写的稿我尽量修改在墙报上登;有时他俩也担负一些抄写工作。白天我们不能耽误出操上课,只能挤出晚上的时间去编写,有时搞到深夜才回队睡觉。虽然疲倦,大家也觉得很 有劲头。紧张了3个晚上,总算出了第一期,在学兵大队大门口贴出来了。大队长看了表示满意,还命令各中队长让学兵们在休息时间去看墙报。我们感到是在干一件重要的抗日工作,继续努力编写出了第二期、第三期……

3月的一个星期天,宫维楨用同学的名义来看我和高亚林。以后按我们的需要,他带他的表妹丁瑛作掩护,说我们是同学和亲戚,给我们送来食品、报纸和“民先”的刊物,给我们编写墙报提供了材料。

一天晚上,王之江因搜集材料没有来。老张一边看着我画的墙报版面,一边对我说:“老王,我看你是内行,又写又画,当兵真是屈才!”我答道:“没出路,混碗饭吃,有什么办法呢?”“我看你不像是当兵混饭吃的。”这家伙看出我什么来了?我警惕起来:“你看我像什么呢?”“你是有目的的。”他狡黠地望着我:“你是CP吗?”我心里有点吃惊,但还是淡淡地应付着:“什么CP?我不是。我看你老

兄当兵不是也很屈才吗？你是CP吗？”“我不是。”他的神情庄严起来：“但我是中国人，我赞成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了抗日救国，我甘愿抛头颅，洒热血！”

“我同你一样，不是CP，但要抗日救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要是热血男儿，都应该奔赴疆场，为国效命。二十九军抗日有功，还要靠二十九军保卫天津，保卫华北，所以我甘愿来二十九军当兵。办墙报是一项重要的抗日工作，我愿意同你和老王一起尽力把它办好。”

“好的。”他激动地点头。

王之江倒是个热情诚直的青年，有天深夜，他跟我说：“老王，我同你说心里话吧！”他坦诚地讲，“我在二十九军干了一二年了，我一个人闷头干，不知道个方向，很感到孤独和苦恼。现在遇上了你，我感到有个伴了，希望你能够给我多指点指点。”

他话里有音，我试探着：“你不是干的很好吗，要我指点什么呢？”

“我相信你，”他用恳切的眼光望着我，“我对你直说了吧，怎么能找到组织？”流露出他是个失掉联系的党员，现在急切地希望找组织。

“我也对你说实话，”我诚直又有保留地说，“我也在找组织，我们共同努力找吧，找到了就好了。”

“好！”他好像感到了失望，又感到有了点希望。

王之江是否一个失掉联系的党员？我想等朱今来，要他提请组织去调查清楚。

5月，朱今来了，我向他讲了我们结拜“抗日弟兄”的情况，引他去看了我们出的大队墙报。他很赞赏：“你干的不错，有成绩。”我告诉他张××和王之江的问题。他说：“你要注意隐蔽，不要太露锋芒。对那个张××，要经过一个时期考察再说；王之江，等组织查清

了再告诉你。”

二、宛平城烽火突起

6月初，王之江告诉我一个消息：“二十九军军部参谋训练班要在学兵队招收学生，高中毕业就可报考，考取了按准尉待遇，一年毕业。我想去考，你去吗？”

我要得到组织上的同意，不能自行决定，只好说：“等我考虑考虑再说。”

6月中旬，朱今再来，叫我同他一起找一个僻静的厕所，我们蹲下来。他给了一张纸条，我打开来看，上面写着：“王凯南同志，你工作有成绩，特给你表扬，望继续努力！省委。”一股暖流在我心上流过，激动的泪湿了我的眼眶，我觉得我还作的很不够啊！但这珍贵的表扬信只能撕掉，扔到茅坑里。朱今告诉我：“王之江已经查清楚，是党员，组织上正找他，你发现了很好，你可以代表组织同他联系。”他再掏出一个纸条给我：“再交给你一个党的关系，他是南苑二十九军军士教导团×营×连的士兵×××。你负责去接通关系。你拿这张纸条给他看，他就明白了。”我看纸条上只写着一个名字×××，我收藏起来。朱今接着说：“这样南苑就有你、王之江，×××三个党员了，省委决定由你们3人组成南苑兵营支部，你任支部书记，希望你好好地干！”我谈到二十九军参谋训练班要在学兵队招生的问题，朱今说：“好哇，对二十九军的工作很重要，党就是希望我们的同志能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官，掌握实权，不怕往上爬，官当的越大越好。入参谋训练班，这是难得的机会，你和王之江可以去报考。”当天晚上，我把组织的决定告诉了王之江。我们亲热地拉着手，王之江更是激动得流着热泪说：“好啊！我终于盼到了，原来就是你呀！我没有看错吧。”然后他告诉我，他是1936年春在北

平，党派他到二十九军做长期隐蔽工作的，当时曾告诉他以后会有人来同他联系。我也很欣慰，在南苑兵营，多了一个同志，我再也不孤单了。

星期天我去军士教导团，找到那位党员，他正坐在双层床下铺上看书。我们都陌生，他有点惊异，我给他纸条看，他马上亲热地拉着我的手：“啊！认出来了，你来得太好了！我多么地想念你呀！”他眼里含着泪：“我们久别，都有点不认识了！”他让我在床沿上坐下，给我倒水。我看周围有他连上的弟兄在看着我们，不好谈什么，只好谈家常，谈他在教导团的情况。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有一种比亲兄弟还亲的同志感情在互相的心灵上交流。这种最亲热、真挚的同志间友爱之情，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白区工作过的同志都能体会到的。忽然，军号响了，他要去集合，我匆忙地同他告别，说：“下次再来看你”，就走了，虽然这次会见没有谈什么，关系总算接通了。

6月下旬，军部参谋训练班招生的通知下达到各学兵中队，我和王之江都填表去报考。王之江录取了，7月初他已去报到入学。我的考卷分数很高，但因为我的眼睛在狱里受了损伤，有点近视，身体检查不合格，没有被录取。张克侠是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兼参谋训练班班主任，我是拿着他的介绍信到三十八师学兵队的，我就利用这个关系给张克侠写信，要求到参训班学习，说明我考试成绩好，只是眼睛稍有点近视，不妨碍作参谋工作。王之江知道我没有被录取，他来学兵队告诉我：他要去找张克侠当面谈，要我等着。

1937年夏末的一个星期天，宫维桢同他的表妹丁瑛来南苑看我，给我送报刊来。他谈了北平城内日货充斥，日韩浪人不时在各处闹事，人心惶乱不安；还谈到他急迫地要求参加党，还没有头绪，希望我能帮助他。我答应了他，他很高兴地告别走了。

这时平津的形势已经很危急了，日军进驻通县各地，时常外出

演习挑衅，与我守军不断发生冲突。飞机不时地在北平上空盘旋侦察，日寇的进攻，已箭在弦上。

7月8日早上6时，南苑部队正在大操场出早操，忽然听到西面什么地方紧密地响起了枪炮声，所有官兵都感到震惊！一会儿，收操号响了，我们学兵三中队回到营房，听说是鬼子在进攻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借口是日军一个军曹在宛平城内失踪，要进城搜查，乘机进占宛平县城，遭我方拒绝，与我守军吉星文团在卢沟桥发生激战。

南苑二十九军各部队也在紧急备战，学兵各中队昼夜不停地在南苑营房北面围墙内外赶筑工事，挖战壕，筑碉堡。伏暑天，推砖，扛木料，汗水湿透衣裤，像个落汤鸡，大家仍然干得很起劲。我个儿小，也扛着重木料快跑。鬼子的侦察机不时地在我们头上飞过，我恨不能拿起枪把它打下来！

7月中旬，我接到通知，让我去参谋训练班报到。看来，我寄张克侠的信发生了作用。我把“抗日兄弟”工作交给了高亚林。

参谋训练班的学员很复杂，大多是抽调的二十九军的下级军官，有参谋、副官、连排长等尉级军官，考取来的班长、士兵很少。这些军官看来都很世故，看不起我们这些士兵出身的。我们要在参谋训练班开展工作，确实有很多困难。我同王之江商谈，一定要极慎重隐蔽，仍然要从交朋友，结“抗日兄弟”入手。王之江告诉我：他发现张克侠是党员，他还直接去见过张克侠。他甚至说：“我敢肯定他是个共产党员。”我问他根据什么？他说：“张克侠以前是三十八师参谋长兼教导大队教育长。我原来在教导大队，曾听过张克侠一次讲话。他主张全中国要团结抗日，反对打内战，反对不抵抗！这完全是共产党的话。我寄信向他表示钦佩，他回信鼓励我‘努力学习，力求进步’。再是他邀请过北平有名的学者张友渔到参训班讲课，讲《社会发展史》和《日本问题》；还让你来参训班；不是共产党是不

会这样干的。我们可以去找他,说明了,我们上下配合着干,就好办了。”我感到王之江做事太冒失了,首先,是不能这样主观判断,盲目冒险;再是张克侠即便是党员,我到二十九军是拿到张克侠的介绍信的,我也曾估计他很可能是党员,但没有组织上的指示,绝不能同他发生横的关系,这是秘密工作的纪律,不能违犯。我不同意去找张克侠。可王之江一定要去找,甚至说:“你不去,我自己去。”我怕他去捅出乱子,只好说:“找他可以,但绝对不能提出党的关系,只能站在抗日爱国的立场上,请求他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支持和指导。”王之江同意了。一天课余,我们就同去张克侠办公室见他。他是二十九军副参谋长,颇有儒将风度,白长脸,30来岁,他很客气地接待我们。王之江已经同他见过面,早已认识,就给我介绍:“他就是王凯南。”我说:“我是参座介绍到三十八师学兵队的,这次又承您关照,让我来参谋训练班,我来向您表示感谢!”他说:“你是王凯南,我早知道你的名字,但没见过面,你能来参谋训练班,今天能够见到你,我很高兴!”我随即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七七事变,平津危急,二十九军肩负着保卫平津和华北的重任,参谋训练班培养全军参谋人才,应该是抗日的骨干,我们希望在参座的领导下,进行一些抗日的宣传、组织活动,请求参座给予支持和指导。”张克侠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告辞出来,王之江说:“有张克侠的支持,我们的工作就好开展了。”实际也是这样,班上的官和同学,看见军副参谋长、班主任很关照我们,以为我和王之江同张克侠有什么亲友关系,都另眼看待,我们又谦逊地同他们接近,这样我们团结了10来个有血性的爱国青年军官,结为“抗日兄弟”。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声言“七七事变”中国局势已到“最后关头”,提出了保全华北领土主权的四点最后立场,使全国人心振奋。但蒋介石仍然说什么“和平未绝望前,终希望和平解决”。宋哲元也幻想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不断与日方接触,进行和

谈。日军在卢沟桥碰得头破血流，为了喘口气，加紧进兵，切断平津、平汉两线，完成了对平、津包围的战略部署，也假意停火谈判，施行缓兵之计。形势暂时出现了打打停停的一点缓和。

三、南苑失守

7月下旬初，一个星期天，我请假进城去，经过妹妹找到朱今，我向他汇报了我们在参谋训练班的情况。他说：“你和王之江都进了参谋训练班，工作有了开展，很好。但参谋训练班成员复杂，你们要注意长期隐蔽，不要太露锋芒，暴露自己，要慎重地交‘抗日兄弟’，并从‘抗日兄弟’中发展党的组织。对张克侠你们要少去找他，而且以学生对班主任的关系为限。”我告诉他宫维桢希望入党问题。他说：“军队以外党的组织问题，要找安子文谈。他已经同刘竞雄结婚，住在沙滩北京大学学生宿舍里，你可以去找他。”我去北京大学，正好安子文在宿舍里。他跟我谈了平、津的局势，说：“现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成，抗日战争实际上‘七七’已经在卢沟桥上正式打响了！从华北来看，平、津危急，二十九军吉星文团在卢沟桥打得很好，日军伤亡很大。但宋哲元举棋不定，幻想和平，所以打打停停，北平街头堡垒筑了又拆，日本赢得了时间，源源向关内增兵，完成了对平、津的大包围。在这样紧急关头，宋哲元却回山东老家祭祖去了。日本大特务土肥原也赶到山东去找他，宋哲元的态度很难说。现在全国都在注视他的动向，他要是很快回到北平，北平主战派占上风，这就表明宋哲元可能要坚决抗战；要是他回到天津，那里亲日派的势力大，他就会受到亲日派的包围，转向动摇，平、津难保！所以现在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宋哲元回北平，争取二十九军坚决抗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安子文的讲话，使我看到了黑暗、危险，也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感到在二十九军工作肩负责

任的沉重。最后我告诉他介绍宫维桢入党问题，安子文说：“很好，我同意接受他入党，你把他交给我，你就不用管了。”我把宫维桢的姓名、住址写给他，就向他告别出城。

我把进城和听到的情况对王之江谈了，他同意长期隐蔽，慎重结交“抗日兄弟”，发展党组织的方针。我准备下星期日去军士教导团同那位党员联系，再去学兵队找“抗日兄弟”高亚林他们谈谈。可形势急转直下，竟没有能做到。

日寇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立即开始扫清外围的作战。7月27日晚，南苑南边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我们都从梦中惊醒，全副武装到院里集合。晚上我们也是抱枪束弹而睡，彻夜不眠。

28日队长接到命令：“参谋训练班无战斗任务，立即撤回北平。”队长带着我们迅速走出南苑北门，穿过枪林弹雨，到达永定门时，100多人的参谋训练班只剩下30多人了。

当我们这支残破的队伍开进中南海时，时间已近黄昏。这时，坏的消息传来了：“南苑已经失守！”“赵登禹师长阵亡！”“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官教导团团团长佟麟阁率领军官教导团从南苑突围后，在大红门遭遇敌人堵截，壮烈牺牲！”

约近午夜，命令传下来：“二十九军直属部队排以上军官，除值星排长以外，全部到怀仁堂集合。”队长带着我们迅速进了怀仁堂，只见富丽堂皇的怀仁堂的各个厅房，都门窗大开，灯火通明，一些穿白裤褂的人在惊慌地各处跑动，桌上、地上文件纸张凌乱扔弃，像遭到了抢劫。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官员和二十九军直属部队的军官在怀仁堂的大会堂里列队等候，大约几百人。等了一刻来钟，有人喊“立正！”一位穿白绸长衫的人站上了临时放在前面的一张方桌上，我看他是张克侠副参谋长。桌旁一个军官大声喊：“大家注意听，张副参谋长给大家讲话。”大会堂里立刻肃静紧张起来，我想可能是极关重

要的讲话：要坚守北平！

张克侠脸色阴沉，向惊惶拥挤的队列点了一下头。桌旁军官喊了一声“稍息！”他开始讲话：“诸位，宋委员长今晚已去保定了”，他的声调沉痛悲凉，“他认为孤军无援，战争已不能再打下去了！他已经接受了日方的条件：‘限期明早两点，所有在北平城内的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不准留下一个兵。北平治安由张自忠代市长维持。’诸位愿意跟随走的，立即随队出发，出西直门到保定集合；不愿意跟随走的听便，可以发给路费，自奔前程。现在离限定时间还有一个来钟头，各部队马上出发！”

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眼看着中国的故都北平就这样丢给了敌人。我满腔愤慨，想挺身而出，鸣枪高呼：“不许撤退！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誓死保卫北平！”但我又想到我是党派到二十九军长期隐蔽，做秘密的白军工作的，决不能暴露。我只好竭力忍耐，背着枪，怀着悲痛的心情，随着队伍撤离北平。

我跟着部队撤到了保定，从保定我辗转到了太原，找到了党组织，经北方局决定，我到了八路军工作。1949年4月，我随军委总政治部机关重回北京。

“捷克事件”与周恩来的“六八”讲话

蒋 本 良

1968年8月，苏联出兵占领捷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捷克事件”。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的著名的“六八”讲话，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虽然事隔30多年，但作为当时这个讲话的翻译，每当我回忆起当年参加讲话稿起草工作和为总理担任翻译的情景，仍感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1968年8月21日晨，我们外交部苏欧司的同志一上班，就听到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苏联一夜之间大规模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西方通讯社这条开始还是笼统而模糊的消息，既使我们感到惊愕和突然，也不完全出乎意外。因为近半年来，由于捷克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干了一系列使苏联不顺心的事，甚至罢免了原忠实于苏联路线的诺沃提尼总统，使勃列日涅夫大为恼火，捷苏矛盾闹得沸沸扬扬。但是，苏联如此大动干戈，突然出兵占领一个国家，也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震惊。

世界各大通讯社的消息报导，很快雪片似地飞来。身处捷克近旁的罗马尼亚，通过波德纳拉希第一副总理，给我们提供了最详尽的信息：就在8月20日半夜11点半，苏联用空降兵和坦克以闪电战突袭占领了捷克全境，包围了总统府、政府大楼和党中央大厦这些国家的中枢神经部门，同时控制了电台、通讯社，封锁了边界。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军队也从四面八方，几十万大军铺天盖地一齐侵入捷克。苏联还通过塔斯社发布消息，说苏是应“捷

党政领导人的要求,并根据现有条约的义务”出兵捷克的。捷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虽然揭穿了苏联的谎言,斥责苏联的行动“不但违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违反国际法原则”,但又露出一副软弱无能面孔,号召公民“保持冷静,不要抵抗”。可是捷克民众自发起来英勇反抗,组织总罢工、拆除路标、构筑街垒,妇女躺在街上阻挡苏联坦克前进,甚至焚烧坦克,把苏军士兵团团围住,同他们辩论,高喊“俄国人滚回去!”

与捷克毗邻的罗马尼亚,在兵临城下的危急中,急忙向中国求助,要求支持。波德纳拉希第一副总理对中国代办说:现在罗马尼亚已处在战斗的最前线,决心拿起武器抵抗侵略,希望中国履行周恩来访罗时许下的支持罗的诺言。

苏联占领捷克事件一发生,周总理就指示外交部研究对策。当时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建议发表政府声明,配以《人民日报》专论,来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并草拟了《关于揭露和谴责苏联武装占领捷克的请示报告》。但是,就在这时,周总理从另一份外交部和对外友协关于庆祝罗马尼亚国庆24周年的联名请示中发现,正巧8月23日是罗马尼亚国庆,届时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将举行国庆招待会。周总理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当即果断地作出决定,并在请示报告上批示,提高出席招待会的规格,把原来以郭沫若副委员长为首改为周总理亲自出席并发表讲话,阐述中国对捷克事件的立场。同时,确定出席招待会的人数也由200人增加到300人,并有意增加了出席招待会的军方代表人数。

根据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立即成立了以乔冠华副部长为首、包括苏欧司副司长李连庆和捷克组张振第的讲话稿起草小组,投入了紧张的起草工作。乔冠华的办公室成了起草讲话稿的地方,大家在这里埋头奋战,直至深夜。经过通宵达旦的奋斗,22日起草小组终于拟就了讲话稿初稿。周总理看了初稿以后,亲自召集起草小组

研究重写讲话稿。

22日晚,正当起草小组还在乔冠华办公室议论讲话稿时,总理秘书钱嘉东来电话通知起草小组到总理处开会,还特别交代张振第把捷克地图也带上。另外,让主管苏联问题的王钢华也一起去。

会议在中南海小会议室举行。虽然时间已经十分紧迫,第二天就是罗马尼亚国庆招待会了,可是周总理仍然和往常一样沉着冷静,办公室充满了轻松愉快的工作气氛。起草小组在乔冠华带领下一走进会议室,周总理一眼就认出了建国初期最早派往捷克的留学生并为他当过翻译的张振第,便问他现在担任什么职务?张振第回答说,没有担任什么职务。周总理转身对乔冠华说,外交部的干部政策太保守了,这么老的同志也没有提拔。周总理接着问,讲话稿是谁起草的?张振第说是乔冠华口授的。周总理批评乔冠华说,你太不放手了,应该让他们先写,然后你再改嘛!周总理又问起他十分关心的外交部文革运动和解放老干部的情况。最后,周总理把话题归结到了讲话稿问题上,具体交代了写讲话稿的主要精神和要点。周总理说,讲话要给世界人民敲响警钟。对美苏仍抱有幻想的人们来说,这是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训。另外,周总理要求讲话除批判苏联侵略和支持捷克人民反对外国占领外,还要鼓励罗马尼亚依靠群众、坚持斗争、必能胜利的信心。在讲话稿的格式上,周总理要求改掉讲话末尾为健康干杯的老框框,而代之以“美苏必败,人民必胜”的战斗口号。经过周总理这么一指点,起草小组几个人觉得豁然开朗。

根据周总理的部署,在内部做准备的同时,对外也作了相应准备。22日晚,按照周总理的指示,陈毅副总理兼外长把周总理将出席罗马尼亚国庆招待会就捷克事件发表讲话的消息,通知了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正巧这一天,杜马大使求见陈毅,受罗马尼亚

党政领导的委托，向中国介绍罗马尼亚政府就捷克局势给苏、波、匈、保、民主德国五国政府的通知。陈毅在中南海武成殿接见了。杜马大使介绍了罗马尼亚政府在通知中指责五国军队占领捷克领土，干涉捷克内政。并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10万人群众大会，齐奥塞斯库强烈地谴责了这一事件，说这是国际共运的最大耻辱，并且宣布采取一系列措施，准备保卫独立主权。陈毅听了高兴地说，你们准备保卫自己的独立主权。你们要有决心和信心，我们支持你们，你们能胜利！接着，陈毅批判了苏联的侵略。他说，我认为要谴责苏联的帝国主义行为。用武装占领一个小国，正如列宁说的，是社会帝国主义。如果说杜布切克投靠西方的话，那么第一个投靠西方的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如果说杜布切克亲联邦德国，那么第一个亲联邦德国的是赫鲁晓夫和他的追随者，同帝国主义勾结最厉害的也是他们；如果说要保卫社会主义，但首先丢掉社会主义的是赫鲁晓夫；说武装占领捷克是为了保卫捷克和平，恰恰相反，什么和平也没有了，发动了战争！然后，陈毅正式通知杜马大使说，明天是你们国庆，周恩来总理将出席你们的招待会，并准备讲话，表明我们的态度。杜马大使显然有点受宠若惊似地赶忙追问了一句：周恩来同志要来？陈毅进一步证实说：对，周总理要来，我也来，来向你们祝贺国庆。最后陈毅提醒说，苏联也可能会侵略罗马尼亚，要犯更大的错误，你们要准备，我们是有准备的。这时勇气倍增的杜马爽快回答说，我们也准备好了，我们是勇敢的。

22日半夜，起草小组从中南海回来后，连夜奋战，按照周总理的口授，把讲话稿整理成文。23日上午，周总理看过讲话稿后，又作了精心修改。首先，增加了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实际早已成为美帝侵略越南、侵略世界的头号帮凶”的段落。指出苏联侵略“是它长期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必然结果。”其次，对在遣词用字方面一些不确切和不恰当的地

方，周总理作了纠正和调整。原来“狗急跳墙”，公然诉之于直接的武装侵略干涉一句，改成了“抛弃了‘马列主义’、‘国际主义’的一块遮羞布”，公然诉之于直接的武装侵略和干涉。后来，在“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前面又加上了“它的所谓”。这样一改，大大加强了讲话稿的政治份量，也更合乎总理的身分。原来是苏联害怕捷克摆脱它的控制会形成“连锁反应”，改成了“不可收拾的连锁反应”，既反映了霸权主义不可抗拒的颓败之势，也反映了这种趋势的不可避免性。“用刺刀制造傀儡”改成“用枪炮制造傀儡”。原来是苏联的侵略比希特勒侵捷和美侵越“有过之而无不及”，改成了同他们“一模一样”。原来是对美苏仍抱有幻想的人们是一个“极其深刻、极其沉痛”的教训，删掉了过头的形容词“极其沉痛”。此外，讲话稿还鼓励罗马尼亚“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斗争”。删去了原来的“坚决支持罗马尼亚人民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一句，而比较含蓄地改成了“中国人民支持你们！”最后，周总理还把外来的干涉和侵略“是可以挫败的”，改为“是可以击败的”。虽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

所有这些重要的改动和修辞斟酌，都是周总理在差不多两个钟头的短短时间里完成的。我们不禁为周总理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所深深叹服。

在招待会前仅剩的四、五个钟头里，稿子还要分送毛主席和当时中央领导审阅或核阅。其间，还要对付“四人帮”的刁难。先是陈伯达直接打电话给周总理提意见，然后姚文元又在稿子上批注某段“不够有力”。他还想越过周总理直接插手，批注“请主席定”。为了把稿子和活动安排定下来，周总理又亲自到毛主席处当面作了商议。

在我的翻译生涯中，这次翻译可说是最不同寻常的一次。翻译工作是同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同步进行的。由于讲话稿初稿被推翻，

我的翻译稿也随之作废。后来，由于时间的紧迫，几乎是周总理每有一点改动，某个段落或某个词的变动，外交部办公厅值班室随时就用一张条子传递给我。这样，传来一个条子，我也就跟着改一个条子插进去。因为讲话稿中有的词是引用列宁的话，原文是怎么说的，还要查原著。如“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关键性的词，其中的“社会”在外文原文里是单纯的“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因为这两种译法都是存在的。这可不容有差错。查找原著就更增添了翻译时间的紧迫。插进去修改的条子多了，前后顺序也来不及整理，更不用说在上场之前起码通读一遍了。由于招待会的时间到了，我也就拿了这么一堆“杂乱稿纸”，匆匆离开办公室出发去罗马尼亚使馆了。外交部办公厅值班室还交代说，到周总理讲话的时候，注意听，可能周总理临时还有改动，以周总理最后讲的为准。直到招待会开始后，我坐在周总理身后，一面翻译着周总理同杜马大使的谈话，一面抓住谈话的间隙时间整理翻译稿，总算把稿子的顺序理清了。

招待会前，我和外交部一部分工作人员赶在前面先到达罗马尼亚使馆，和杜马大使以及罗方担任翻译的公使衔参赞道洛班楚一起，在大使馆进门处等候周总理。罗马尼亚使馆所在的东郊民巷，两旁的古槐枝叶繁茂，树端相互搭连，形成浓密的树荫。树荫下汽车成行，摆满了整整一条街道。在大使馆古色古香的红墙隔壁，天主教堂高高的塔尖静静地矗立着，似乎也在等候着重要客人的来临。

这时，其余的应邀客人已陆续到达。人们似乎预感到要发生什么大事，所以今天的到客率特别高。几百人熙熙攘攘，在绿草茵茵的草坪上人头簇拥，三五成群，围着一张张摆满各种食品点心的小圆桌聚谈。苏联东欧的使节们和往常一样，总是聚成一个小团团，围在一起。苏联代办似乎当仁不让地以集团首领自居，显得特别活跃，东欧国家使节也看他的眼色行事。这时，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国家的外交官，都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猜测中国哪位领导人将是今天的主宾。

时近7点，周总理、陈毅和李先念副总理的车队，来到了罗马尼亚使馆。汽车刚在路旁停住，周总理便下了汽车。我也紧跟了上去，履行我的翻译职责。周总理在同杜马大使握手时，热烈祝贺了罗马尼亚国庆。然后，在杜马大使的带领下，穿过鲜花盛开的花圃，径直走入屋后招待会会场，走上一个临时布置的主席台。已经先期到达的郭沫若副委员长和黄永胜总参谋长见周总理到来，立即起身迎接。会场上宾客们见到周总理亲自出席招待会，气氛顿时热烈活跃起来。入座后，杜马大使问周总理，事态将如何演变？周总理说，两个核大国，要实行核殖民主义，要重新瓜分世界。捷克事件就是一个标志。周总理充满信心地说，不管侵略军扶植什么样的傀儡政府，捷克人民都是不会停止抵抗的。杜马也附和说，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接着，周总理满怀乐观主义地说，坏事变成了好事，苏联的占领激起了人民的不满。不管怎样，火点起来了，这是可喜的。周总理满怀深情地鼓励罗马尼亚人民说，你们现在处境困难，只要决心抵抗，号召人民，就有希望，他要动手就得考虑考虑。

这时，杜马大使请周总理允许他讲几句话。杜马大使在讲话中指责了苏联武装进入捷克，严重侵犯了一个民族的主权。杜马讲完话后，就请周总理讲话。周总理以稳健的步伐走向麦克风，会场立刻一片沉静，所有人的目光投向了周总理。周总理仅仅2000字的精辟讲话，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最新国际事态的基本立场，强烈谴责了苏联的侵略，坚决支持捷克人民反抗占领的英勇斗争，支持罗马尼亚捍卫独立主权的斗争。全场人的情绪都随着周总理讲话的抑扬顿挫而起伏。我遵循着翻译工作“信、达、雅”的原则，力求把翻译稿念得有声有色。当周总理以铿锵有力的声调谴责苏联早已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时，全场屏息凝气，情绪紧张

到了极点。果然不出周总理所料，这时苏联代办再也沉不住气了，在众目睽睽之下退出了会场。接着民主德国、匈、波、保的使节也尾随退了场。本来已经响起来的鼓掌声，随着他们的退场愈加响亮起来。周总理最后以高昂的嗓音喊出的“美苏必败！人民必胜！”的口号，更把全场的激情引向了高潮，掌声经久不息。周总理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讲话回到了座位，对杜马说，谢谢你给我提供了讲话的机会。杜马感激万分地说，你们的支持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周总理进一步鼓励说，主要还是靠你们，靠你们的决心，依靠人民，坚持斗争。你们能表示独立自主的态度，抵抗侵略和干涉是很可贵的，我们支持。

周总理的讲话立即在全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迅速传遍亚、欧、美各大洲。沉重打击了苏联霸权主义，支持了捷克人民反对外国占领的正义斗争，声援了罗马尼亚保卫独立主权的斗争。对此，苏联一方面骂中国“以导师自居，支持捷克的反社会主义反革命，想让社会主义各国互相冲突”；另一方面又对周总理讲话严密封锁，一切传媒噤若寒蝉，不透一点信息。但是，在捷克、罗马尼亚等国周总理讲话像迅雷般立即传遍全境，人们欣喜地奔走相告。中国驻捷克使馆的来信来访，应接不暇。有的人在电话里说：“感谢中国对苏联法西斯暴行表示严正立场”。一位捷克外交官说，“现在我们的朋友和兄弟向我们开枪了！只有中国才能给我们以有力的援助。”甚至去莫斯科订立城下之盟的捷克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也说，“周恩来讲活对我们在莫斯科谈判帮助很大，他发表讲话正是时候，也真有份量！”周总理讲话传到古巴，一位名叫彼德罗的古巴人说，中国党的观点非常鲜明正确，论据充足，无可辩驳，把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非常确切。在罗马尼亚，周总理讲话的第二天，总统和总理专门通过杜马大使向陈毅副总理表示感谢，并要求尽快同中国领导人会晤。毛雷尔总理说，周总理的声明是罗马尼亚

在最重要的时刻，得到的最重要支持。勒杜列斯库副总理说，“现在愈来愈多的人敬佩中共的远见卓识，毛泽东思想的路线胜利万岁！”一位群众来信说，我的祖国处在危急的时刻，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现在没有一个罗马尼亚人不在说，我们是同中国兄弟在一起的。罗马尼亚首都43名工人和知识分子联名写信给中国大使馆说，“中国对罗马尼亚人民的支持，使苏联的罪恶企图破产了！患难见知己，你们就是这样被证明是我们的朋友！”

8月24日清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门前的橱窗上，出现了一束无名人士放置的鲜艳花朵，在晨曦微风中频频点头，散发出无比的芬芳。这束鲜花，是中罗人民战斗友谊之花，也是世界人民对中国正义之举的感谢之花！

新中国初期的禁烟禁毒运动

白云涛

建国初期鸦片烟毒泛滥的严峻形势

首先,烟毒蔓延,烟民众多。据统计,到1949年解放前夕,全国种植罂粟面积高达100万公顷。^①烟毒泛滥严重的西南地区,烟地多达1545万亩以上,年产鸦片烟约12.3亿两,为此每年减产粮食35亿斤以上。在西北地区,陕西、甘肃是主要产烟区,在甘肃,据1950年6月不完全统计,仅皋兰、永靖等13县就有烟地12.3万多亩,其中皋兰一县有烟地6万亩。^②在东南地区,据统计,福建全省60多个县中,有建瓯、崇安、南平、古田、建宁、长乐、宁化等32个县种植罂粟,占全省总县数的一半。^③在华东地区,江苏、浙江二省,特别是原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由于烟毒泛滥时间久远,烟毒最烈。^④

烟毒泛滥必然导致烟民众多。据统计,在解放初期全国4亿多

① 任建新:《牢记历史经验,运用现行法律,为彻底扫除社会丑恶现象而斗争》,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

② 甘肃省公安厅政研室:《烟毒与烟政——甘肃历史上的禁烟禁毒》,见《公安史资料》1992年第2辑,第229—230页。

③ 福建省公安厅三处:《福建解放初期的禁烟禁毒》,见《公安史资料》1992年第2辑,第237页。

④ 参见南京市公安局史志组:《南京解放初期的禁毒工作》,见《公安史资料》1990年第1辑,第112—113页。

人口中，吸毒成瘾者多达2千多万。^①

其次，制毒贩毒猖獗，遍及全国城乡。据统计，建国之初全国约有鸦片毒贩30万人。^②全国各大行政区均有不少毒贩相对集中且活动十分猖獗的典型城市。据不完全统计，仅重庆、川东、川西、川北等地，就有毒贩1万多人。制造烟毒的，重庆有400余家，川东涪陵有60余家，川西有367家，西康有20多家。上述各家，有雇请技师使用机器大规模生产的，也有手工作坊式的小批量生产的。而烟馆之多更是惊人。以较大城市为例，昆明1187家，贵阳1015家，成都714家，重庆270多家，雅安263家。^③西北烟毒集散地西安，不但有为数众多的中小毒贩，还有许多使用汽车、火车走私的大毒贩。华东地区的福建省，毒贩活动最为猖獗的是福州、厦门、泉州、漳州和晋江、平和、长乐等市县，约有毒贩2千多人。另外，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均有活动猖獗的大量毒贩。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也有不少领导干部在贪欲驱使下贩毒牟利。另外，在建国之初，在反动毒贩的利诱下，我们的铁路和航运系统也有相当数量的干部职工卷入贩毒集团，从事贩毒活动。

烟毒如此泛滥，已经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烟毒禁绝与否，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威望、社会的安定、国民经济的恢复等根本问题。

^① 任建新：《牢记历史经验，运用现行法律，为彻底扫除社会丑恶现象而斗争》，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

^② 任建新：《牢记历史经验，运用现行法律，为彻底扫除社会丑恶现象而斗争》，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

^③ 以上西南地区贩毒、制毒、鸦片烟馆数字均引自：《西南区1950年禁烟禁毒工作总结》，见重庆《新华日报》1951年3月15日。

第一期禁烟(1950年2月—1951年6月), 以禁种禁吸和打击制毒贩毒为重点

一 政务院颁布禁烟通令

为了彻底禁绝鸦片,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1次会议通过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

《通令》共8条,其主要内容是:1、各级人民政府应广泛宣传毒品的危害,在烟毒较盛的地区,当地人民政府要提出限期禁绝烟毒办法,并设立禁毒委员会,保证禁毒工作进行。2、从1950年春季起,在已解放的地区禁绝种烟;未解放的地区,军事一经结束,立即禁绝种烟;在少数民族地区,应斟酌当地实际情况,采取慎重措施,有步骤地进行禁种。3、自通令颁布之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贩运、制造及销售毒品,违者从严治罪;散存于民间的毒品,限期交出。4、吸食烟毒者限期登记,定期戒除,否则予以处罚;各级人民政府卫生机关,应配制戒烟药品,对贫苦烟民免费或减价医治;在烟毒较盛的城市设戒烟所,戒烟戒毒药品的供应由卫生机关统一掌握,严防隐蔽形式的烟毒代用品。^①

《通令》发布后,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人民政府立即行动起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了具体的禁绝鸦片烟毒的办法和措施。中南军政委员会于1950年5月颁布了《中南区禁烟禁毒实施办法》,西南军政委员会于1950年7月颁布了《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华东军政委员会于1950年9月颁行了《关于决定查获毒品之处理办法的通令》,东北人民政府于1950年10月发布了《东北区禁烟禁毒贯彻实施办法》,西北军政委员会于1951年2月

^① 《人民日报》1950年2月25日。

颁布了《西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华北区也于同期颁布了禁烟禁毒实施办法。另外，烟毒泛滥较重的省市，如贵州、甘肃、内蒙古自治区、湖南、福建等省，贵阳、重庆、西安、南京、北京、天津等市，先后颁布了适用于本省市的禁烟禁毒条例。

二 禁烟禁毒运动的展开及其成就

1 禁种罂粟，铲除烟苗，断绝鸦片源头。

在中央人民政府禁烟通令发布后，西南和西北产烟大区抓紧在烟苗出芽的春耕时期展开禁种工作。1950年3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1950年春耕及农业生产指示》，特别强调严禁种植罂粟，已种植的强行铲除。各省、市、行署也分别向本地区发布严禁种植鸦片和铲除烟苗的布告，同时派出禁烟工作队赴各地“烟区”检查铲除烟苗工作进程。据估计，在1950年春耕期间，经过大量铲除，西南烟地由原来的1545万亩萎缩至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600多万亩。^①

在西北地区，种烟大省甘肃在《通令》颁布后立即行动起来，各级政府普遍组织工作组，下乡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铲除罂粟，至当年6月，全省共铲除烟苗11万多亩。1951年春，又铲除烟苗14.8万亩。^②

东南地区的福建省据种烟较多的福州、莆田、平和等25个县统计，从1950年到1951年共铲除烟苗1676亩又4万株。^③铲除烟苗的工作在一些地区曾遇到很大的障碍。在以种烟为生计的“烟区”，反动毒贩公开鼓动群众以武力抗拒铲烟。特别是在甘肃种烟

① 西南区禁烟禁毒委员会：《西南区1950年禁烟禁毒工作总结》，重庆《新华日报》1951年3月15日。

② 甘肃省公安厅政研室：《烟毒与烟政——甘肃历史上的禁烟禁毒》，见《公安史资料》1992年第2辑，第230页。

③ 福建省公安厅三处：《福建解放初期的禁烟禁毒斗争》，见《公安史资料》1992年第2辑，第239页。

最多的兰州湟惠渠区,在绰号“白蛇”、“黑蛇”、“五色蛇”等反动毒贩的主持下,当地群众制定了对抗政府禁烟法令的《种植公约》,准备了专人“坐牢”,大家保证“坐牢”者的家属衣食无缺。在“白蛇”、“五色蛇”的策划下,群众私自伪选了由毒贩组成的新城乡政府。毒贩把持当地城乡政权后,煽动群众集体出动,使用武力把被区署扣押的“黑蛇”劫回,气焰嚣张到了极点。对此,当地人民政府采取果断坚决的措施,抓捕了以“三蛇”为首的反动毒贩,最终铲除了烟苗。^①

在坚决铲除烟苗的同时,各地人民政府不误农时,帮助种烟农民改种当地适宜的农作物,并以贷款贷籽的方式,及时解决弃烟种粮的“烟农”所面临的紧急困难。在西南地区,为了解决烟农改种农作物的种籽困难,人民政府向大面积种烟的地区一次贷放了93万斤优质大米种籽。^②

据中央内务部的统计,到1951年春,在禁种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绩,其中东北地区除热河省偏僻地区查出烟苗242亩并当即铲除外,全区已禁绝种烟;西北的青海、宁夏两省除藏民游牧区外已无种烟者,甘肃消灭烟地60%以上,陕西减少烟地55%;华北绥远省铲除烟苗17.4万余亩,约占原种烟面积的80%;西南地区解放前原有烟地1545万亩,经大面积铲除,减到600万亩。^③

2 封闭烟馆,收缴毒品,打击毒贩,清除流害市面的烟毒。

在禁烟禁毒的重点西南地区,贵阳和遵义被定为禁毒示范区,同时各省、市普遍成立了禁烟禁毒委员会,区、县成立了基层禁烟

① 甘肃省公安厅政研室:《烟毒与烟政——甘肃历史上的禁烟禁毒》,见《公安史资料》1992年第2辑,第230页。

② 西南区禁烟禁毒委员会:《西南区1950年禁烟禁毒工作总结》,重庆《新华日报》1951年3月15日。

③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1950年的禁烟禁毒工作》,1951年4月。参见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1951年5月编印的《禁烟禁毒工作手册》第14页。

禁毒领导机构，一般乡村则成立了禁毒小组。在重庆、万县、成都、贵阳、遵义、昆明等大城市举行了数千人或数万人的群众大会，当众焚毁的烟毒有55.4万多两，打碎的烟具达20多万件。据不完全统计，在1950年的禁烟禁毒运动中，西南共破获制、贩、售、运毒案件万余起，抓捕案犯万余人，判处烟毒巨犯死刑者37人，有期徒刑1000余人，缴获烟毒94.8万多两，查封烟馆5400多家。^①

另一禁烟禁毒的重点西北地区，甘肃省从1950年起年年布置禁毒工作，发动群众铲除烟苗，组织瘾民戒烟。兰州、天水还成立了由各族人士组成的统战形式的禁烟禁毒委员会，以便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禁毒工作。烟毒泛滥重灾区西安市，1950年7月14日颁布了《西安市禁烟禁毒暂行办法》，规定吸食烟毒者立即向有关部门登记，限期戒除，拒不登记或逾期仍未戒除者，送戒烟所强制戒除。为促进禁毒工作，1950年10月召开焚毁烟毒大会，当场焚烧大烟1万两。1951年6月3日又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公审了一批烟毒犯，当场处决了2名大毒贩，焚毁烟毒6513两。从1950年7月到1951年6月间，整个西安市共破获烟毒案1361件，缴获毒品5351两。^②

中南地区湖南省的禁烟禁毒运动声势很大。到1951年底，长沙市共查获贩毒案件12起，收缴鸦片1万多两，取缔烟馆26处。湘西地区到1951年底共缴获烟土2万多公斤，其中烟毒为害最深的龙山县即达1万公斤。湖南省芷江县处3名罪大恶极的烟毒犯以极刑。^③在华北地区，北京、天津等华北六大城市1950年破获烟

① 西南区禁烟禁毒委员会：《西南区1950年禁烟禁毒工作总结》，重庆《新华日报》1951年3月15日。

② 西安市公安局公安史料征集研究室：《西安市禁烟肃毒运动》，见《公安史资料》1989年第1辑，第143页。

③ 肖栋梁：《民国以来湖南的烟毒与禁烟》，载中国现代史学会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

毒案达 8156 件之多,给猖狂活动的毒贩以一定程度的打击。^①

在华东地区,据不完全统计,从 1949 年 5 月南京解放到 1951 年底,整个南京市总计破获烟毒案 3671 件,抓获毒犯 3605 人,缴获鸦片烟土 2 万多两,烟膏、海洛因等其它毒品 600 两。^②

3 改造烟民,普遍戒烟,消除鸦片烟毒的消费市场。

为了改造烟民,督促戒烟,各大城市普遍进行了烟民登记工作,并以“公办”“私办”“互助”多种形式成立戒烟所或戒烟小组,实行集体戒烟。西南不少地区还成立了“反赌博、反抽大烟、反懒惰”的三反委员会,以监督烟民戒烟,强迫烟民参加生产。其中重庆一市就成立了戒烟小组 729 个。据川西、重庆等地不完全统计,1950 年先后登记的烟民有 3 万多人,当年戒绝的有 1.3 万人。^③

湖南芷江县 1950 年登记烟民 439 人,烟商 23 人。烟毒最烈的长沙龙山县七棚里耶,禁烟前 90% 以上的成年人吸毒成瘾,经过严厉禁吸,比例下降到 30% 左右。^④

西安市为便于开展戒毒工作,指令各区成立了禁烟肃毒分会,市政府还拨出戒毒经费 3 千多万元,成立了两个戒烟所,对生活贫苦的烟民实行免费戒毒。另外,群众还自发成立了 19 个互助戒烟所。截止到 1951 年 8 月,西安全市共有 3925 名瘾民戒除了烟瘾。^⑤

① 罗瑞卿:《一年来人民公安工作的成就和今后任务》,《人民日报》1951 年 1 月 1 日。

② 参见南京市公安局史志组:《南京解放初期的禁毒工作》,载《公安史资料》1990 年第 1 辑,第 116 页。

③ 西南区禁烟禁毒委员会:《西南区 1950 年禁烟禁毒工作总结》,重庆《新华日报》1951 年 3 月 15 日。

④ 肖栋梁:《民国以来湖南的烟毒与禁烟》,载中国现代史学会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⑤ 西安市公安局公安史料征集研究室:《西安市禁烟肃毒运动》,《公安史资料》1989 年第 1 辑,第 145 页。

据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统计,到1951年春,热河省吸毒瘾民1949年解放时有18万人,经过大规模禁烟,到1951年初已减至2万余人;察哈尔省1950年戒绝烟民3万人;绥远省的归绥、包头二市在已登记的9870名瘾民中,已有6518人戒除了烟瘾。其他各地的戒烟工作也日益形成社会运动,瘾民正在不断地大量减少。^①

总起来看,这一时期的禁烟禁毒运动,成绩是显著的。在禁种方面,西南、西北等汉民罂粟种植基地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除少数民族地区外,汉族地区以种烟为生计的“烟区”基本绝迹;在禁吸方面,在全国各大城市,特别是烟毒泛滥重灾区,公开的烟馆已经全部打掉,千千万万的瘾民戒除了烟毒,吸毒可耻和“禁烟就是救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打击毒贩方面,公开的毒贩有的被镇压,有的经过教育洗手不干,不少隐蔽的毒贩也被揪出,受到相应的惩罚。

然而,这一期禁烟禁毒运动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由于敏感的民族矛盾和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尚未进行民主改革,甚至尚未解放,使得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种烟、贩毒、吸食的问题没有得到基本的触动。二是由于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和惩治毒贩的政策较宽,且禁烟禁毒运动主要集中在春季铲烟和秋季禁种两个季度,没有深入持久地开展,致使大量毒贩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三是禁吸工作开展的很不充分。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经济严重困难,无法满足庞大烟民群体戒毒的医疗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鸦片烟毒易吸难戒,在烟毒和毒贩都没有肃清的情况下,禁绝吸食是不易彻底的。

^①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1950年的禁烟禁毒工作》,1951年4月。见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1951年5月编印的《禁烟禁毒工作手册》第14页。

第二期禁烟(1952年6月—1952年12月),以 打击制毒贩毒等各类毒犯为重点

一 鸦片烟毒在新形势下以新的方式的泛滥

第一期禁烟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一些明显的成绩后,不少地方干部滋长了“差不多了”的思想,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中,逐渐放松了禁烟工作的开展。1952年上半年,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运动中除揭露出大批不法资本家“五毒”罪行外,还查出大量的震惊全国的贩毒大案,暴露出以往禁烟禁毒运动的很不彻底和烟毒在新形势下以新的方式的严重泛滥,表明禁烟禁毒的形势仍很严峻。

到1952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暴露出的烟毒泛滥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第一期禁烟运动中漏网的毒贩采取各种隐蔽形式继续猖狂贩毒。

由于在第一期禁烟中对毒贩打击不够严厉,致使许多隐蔽的毒贩没有查出,不少公开的毒贩则转入地下。这些毒贩惯犯多,大贩多,罪恶史长,活动方式隐秘,贩毒手段狡猾。如南京大毒贩乔国良,自备轮船、汽车运毒,仅被查出的就达2412两,该犯直到1952年9月才被公审枪决。另一大毒贩朱启明,每次贩毒都乘飞机到香港大批收购,再由专人将毒品从香港护送到广州,广州又有专人负责护送到上海,到上海后再由专人运送到南京,这条严密的“地下运输线”直到1952年才被破获,朱犯也被处决。据统计,到1952年6月,南京仍有毒贩4440多人,为此受到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的

严肃批评。^①

除了上述的大毒贩,还有为数众多的中小毒贩。这些中小毒贩为贩毒可谓费尽心机:有的装在夹底箱内,有的藏在油篓里,有的灌在鸭子肚中,有的甚至把毒品用橡皮套封好后塞进肛门或妇女阴户内贩运。依附在大毒贩网下的以贩养吸的或以贩毒谋求微利的小毒贩,利用党和人民政府“烟民乃是受害者”的宽大政策,屡戒屡吸,屡吸屡贩,屡教不改。具结“犯案一人当,家属大家养”的各种小型贩毒联合体,再次沉渣泛起。

第二,铁路、公路、水路的国家公职人员贩毒严重,触目惊心。

一是在第一期禁毒运动中漏网的毒贩以“派进来”的方式钻入国家运输行业,以“拉过去”的办法将国家公职人员发展为贩毒分子。前者如太原列车段女列车员阎子云,其兄以制毒为业,家中配置制毒机械后,为利用铁路秘密运毒,特派阎子云入路工作。后者多以免费吸毒成瘾、巨额金钱贿赂、美色引诱等手段,将我公职人员甚至公安干警拉下水,为其贩毒服务。

二是“包下来”的旧的公职人员,恶习不改,继续贩毒,成为国家公职人员贩毒的主体。如南连香港、澳门,中连云贵产烟区,北接长江及各主要铁路干线,通渝、汉、沪、京、津的衡阳铁路,解放前铁路员工走私贩毒极为猖獗,解放后毫不收敛,另据北京旅行服务所、列车段、车辆段3个单位调查,在1193名行车人员中有229人走私运毒,比例高达20%;上海、广州铁路部门走私贩毒更加严重,其通车行车人员走私贩毒者达百分之百。^②

第三,奸商利用我党统战政策给予的政治地位和商业活动方

^① 参见南京市公安局史志组:《南京解放初期的禁毒工作》,载《公安史资料》1990年第1辑,第118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1952年4月29日。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第530页。

面的便利条件,大肆贩毒。

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区人民代表、武汉市市府委员、资本家贺衡夫,利用上述特殊身分,组织并领导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犯罪集团,从香港、印度走私进口大批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坑害国家和人民。^①走私吗啡、鸦片等毒品最为猖獗的广州市奸商,以香港、澳门为根据地,以广州为转运站,从水陆两线转运内地。陆路主要利用广州、深圳铁路,向通向全国各地的铁路支线渗透,销售对象主要是内地城镇的烟民;水路利用渔船和机帆船,走河海港汉,销售对象主要是沿江沿海城镇的烟民。据对 15 个走私犯的调查,广州解放两年来共走私进口鸦片(不含吗啡)4000 多两,其中奸商潘桂南走私进口鸦片 1700 多两、吗啡 102 磅,总值 10.2 亿元(旧币)。^②

二 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次颁布禁烟令

1952 年 4 月 15 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5 月 21 日,政务院再次颁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7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禁毒的宣传指示》。这些通令和指示所体现的禁烟禁毒的方针和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此次禁烟禁毒一定要消除第一期中单纯依靠政府和公安机关的片面做法,要大张旗鼓地充分地发动人民群众,形成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禁烟禁毒运动。

2 此次禁烟禁毒打击的重点是制毒贩毒的主犯、惯犯,特别是 1950 年以来仍然猖狂贩毒的现行犯和具有反革命身分的毒贩,以及严重违法的我铁路、交通、公安、司法、税务、边防、海关、邮政等内部工作人员。

① 《五毒俱全的大奸商贺衡夫》,《人民日报》1952 年 4 月 7 日。

② 《广州市奸商走私集团的罪恶》,《人民日报》1952 年 4 月 13 日。

3 对毒贩的处理采取严厉惩办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针,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即:制毒者、集体大量贩毒者从严,个别少数贩卖者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

4 在已经禁种的汉民地区,发现种烟者,严令铲除毁灭,绝对不准再种,违者严惩。对于数量庞大的单纯的吸食鸦片烟毒者,要利用社会舆论向其施加压力,逼其下决心戒除,但不作为运动中斗争的对象。

5 在少数民族地区,亦应宣传烟毒的危害性和人民政府禁烟禁毒的方针政策,但在禁种、戒吸和收缴毒品方面的工作,必须慎重地有计划地进行,一切须经少数民族代表会议协商同意。

上述通令和指示发布后,各大区及各省市立即响应,迅速下发了针对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具体的禁烟禁毒条例。195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中南局下发了《关于开展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5月3日,东北人民政府颁发了《关于根绝烟毒流害,处理贩毒分子的决定》。与此同时,西北军政委员会指示西北的禁烟禁毒工作以兰州、天水两市为重点,西南军政委员会确定以贵阳、遵义、安顺为禁烟禁毒典型示范区。在大多数被确定为禁烟禁毒重点的省市,如湖南省、福建省以及西安、武汉、桂林、南京等市,为加强对禁烟禁毒运动的领导,调整充实了禁烟禁毒委员会领导机构。调整充实的措施,一是由省人民政府的主席或副主席、各市的市长或副市长亲自担任该省或该市的禁烟禁毒委员会主任,以便加强领导;二是在禁烟禁毒委员会中广泛吸收公检法、工商、工会、妇联、政协、铁路、航运等各行各业主要负责人参加,以便各方面密切配合,共同打击毒贩。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第二期禁烟禁毒运动的领导组织结构为: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各地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直

接指挥,以中央公安部和各级公安局为主体,各级检察院、法院、宣传、工商、妇联、卫生、工会、政协、民主党派以及铁路、航运、邮政等各行各业密切配合,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

三 轰轰烈烈大禁毒

为了全面领导这场轰轰烈烈的禁烟禁毒运动,中共中央在明确规定禁烟禁毒方针政策的同时,还于1952年6月部署了具体的行动步骤,即整个禁烟禁毒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

1、从1952年6月到8月,基本属于禁烟禁毒的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各地区各省市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充分侦察,积极准备。

在发动群众和宣传党的禁烟禁毒政策方面,各地普遍开展了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禁毒宣传活动:编发禁毒简报,排演禁毒戏曲、快板、大鼓书,放映幻灯,举办展览。秧歌队,旱船队不断在街头巷尾巡回宣传。各地还普遍召开了干部会、各界人士协商会、群众座谈会、宣讲会、毒犯家属会,对毒犯的控诉会、公审会,以及烟民揭发会、毒犯坦白会,等等。

在西北禁毒重点省份甘肃,禁毒重点城市兰州、天水成立了统战形式的禁毒委员会,动员了3270名干部、学生和积极分子参加禁烟肃毒的宣传工作。宣传期间,先后召开居民小组、烟民、毒犯家属等群众会议5560余场次,受教育群众达32万人,其中兰州市民受教育面达82%。两市群众发动起来后,积极检举,共提供毒犯线索8739条。^①福建省在发动广大群众的同时,还对福州、厦门、泉州、漳州、晋江、长乐、龙溪、平和等8个毒情严重的市县的制贩毒

^① 甘肃省公安厅政研室:《烟毒与烟政——甘肃历史上的禁烟禁毒》,见《公安史资料》1992年第2辑,第231页。

品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初步统计共有大小毒犯 2179 人。^① 湖南省决定以沅陵、会同、永顺三个专区和长沙、衡阳、邵阳、常德 4 个市为禁毒重点。全省共抽调专职干部 3887 人,对 9 个市、84 个城关镇、203 个圩镇全面查禁烟毒。在禁烟宣传工作中,共召开群众大会 1.86 万次,受教育群众达 259 万人,全省共登记烟毒犯 1.93 万人。^②

就大区而言,此次禁烟禁毒的重点中南地区准备工作较为充分。据中南公安部报告,到 1952 年 7 月,经过细致缜密的侦察,中南区各主要城市的公安机关都对本市贩毒情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并立下了专案。其中广州立有贩毒专案 105 件,涉及毒贩 746 人,武汉掌握了大的贩毒集团 66 个,河南掌握大贩毒集团 30 多个,衡阳铁路局掌握贩毒集团 31 个,南昌立有贩毒专案 193 个。^③

2、从 1952 年 8 月中旬到 10 月,为大破案大逮捕阶段,在中央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各省市进行了集中的三次大破案大逮捕,一下子将反动毒犯彻底击垮。

1952 年 8 月初中央公安部召开全国禁烟禁毒工作会议,部署统一行动。在党中央和中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8 月 10 日前后,全国 1202 个禁毒重点地区开始了第一期大破案大逮捕行动,8 月下旬进行了第二期大破案大逮捕行动,9 月进行了以毒贩登记为主的第三期行动。^④

由于各省市发动群众和禁烟禁毒的准备工作进程不一,大破

^① 福建省公安厅三处:《福建解放初期的禁烟禁毒斗争》,见《公安史资料》1992 年第 2 辑,第 241 页。

^② 肖栋梁:《民国以来湖南的烟毒与禁烟》,载中国现代史学会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③ 中南公安部:《关于禁毒会议的报告》,1952 年 7 月 6 日。见《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第 545 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全国禁毒运动的指示》,1952 年 6 月 10 日。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第 539 页。

案大逮捕也有稍早稍迟之别。

最早开始大破案大逮捕的是首都北京市。8月9日夜12时，北京市公安局统一行动，一举逮捕毒犯328人。9月1日，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了有4万群众参加的公审毒贩大会，依法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毒品贩子。到1952年9月底，全市的肃毒运动基本结束，共捕获毒贩637人，登记毒犯8649人，收缴制毒设备10部、各种毒具700多件、毒品2300多两。^①

西安对毒贩的第一次集中逮捕是在8月11日。这日凌晨1时，由公安干警、政府机关干部和高中以上学生组成的抓捕毒贩队伍共2000多人一起出动，每4人一组，每组捕获对象一名，同时配备8辆汽车运送毒贩。在天亮前的5个小时中，共逮捕毒贩318人，占拟第一期逮捕432人的75%。8月22日晚展开第二次大逮捕行动，当晚逮捕毒贩146人。两次大逮捕沉重打击了毒贩的嚣张气焰，在随后的毒贩登记工作中，登记毒贩近1000人，要求坦白的近2000人。^②

中南全区的大破案大逮捕于8月13日开始。这一天，在全区121个禁毒重点地区同时展开大逮捕行动，7天内逮捕毒犯2192人，缴获毒品8540多两，收缴毒具1902件。^③其重点禁毒城市武汉在8月13日晚共派出210个行动小组，当晚逮捕毒贩206人。29日夜，市政府集中大批人力物力进行第二次大逮捕，当夜逮捕毒贩917人。9月9日下午召开公审大会，当场宣判了20名证据确凿的烟毒犯，其中判处2人死刑立即执行，其余各判1年以上

① 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公安史办公室：《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1948—1956）》，见《公安史资料》1988年第4辑，第139—140页。

② 西安市公安局公安史料征集研究室：《西安市禁烟肃毒运动》，见《公安史资料》1989年第1辑，第147—151页。

③ 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深入开展禁毒运动的指示》，1952年8月24日。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第547页。

15年以下徒刑不等。此举大大震慑了猖獗不可一世的毒贩。在人民群众广泛的检举揭发热潮和“逾期不登记加重处罚”的政策攻势下，毒贩为求宽大，纷纷登记坦白，当月全市共登记毒贩3236人，登记备查的历史犯4133人，主动登记的烟民5473人。到10月中旬武汉禁烟禁毒运动基本结束时，全市所掌握的毒贩竟达10241人，占当时全市总人口（128万）的0.8%强，后经核实审查，不够毒贩条件应免于处罚者占上述毒贩数目的80.5%。^①

福建省的大破案和大逮捕开始于8月14日。这一天，该省8个禁烟禁毒重点市县统一行动，一举侦破32件贩毒专案，逮捕233名毒犯，缴获鸦片2003两。24日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当日捕获毒犯73人，缴获鸦片3200多两，同时对贩毒情节严重，虽然证据不足但有可能逃跑的753名毒贩实行武装看管。9月上旬开始第三次行动，在群众已全面发动起来的有利形式下，大造舆论，迫使漏网的大毒贩和罪行较轻的小毒贩共3216人主动到人民政府机关登记。^②

南京对毒犯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中逮捕是在8月下旬，共逮捕360人，占原掌握数2543人的14%强，预捕毒犯无一漏网。9月初又进行了第二次集中逮捕，将那些假登记不坦白的、罪行严重的、兼有反革命罪行的惯犯、现行犯逮捕了350人，同时将273名情节较轻的毒贩集中看管起来。

就全国范围来说，这三次集中的大破案大逮捕，在上述1202个禁烟禁毒重点地区共发现制造、贩卖、运送毒品的毒犯近37万人，正式逮捕8万余人，占已掌握毒犯的22%。共缴获毒品（折合

^① 陈守谦：《武汉禁毒运动》，参见《禁毒全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415页。

^② 福建省公安厅三处：《福建解放初期的禁烟禁毒斗争》，见《公安史资料》1992年第2辑，第243—244页。

鸦片)近 400 万两,各种制、贩、运、藏毒工具 26 万多件。^①

3、从 1952 年 10 月到 11 月底,为审查处理和追缴存毒阶段。

1952 年 10 月 3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 153 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并迅即颁发各级人民政府实行,为审查和处理毒贩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在审查处理阶段,按照禁毒政策,各地普遍制定了作为内部掌握的“毒贩排队暂行标准”,对不同情节、不同表现、不同程度的毒贩作不同的处理。排队顺序一般是:不作毒贩处理且立即教育释放的“人网烟民”,不捕不罚的“小犯”“偶犯”,具结悔过的“从犯”,坦白较好且揭发有功而免于处分的“中犯”,不够逮捕法办资格但需交社会管制的“大犯”“主犯”,逮捕法办且判处徒刑甚至是死刑立即执行的“惯犯”“历史犯”“大主犯”“大现行犯”“反革命犯”等。排队结果一般都要交群众讨论核实,再经基层公安局研究,上报省市公安机关批准,最后召开群众大会公布。对判处各种徒刑的,特别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一律召开群众公审大会,以打击毒贩,教育群众。

经过两个月的审查处理,到 1952 年 12 月中旬,在正式逮捕的 8 万多名毒贩中,共处理了 51627 名,其中判处各种徒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的 33786 名,劳改的 2138 名,管制的 6843 名,教育释放的 3524 名,未报分类统计的 4337 名。^②

经过这一期轰轰烈烈的禁烟禁毒运动,在所有汉民地区基本禁绝了肆虐百余年的鸦片烟毒,改善了社会风尚,净化了社会环境,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为恢复

^① 罗瑞卿:《关于全国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1952 年 12 月 14 日。载《党的文献》1996 年第 4 期。

^② 罗瑞卿:《关于全国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1952 年 12 月 14 日。载《党的文献》1996 年第 4 期。

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期禁烟(1953年—1963年), 根绝少数民族聚居区烟毒

第二期禁烟禁毒运动结束后,还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大量吸毒者的戒瘾问题,二是农村存毒的收缴问题,三是偏僻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种烟问题。其中少数民族地区种烟吸毒问题尤为突出。为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2年12月12日颁布了《关于推行戒烟、禁种鸦片和收缴农村存毒的工作指示》,对少数民族地区禁烟禁毒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即“在少数民族地区,禁种、戒烟和收缴存毒等工作一律暂不进行。哪里可以进行,应该采用什么办法,在什么时候进行,由各大区公安部加以研究确定,报中央公安部批准后实施之。”

但是,各大区公安部在汉族地区禁烟禁毒工作取得根本胜利的鼓舞下,很快拟订了在本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展开禁烟禁毒的工作计划,经上报中央公安部批准,迅速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禁烟禁毒运动。于是,从1953年开始,少数民族地区的禁烟禁毒运动逐步开展起来。

甘肃烟毒产源之一的甘南,号称甘肃的“金三角”,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到1953年,种烟涉及3个县、4个区、40个乡、450个自然村,共1.1万多户,6万多人。1953年,甘肃省委省政府经反复研究,制定了“坚决禁种,慎重稳进,逐步根除”的甘南禁毒方针,决定藏区重点抓禁种,民族杂居区抓禁制、禁贩、禁吸。1954年6月,甘南禁烟委员会成立,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随即发布公告,宣布甘南全区全面禁烟禁毒。同时,甘南全区抽调汉族干部、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头人等300余人组成工作组、武

工队,分赴各产烟区开展工作。工作组和武工队深入产烟区时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在少数毒贩煽动下,一些地区集兵抗拒铲烟,阻截禁毒干部进村。党和人民政府在进行广泛充分宣传禁毒政策的同时,采取果断措施,抓捕了为首的破坏分子并绳之以法,坚决实行禁毒政策。到1956年底,全甘南累计铲除烟地38.5万亩,根除零星散种烟苗14万株,缴获烟毒1.2万公斤,使2411名烟民戒除了烟瘾,消除了西北的一大毒源。在禁毒过程中,人民政府一方面在宣传上充分发挥民族宗教领袖人物的号召力,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及时向“弃烟还农(牧)”的烟农发放生产补助款420多万元和救济粮29万斤,及时组织医疗队、贸易小组深入烟区,使烟区人民的生活和身体得到彻底的保障。^①

湖南省湘西地区历来以“匪多、枪多、烟多”著称于世。1952年8月,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开始在苗族聚居区实行有计划的禁烟禁毒运动,当年就在对于少数民族和当地工商界知名人士的烟毒问题采取慎重和宽大的前提下,对当地汉族的制毒、贩毒分子给予了沉重打击。1954年8月中旬到9月下旬,湘西苗族自治区进行第二期禁烟禁毒,收缴鸦片数万两,并逮捕了一批继续猖狂贩毒的毒犯(含苗族烟毒重犯)。1958年1月下旬至5月下旬,在湘西民主改革已经完成的基础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联合开展第三次禁烟禁毒运动,共逮捕烟毒犯181人,拘留124人,交群众斗争153人,集训2080人,强行送“戒烟所”戒烟1280人,收缴鸦片41655两,吗啡144两,鸦片烟种49两,另缴获毒犯枪支15支,子弹3557发。至此,湘西地区烟毒彻底肃清。^②

西南的凉山地区是彝、藏、汉等14个民族聚居区,是西南少数

^① 甘肃省公安厅政研室:《烟毒与烟政——甘肃历史上的禁烟禁毒》,见《公安史资料》1992年第2辑,第235页。

^② 余飞:《湘西烟毒与禁烟禁毒》,参见《禁毒全书》,第463—465页。

民族地区鸦片的主要产区。到1953年8月，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鸦片烟地占农业生产面积的60%。每年秋季收割后，彝民总是将大量鸦片运往汉区，换回牲畜、粮食和日用品。1953年冬，西康省公安厅领导凉山自治州公安处谨慎地开始禁烟工作。在反复宣传烟毒危害的同时，先是规定不许将鸦片运到汉区，遇到则劝其折回，并不没收；接着在制定公约后对仍然向汉区运烟的予以轻度惩罚，暂时封存其运往汉区的鸦片；随后在不影响民族团结的前提下，减少鸦片种植和在一些县城试行“禁止在街上公开买卖烟毒”的措施。1956年初，西昌专区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开始进行民主改革。1957年7月，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不种大烟多种粮食的决议(草案)》，决定在凉山全区开展全面的严厉的肃毒斗争。到1958年底1959年初，全州种植的鸦片全部铲除，同时收缴存烟5.6万两，大部分烟民经过戒烟而脱瘾。至此，完成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禁烟禁毒工作。^①

西藏阿坝地区的烟害很深，各县基本上40%以上的耕地种植鸦片，30—70%的人吸食鸦片，在土司和头人的操纵下，烟毒交易成为当地主要经济来源。该区的禁烟禁毒工作始于1950年，打击对象严格限制在少数汉、回烟帮，特别是汉族烟帮方面。1954年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运动开始后实行禁种禁吸政策，但一直采取谨慎缓进策略，到1959年底才在全区基本禁绝种植鸦片，到1963年底才基本收尽存留的烟毒。^②

就全国范围来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禁烟禁毒过程一般都是：一、首先清除少数民族聚居区内的汉族毒犯，为禁烟禁毒做示范，同时向少数民族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禁烟禁毒政策和民族政策，

① 孙兴盛、石堂熙、朱昌鹤：《禁烟禁毒在凉山》，见《禁毒全书》，第389—400页。

② 杨光成：《阿坝的禁烟禁毒》，见《禁毒全书》，第455—458页。

尽快地让少数民族人民认识到鸦片烟毒的危害。其中在彝族聚居区实行的“严禁汉区，限制彝区”、“惩办汉人，教育彝民”的方针，代表了人民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禁烟禁毒的政策。二，在民主改革尚未进行，少数民族地区旧的社会制度尚未铲除，少数民族人民尚未觉醒的时候，宁可允许烟毒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也不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行禁烟，而坚决实行谨慎缓进的政策。三，充分照顾少数民族上层和当地工商界知名人士，尽可能避免产生民族矛盾和民族隔阂。少数民族地区的禁毒，少数民族上层是禁种禁贩和禁吸的主要对象，直接涉及其切身利益。为了避免民族矛盾，一切禁毒工作都要经过少数民族上层；抓住的少数民族毒贩要交给当地土司、头人自行处理；在土司管辖的藏区禁种要与土司、头人协商，逐步实行禁种，不得操之过急；焚毁收缴的烟毒也同土司、头人商谈，取得同意后实行；所有禁烟禁毒法令都在取得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同意后实施。四，充分展开宣传活动，促使少数民族人民觉悟起来，自觉禁种，自觉戒吸。五，宣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相结合。当然，对少数顽固不化的毒贩也予以了必要的打击，并逼迫其在民主改革过程中接受党和人民政府的禁烟禁毒政策。总之，少数民族地区的禁烟禁毒工作，在民主改革的保证下，始终坚持谨慎缓进的原则，期以十年，终于完成，从而实现了在大陆禁绝鸦片烟毒的彻底胜利，使新中国成为世界著名的“无毒国”。

从清华大学的两派谈“文化大革命” 群众组织结构、功能

唐少杰

1967年4月,清华大学置身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广大群众分裂成为井冈山兵团(以下简称团派)和“四一四”(以下简称四派)两大组织。两派各自集中地代表了“文革”两大群众势力。两派不仅在“文革”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和论战具有鲜明而又独特的典型性,而且在1968年4月下旬至7月底进行的震动全国的“百日大武斗”,直接而又深刻地影响了“文革”的进程。本文旨在展现两派的诸多方面,以求探索“文革”群众组织的结构、功能,从而有益于学术界同仁对“文革”群众问题研究的深化。

一、清华大学“文革”两派——井冈山兵团 和“四一四”——的建制和报刊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建制是在1966年底1967年初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兵团的正式领导机构是总部委员会,蒯大富、韩银山、鲍长康、刘才堂、马小庄、陈育延,陈继芳、任传仲、王良生等任常委,后来是四派领导人之一的孙怒涛曾任过常委。这一班常委组成人员变化不是较大。总部委员会表面上实行集体负责制,而且没有设立过主任委员一类的职位,但实际上,蒯大富作为兵团及其总部委员会第

一号人物是没有疑义的。除韩银山为原校行政处干部外，全部常委皆为在校学生。在1967年6月之前，至少在团派与四派形成对峙格局之前，这一总部委员会实际上临时全权负责清华大学的日常领导工作，即成为当时清华大学的领导机构。

兵团总部(后来也就是团派总部)下辖总部办公室、作战部(又称一部)、政治部、后勤部等常设部门。每一部门都由其核心组负责领导工作。

总部办公室设有秘书组，电话组，常务组，资料组。

作战部设对内作战部和对外作战部。对内作战部下辖办公室，部队^①发放组，保卫组，第三办公室(简称“三办”，负责专案)，斗争蒋(南翔)兵团，大行动组，大批判组；对外作战部下辖办公室，社会调查组(又称“动态组”)，该组分为“一动”(兵团动态)、“二动”(校内及四一四动态)、“三动”(中央首长讲话及北京动态)、“四动”(中学动态)、“五动”(军事动态)、“六动”(国际动态)六个小组，全国联络站，该站分为办公室、资料组、东北组、华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等。

政治部设有办公室，宣传部，学生工作部，教工工作部，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即干部办公室)，组织部等，每一部门还有下属分支机构。

后勤部设有办公室，科技组，财务组，生活组。

兵团(或团派)的组织建制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上述机构及其下辖部门的成立时间、沿革变化等也是有所不同的。必须提及的是，在兵团建制史上，还出现了在团派保卫组领导下的一个生存较短的组织“一科”，这一组织是仿照30年代中共中央“特科”而设立的，专门负责“文革”初期抓所谓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等。

^① 系、处等单位的代号。

根据某些特殊情况,兵团(或团派)还设置一些应急机构,诸如文攻武卫指挥部、“罗文李饶”专案组、吕应中专案组、斗私批修联络站、遵义学习班(学生学习班分部)、半型关学习班(干部学习班分部)、六二四战团以及在武斗期间为武器生产而设置的“国防工业办公室”、校防科委、军需办公室等。

兵团的组织建制还把各系、处等单位按军事编制划为 01 至 15 部队(一度扩为 20 部队)。各部队由数目不等的战斗组(队)构成。这些以革命术语或红色词句(如“契卡”、“刺刀见红”、“云水怒”、“战地黄花”、“风雷”、“不怕鬼”、“二万五千里”、“指点江山”、“第一红岩”、“照妖镜”、“浩浩荡荡”、“岿然不动”、“冲霄汉”、“打落水狗”、“第一号炮”、“老实话”、“党同伐异”、“千钧棒”、“井冈志”等等)命名的战斗组(队),由人数不等、关系相对松散而志向相同的成员组成。一些战斗组实际上只有一个人,即一个人拉起一个战斗组,冠之一颇有特色或意味的名称。战斗组的存在时间长则半年数月,短则只为了某一次行动及某一次大字报签名之用。战斗组的数目由于此消彼长,不断分化和组合,恐怕永远无法确定。然而,众多战斗组红色的、革命的或准军事化的甚至暴力性的名称都生动地反映了“文革”话语体系的特征和属性。

兵团群众性组织主要有以学生为主的 28 团和以职工为主的“清华大学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清华工总司”)等。

兵团的宣传机构有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广播台,井冈山通讯社,井冈山杂志社,前哨广播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它们主要是由兵团宣传部来负责的。

兵团在不同时间出版并在不同范围发行的刊物有:《井冈山》报,《井冈山》杂志,《井冈山通讯》,《文化大革命简报》,《学习资料》,《理论批判》,《整风简讯》,《大字报选》,《内部资料》以及各动态组的有关动态简报等。这些刊物是由兵团总部不同部门主办的,

其中有的刊物不仅信息量大,选题广,而且在当时的北京及外地都颇有影响。

作为兵团报刊的《井冈山》,铅印8开版,共出版了157期以及10多期“专刊”、“特刊”、“合刊”,约每周出2期,每期最多时发行约50万份,从1966年12月1日至1968年8月9日共持续了20个月左右,成为通过邮政系统在全国发行的一份著名的红卫兵及群众组织的小报。“文革”初期,包括《井冈山》报在内的红卫兵及群众组织的小报是当时中国报刊发行领域里的一个“奇观”。因为“文革”开始后不久,大多数城市晚报性的、文艺娱乐性的或专业性的报纸被封闭,剩下公开发行的各省、市、区一级的报刊大多是转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这些所谓“文革”著名的“两报一刊”的内容,不敢越雷池一步。“小报”者,大多指以小8开版面出版的,在编辑、发行上没有正式的“大报”那么多限制的群众性的报纸。当时的“文革”运动还没有对这种“小报”的编辑、发行作出什么明文的限定,这种由群众组织主办的“小报”自行决定其内容,敢于炮打除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外的任何人,对本地区、本单位(或部门)的所谓走资派以及与己对立的群众组织更是不在话下。

斯大林说过,党报要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组织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群众“小报”起到了把“文革”群众运动加以宣传和组织的作用,因为这种“小报”是比“文革”大字报等流传更广、保存更久、影响更大的传播媒介。在“小报”的背景或背后经常显出的是“文革”政要的鼓动和利用,经常会出现一些在“文革”大潮中引起狂澜的文章,也经常给广大群众透露出前所未有的消息或者显露出蛛丝马迹般的新动向。总之,“文革”“小报”比起当时的有关正式文件、社论等具有它自己不可磨灭的、独特的文献价值。具有上述特点的《井冈山》报不仅是当时上至毛泽东下至平民百姓所关注的一份“热门”报纸,而且给“文革”在全国各地的不同

发展,特别是给一些地区“文革”群众运动及群众心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例如,正是经过《井冈山》报作为“反面材料”的登载,“四一四思潮”才在全国一些地方传播开来,也才会成为由毛泽东本人所关注的、著名的群众性思潮。

又如,刻板油印的《井冈山通讯》在其发行的一年半左右里,出版了近千期,常常是一日数期,还有各动态组分门别类出的数百期动态简报。这些刊物的内容包括校内到校外,中央兼地方,工农商学兵几乎各界的“文革”动态和东南西北中几乎各地的“文革”情况。这些刊物表明,兵团重视“文革”信息或情报的收集、整理工作,特别重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及有关负责人的讲话、指示,力图通过自己的刊物所造的舆论声势来加强自己的形象和扩大自己的影响;进而还表明,兵团(或团派)在建有较全的政治、宣传机构的同时,也拥有较发达的、辐射全国的信息机构。这在“文革”初期群众组织中是极为罕见的。无疑,这些刊物是“文革”初期运动的某种见证,它们对于研究清华大学乃至全国“文革”初期的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四派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建制是在“414 革命串联会”核心组的基础上,于1967年5月底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四派由其总部领导,总部委员有沈如槐、孙怒涛、陈楚三、刘万璋、汲鹏、宿长忠、张雪梅、蒋南峰、周泉纓、李秀芙、傅正泰、谭浩强等54人。

四派总部称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下辖总部办公室、作战部、干部办公室、宣传部、组织部、保卫组、干部参谋组、斗蒋(南翔)作战部、政治部、行政管理总勤务站、斗批改办公室、群众接待站以及后来的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等。

作战部设有第一作战部(负责北京地区及校内),第二作战部(负责大批判),第三作战部(负责全国),下辖办公室、资料组、军事组、东北组、华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等。

宣传部设有动态组、简报组、广播台、报纸编辑部、发放组。

四一四总部尽管在规模上小于团派总部，但它十分重视基层建设，在基层单位共有 12 个部队（称 01 至 12 支队）和较完整的分部机构。四派的群众组织主要是以学生为主的东方红战团和以教工为主的二七战团，还有一个以干部为主的干部辩论团。四派的最盛时期自称有 7000 人。

四派在不同时间出版并在不同范围发行的刊物有《井冈山报》、《四一四战报》、《情况简报》、《井冈山参考资料》、《大字报选》、《清华 414 通讯》、《教革》、《联合风暴》、《满天红》、《重要文件》等。

四派的刊物在创办时间上迟于团派刊物，在发行数量上也逊于团派一筹，在选题范围、信息含量等方面难与团派刊物平分秋色。在报道有关校外“文革”情况时，两派刊物常常雷同。只是在涉及到清华“文革”形势与两派各自的利益和见解时，两派刊物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两派刊物常常是“互补的”，即在一方的偏颇之处可发现另一方的特色。这种互补性是“解读”整体意义上的井冈山兵团史和清华“文革”初期历史时应重视的方面。

的确，类似团派即造反派的报刊更多地是指向“文革”全局，四派即保守派的报刊更集中地是指向团派即造反派们所代表的极“左”势力。四派刊物的主要特点是以团派为代表的造反派思潮和观点为目标，在当时相当深刻而又淋漓尽致地加以批判和分析。四派刊物对团派一系列主张和行径从理论上的批判，具体而又真切地体现出“文革”中两大类的不同群众及不同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和分歧。特别是在涉及清华“文革”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四派刊物坚持与团派刊物“对着干”的方针，给团派的种种思想和倾向作出了有力的反面的评注。清华“文革”两派的刊物，不仅从它们的诸多数量品种上，而且从它们的思想内容和理论风格上，都给人们研究“文革”群众斗争及群众分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活标本”。

这里,用“建制”一词代表清华“文革”两派组织的结构,主要是说明两派组织结构已不是一般社会群体或系统组织的结构,而是带有准军事性的或准军事化的结构,即按照军队的编制和建制来组成自己的体系及队伍。两派都以“作战部”来指称自己在“文革”运动中的日常“业务”领导和协调机构,印证了“文革”群众组织具有相当强的自我组织的能力和相当高的运行与反应的效率,同时,还有与这种准军事化形影不离的、根深蒂固的专制性和暴力性。总之,“文革”群众组织的结构或建制在数千年中国所有社会群体或群落中是极为罕见的,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下去的问题。

二、“文革”群众组织的界定和功能

关于“文革”群众组织的界定,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一界定涉及到“文革”群众组织的性质,也关系到由“文革”群众组织的结构而来的功能。这里,基于对清华“文革”两派的个案考察和分析,作出一些探索性的论述。

首先,群众组织的界定是以对群众的界定为前提的。从社会心理学来看,“群众”是指“人们彼此由共同的情绪状态或注意对象而维持联系的无组织的、偶然的、暂时性的聚合。群众是由某种客观产生的社会情势而形成的”^①。社会心理学强调的是因情绪感染的相互增强而导致的循环反应成为形成群众的主要机制。从“文革”中不难看出,情绪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是群众形成和群众活动的重要方面。由群众而形成的群众现象也是一种“无组织的人群由于对某一情景的共同体验而产生的比较一致的社会心理现象,如暗

^① 朱智贤主编:《心理学大辞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9页。

示、模仿、从众、定势、舆论、愤慨、感染、气氛、谎言、竞争等”。^①

群众现象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在于：当个人集合为群众时，随之带来的是自觉个性的退化或消失，无意识个性占据优势，情感冲动上升为主导地位。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期群众心理的有关学者指出，人群中各个个人的情绪和观点取得了相同的趋向，代替个人人格的是集合心灵，人们的观念倾注于一个相同的方向，并且可能立即转化为行动的趋势。当个人成为群众的一员时，其文化程度会随着认同群众心理而有所降低，并且难以控制自己的地位或行为^②。这也使得在群众中，群众总是大于或高于个人。

在“文革”初期，群众以及群众组织大都按照单位（或部门）和地区来划分，不存在跨地区、跨行业的群众组织。从社会学上来看，“文革”群众组织无一例外地都是“小社会群众”。由于“文革”群众组织所进行的活动主要是依赖于“文革”群众生活和工作的具体单位或特定地区，这使“文革”群众组织一般带有如下特征：1、群众之间有联系的纽带；2、有共同的目标和活动；3、有群众性的特殊规范；4、有组织意识。然而，“文革”群众组织却不是某种“集体”^③。“集体”本身的目的性、整体性和自觉性以及形成“集体”本身的内聚力远远大于一般群众组织。相对于“集体”，“文革”群众组织更多地是集体成型前的某种松散的群体。

其次，“文革”群众组织不是由群众自主地产生的，而是在“文革”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由于“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鼓励和支持而产生的，并在昔日的党政机构权威自上而下地弱化的形势下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文革”群众组织对“文革”本身的认可和依存

① 朱智贤主编：《心理学大辞典》，第519页。

② 朱智贤主编：《心理学大辞典》，第520页。

③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是其存在和运行的首要条件(“文革”时期几乎没有出现过反对或否定“文革”的群众组织),这使任何一个“文革”群众组织都必须在“文革”运动的轨道上运行。所有“文革”群众组织面对的问题是:不是要不要或有没有“文革”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文革”、如何阐释“文革”的问题,甚至是排斥其他群众组织而“占有”或“独霸”本单位(或部门)和本地区的“文革”的问题。正是由此,“文革”群众组织的不同直至对立都是基于“文革”自身的矛盾和危机。

当然,“文革”群众组织与任何其他群体相比有一个显著特征:无个人性,即组织成员的个人及个性、人格等汇合于或消失于群众组织之间,代之以组织的心理和行为,代之以组织总是有大于或高于个人的主导趋势和状况。我们不难发现,“文革”群众组织的名称几乎都是无人称的,都是冠之于无个人性的政治名词或红色概念以及重大事件的日期等等。“文革”群众组织的群众无意识心理和行为吞没或同化了成员个人的自觉和品质。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众多的个人只有结合成群众(不一定是群众组织),只有把个人的感情和观念投注某个群众所共同认可并且使个人具有安全感和依赖感的行为的共同方向,哪怕是暂时的、难以明确的,才能使个人在某种程度上缓解或摆脱恐惧、孤独、被歧视甚至被迫害。即使是所谓“文革”“逍遥派”也不是否定或脱离“文革”,而是同两派群众组织保持一定的距离及不介入的态度。一定的群众组织可能给个人暂时建立起的保护屏决定了个人与群众组织的特定关系,个人与群众组织所共有的荣辱、安危会使个人不加迟疑地把自己的内心转换成组织的观念,以求得保护和发展,甚至连每一成员个人的行为、思考、时尚、话语等也被自己的组织加以规范化。

然而,“文革”群众组织成员个人的“组织性”又是非常松懈的。在清华两派那里,真正强硬即“铁杆”的成员,两派各自也只有数百人,这些人在清华当时被分别称为“杆团”、“杆四”。因为,当某一群

众组织过分的激进或其偏激行为有害或有悖于个人的生存和生活时,个人往往会采取一种消极无为的、逍遥观望的态度。显然,个人倾向或加入某一群众组织是某种心理的认同和价值上的重合。个人对于群众组织来说进退相对自愿、取舍相对自便,这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利益和现实生活是否由群众组织所实现、所保证。群众组织只不过是把群众个人的心理情绪加以大众行为化,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并在“终极意义”上解决群众个人的根本需求和根本利益。因而,不难理解,为什么愈是到了“文革”群众运动及群众组织后期,处于逍遥派或观望者的群众愈益增多。例如,在百日大武斗前夕,脱离了兩派的“逍遥派”群众已达清华师生员工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在百日大武斗期间,全校 14700 多名师生员工,在校置身于武斗的约有 600 人,而 14000 多人纷纷离校,躲避武斗。在此意义上,两派在大武斗期间也渐渐失去了广大群众。“文革”群众组织到头来成为非群众性的派别组织了。这真是莫大的历史讽刺。

探讨“文革”群众组织的功能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系统(或组织)具有结构,结构产生功能。“文革”群众组织寓于“文革”大系统之中,这使我们考察“文革”群众组织的功能立足于它与“文革”的互动所造成的客观后果。这里,简要谈一下“文革”群众组织的内功能和外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正功能和负功能。

外功能和内功能:也可称外在功能和内在功能,或者称为对外功能和对内功能。作为“文革”特殊的政治——文化组织,“文革”群众组织的产生、生存和发展,至少从表现形态上过多地依赖于这种组织所寄生的“文革”政治——文化环境。这一点决定了每一“文革”群众组织与整个“文革”的互动、与其直接对立的其他群众组织的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重于或高于该群众组织自身内的所有方面。这一点也常常使得每一个群众组织把能否使自己与整个“文革”协调起来、把能否从根本上使与己直接对立的其他群众组

织加以制约,当成自身组织能否安身立命的功能即外功能。这种功能的一个根本方面还在于:“文革”群众组织把自己对与其之上的“文革”权力机构及权威势力的依附或对峙的关系,当成其组织的价值与直接目标的重要内容。

从清华两派的组织结构及有关活动中可以看出,“文革”群众组织的对外职能部门远远多于或大于其对内职能部门。“文革”群众组织的内功能屈从和服务于其外功能。例如,团派在大武斗之前和期间的数次“整风”活动,简言之,就是力图巩固自己的“文革”地位和压倒四派。不同于其他历史条件下群众组织的内功能决定其外功能,“文革”的群众组织的外功能决定其内功能,这不能不是“文革”群众组织的畸形之一。

潜功能和显功能:如果说“文革”群众组织的外功能大于其内功能,那么其潜功能又高于显功能。显功能是指“文革”群众组织那些有意造成并可以认识到的后果,而潜功能是该组织自身活动并非有意造成的、难以认识和无法预料到的后果。对“文革”群众组织所处的“文革”大系统而言的性质和局部,显、潜功能的划分又有相对的不确定和相互转化。一个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同是在1967年8月,四派在上旬提出了著名的四一四思潮,这一点是四派显功能之体现,但在下旬,却有四派部分群众参加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活动,事后连四派许多头目及广大群众都认为此次活动是一项蠢举。表面上看来,这是四派某些人为了投机而“捞一把”,但在功能上体现的正是四派的潜功能。显、潜功能往往在表现上围绕着“文革”大系统不同时期的事项及其转换而定,甚至还会根据群众组织之上的权力机构的任务来裁定。然而,“文革”群众组织的显功能是相对弱小的,而其潜功能常常格外巨大。在一些情况下,“文革”初期的某些势力倚重的就是“文革”群众组织的潜功能。而对群众组织来说,潜功能在许多场合又是他们亲手造成而无法控制的、

具有异化特性的功能。例如，清华两派开始都未意识到他们进行百日大武斗会有如此惊心动魄、残酷不堪的后果，特别是团派决没有意识到它所发动的百日大武斗给自己带来的是灭顶之灾。

正功能和负功能：对系统或群体的整合或内聚有贡献的是正功能，而推助系统失效或群体破裂的则是负功能。“文革”群众组织的正、负功能是相对于“文革”系统和相对于它自身分别而言的。从总体上来看，四派对“文革”的负功能远多于团派，当然这不排除在局部上团派的负功能也会多于四派。就各自组织而言，两派的正、负功能都有其特殊的情况，但都直接受制于对方组织的影响和干预。两派的正、负功能尽管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在性质上颇为近似。例如，它们各自都力图以某种准军事化组织和准政权组织来整合自身。

“文革”群众组织的功能所显示出的特殊之处就是外功能高于内功能，潜功能大于显功能，负功能多于正功能。无论是“文革”群众组织功能的总和还是内外功能、潜显功能、正负功能的差值都是“文革”本身所固有的或所需要的。即使在“文革”群众组织诸多的选择、置换、替代——发生甚至——消失之后，“文革”既可在初期无序进行，又可在后期相对有序地发展。因而，“文革”群众组织的功能对于“文革”来说不是安身立命之类的东西，而是使“文革”在其初期兴起和成型的“杠杆”一类的东西。因为，“文革”本身确定了“文革”群众组织可追求的目标和可拥有达到上述目标的手段，一旦“文革”不断改换的目标与“文革”群众组织的结构和功能（作为手段）发生脱节，“文革”处于“失范”（anomie）和“文革”群众组织陷于危机就难以避免，“文革”的转折就势在必然。

如何划分群众组织，即如何界定“文革”群众组织的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这是“文革”研究中的一个颇为复杂而又棘手的问题。

国外学者对于“文革”造反派与保守派的界定过多地是从“文

革”前群众阶层的社会区分以及不同群众阶层的结构来考察,根据社会冲突的理论来概述两派的对立与分歧^①。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从造反派内部的分化和分裂来考察两派的划分和对立,这大大开阔了对“文革”群众两派历史内涵的视野^②。的确,类似“文革”中没有什么变动不居的东西,如“文革”“阶级斗争论”有多种“版本”和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有多种“形式”,“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也是随着文革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清华,从最初受工作组压制的学生群众与以干部子女为主的红卫兵造反派(“老红卫兵”)的位置仿佛在1966年10月左右调了个,昔日所谓“右派”学生变成了最激进的造反派,而昔日打着“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③旗号的老红卫兵们都变成了“老保”及“保爹保妈派”。同源于1966年底的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的团派和四派,到了1967年5月底已势不两立,到了1967年底之后,这两派已成为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器的造反派和保守派。

那么,什么是“造反”?什么是“保守”?“文革”时期的“造反”决不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传统的农民起义和反抗来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社会变革,而是在“文革”特殊形势下特定的反社会体制和反政治权威的群众激进行动。这种造反可能既是政治动乱又是社会动乱,但决不是什么社会革命以及所谓“改朝换代”的社会质变。“文革”时期的“保守”只是相对于“造反”而言的,“保守”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只是对“文革”的策略、主张和做法有所保留、有所怀疑,而不采取极端或激进的态度和做法。“文

^① 华林山:《文革期间群众性对立派系成因》,《政治迫害与造反运动》,载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事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208页,第219—230页。

^② 徐友渔:《再说文革中的造反派》,同上,第209—218页。

^③ 《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

革”时期的“造反”与“保守”近似于法国大革命而来的政治学意义上的左派与右派、激进派与保守派之分。但是，“左”与“右”之分在“文革”之前和“文革”之际已发生了重大的转换，昔日的“右派”往往变成今日的“左派”，而昔日的“左派”一时沦为今日的“右派”。“左派”与“右派”的沉浮，“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兴衰，常常令人眼花缭乱，一领“风骚”三五个月的情况，比比皆是。如前所述，“文革”群众两派的问题实质上是在“文革”大目标下如何操作和由谁掌权的问题。实际上两派既相互反对、否定、排斥、分离、对立和斗争，又相互依赖、联结、吸引、转化、共存和统一。具体到清华两派而言，“造反派”与“保守派”之分既有置于政治实用主义之上的混同，也有惯于玩弄政治功利手法的沟通。例如，两派各自为了自身的权力和利益，都出现过一些出尔反尔、丢卒保车、抛出个别而保全派系等功利主义的东西；并且为了自己的大局和名声，都干过共同批斗一些所谓走资派人物、共同上街游行示威等机会主义的行径。例如，两派都参加了1967年7月下旬至8月初在中南海西门由北京上千个单位组成的所谓“揪刘（少奇）火线”。两派在参加这一共同活动时，在中南海门外还不时恶语相交，拳脚相加。在不触及和不违反自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两派都经常显示出摇摆、无所适从之类的特征，更有一些人如鱼得水般地“穿梭”于两派而进行“钻营”。

到了1967年初，“文革”群众组织，既有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对立，也有两派各自内部的分化，十分明显的是，造反派内既有激进者与温和者之分，更有两派的交叉、渗透和部分重合。所以，纯粹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分是不成立的，因为大量出现的情况是两派对“文革”的一些理论、策略和行径等有所认同。但是，一旦涉及到两派各自的根本利益时，并由此所带来的对“文革”的态度、理解和动作等就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进而，为从整体上研究并从本质上把握“文革”群众组织，“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划分还是可行的。同

时,必须指出的是,从1967年初开始,造反派内部的分化已超越了过去的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对立,并上升到“文革”群众运动的主位。造反派内部的分裂使新一轮的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从“文革”自身中演变出来。在此意义上,四派与团派都是造反派,但四派却又不是极端的或激进的造反派。从1967年春由造反派中分化出来,四派无论在观点上还是在行动上迅速与昔日的保守派重合,并使整个保守派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形态。

清华“文革”两派的对立表明:以团派为代表的所谓造反派是“文革”的中坚力量。造反派的产生既直接得益于“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意图和支持,又符合“文革”自身的性质和要求。造反派念的是“文革”理论的“真经”,行的是“文革”实践的“真髓”。坚持“文革”理论和进行“文革”实践是造反派的价值之所在。没有造反派,也就难以有“文革”。若是没有造反派,“文革”很难成为全国规模的、关系到亿万人民生活的群众性运动,很难成为触及到社会制度、国家政权及全民心灵的“大革命”(或曰“大造反”)。反过来说,没有“文革”,也就没有造反派。正是由于“文革”,造反派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史上和世界政治文化史上极为罕见的社会体制内的“反体制派”,成为被“文革”最高领袖一时所许可或甚至所鼓动的反现行社会权威的所谓“群众反对派”。“文革”“造反派”大致可定义为拒斥过去本单位(或部门)和本地区的政治领导体制、否定已有的干部权威、倾向于推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的激进群众。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异常偏激和极端反权威性,致使它自身走向消亡。造反派问题是“文革”的一个缩影。

以四派为代表的保守派是“文革”所谓的“修正主义”(从“修正主义”一词的原意来讲)力量。不管是在“文革”大局还是在其某一局部,四派乃至保守派都不可能原原本本地接受“文革”理论,都不可能完全被“文革”实践所整合。保守派在行动和心理上总是与“文

革”保持某种距离，至少保守派对“文革”的理解与运作不是与“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以及与“文革”有关领导权力机构相吻合，而总是有“偏差”甚至“摩擦”。更主要的是，保守派与造反派愈益激化的矛盾以及二者在后期所进行的殊死冲突，每每使“文革”初期的发展不但不同于造反派的期望和努力，而且从总体上或局部上有悖于“文革”的方针和目标。保守派问题紧紧地附着造反派问题。它如同魔影，不仅与造反派同生，而且与造反派共亡。通过与造反派的直接对立和生死较量，保守派所表现出的对“文革”的疑虑、困惑、批评和失望，不断从思想上销蚀着“文革”理论，从实践中动摇了“文革”的正统权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文革”在头两年所形成的群众斗争的高潮发生了历史性的波折。

重庆“一二四”事件

何 蜀

—

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彭真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

不到一个月之后,又一个市委第一书记遭到公开点名批判: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不经过任何组织手续,采用在文章的注释里点名的手法,批判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市长任白戈。

在这期《红旗》杂志上,以当时中央文革成员穆欣(不久穆欣本人也受到打击迫害)署名的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中,批判“周扬的一些追随者”“围剿鲁迅”,在说到“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竟然攻击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罪恶’”时,在注释中写明,这个“周扬的追随者”是任白戈。

与彭真被公开点名批判不同的是,任白戈是还在任上并且其所在组织及上级领导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点名批判的。

虽然这次点名不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而且只是在一篇文章的注释里出现,但是被“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红旗》杂志点名批判毕竟非同小可。重庆许多干部纷纷打电话询问市委:被中央

点名的任白戈是不是重庆的领导人任白戈。市委无法回答。7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赶到重庆，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召开市委会议，传达由陶铸通报的、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任白戈的错误是30年代的问题，60年代的工作还是好的。并要求把这个意见用座谈会的方式传达到17级以上的干部中去。随即，任白戈以“请假检查”名义离开工作。

但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邓小平也遭到“炮打”，自身难保，哪还保得了任白戈？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就被迫在重庆市大专院校师生代表会议上，代表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宣布了将任白戈“罢官”的决定。

在重庆这样一个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执政党的首脑人物突然之间被以如此不正常的方式打入另册，威信扫地，形势怎不陷入空前的混乱？

自1966年8月中下旬以来，重庆群众便因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认识而分裂成为两大派，一派是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造反派，与之相对立的另一派即当时所谓的“保皇派”或“保守派”，包括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他们同广大领导干部一样，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很不理解，加上运动初期批判“三家村”时的许多做法及舆论导向使他们误认为这是一场类似于反右派那样的政治运动，便旗帜鲜明地站到了造反派的对立面。

8月28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一部分红卫兵到江北区“宣传《十六条》”，鼓动造反，同一些反对造反的群众发生冲突。市、区党政领导认为这是右派学生闹事，便发动群众向造反派反击，在全市大造舆论，揪斗、批判八一五派学生和同情他们的群众，试图以高压来维持稳定，但是却不仅激化了两派不同观点群众间的对

立情绪,而且在反击中因沿袭了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批“三家村”时的一些习惯作法,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将这个小冲突夸张宣传为所谓“暴徒逞凶”的“八二八惨案”,结果被造反派抓住了“造谣”的把柄,反而大失人心,使不少群众转而同情、支持造反派。

为了稳住重庆,李井泉带了挂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文珍和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等坐镇重庆,协助市委工作。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是以反右派运动时的认识和经验来对待这场运动的,认为红卫兵、造反派的行为就是“匈牙利事件”、“右派翻天”,到一定时候,毛主席、党中央必然会号召反击,依靠工农兵来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为了防止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打乱工厂生产秩序,影响生产,在9月初,李井泉向中共重庆市委领导提议,可以仿照革命历史上的传统工人组织,建立工人纠察队,以搞好生产、搞好“文化大革命”。并要求先试点。重庆市委部署给工交、兵工、基建三个政治部,并在中梁山煤矿试点,工交政治部发了试点经验介绍。这样自上而下地在全市工矿企业中很快建立起了工人纠察队。

到1966年9月中旬,重庆全市性的工人纠察队总部已建立起来。由于是通过尚在正常运转的各级中共组织和各地各单位公安保卫部门发起,工人纠察队迅速发展成为一支无可匹敌的力量,其人数之多,组织机构之健全,乃至旗帜、袖章、宣传品之精美,都是当时其他自发性的群众造反组织无法相比的。而且工人纠察队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生产骨干多,在群众中的影响大。他们的立场从一开始就与造反派尖锐对立。在作为首家试点单位的重庆中梁山煤矿工人纠察队于1966年9月5日发出的《宣言》中,就通篇没有当时已比较时髦的“造反”二字。可见其反对“造反”态度之鲜明。

然而，工人纠察队很快便发现“文化大革命”并非反右派运动，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人民日报》不但没有像当年那样发表《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一类社论，反而连篇累牍地发表支持造反派、贬斥“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文章。工人纠察队的言行处处与中央精神不合拍，处境日益被动。造反派的地位却不断得到提高。更使工人纠察队气馁的是，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基本精神的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炮打司令部”，支持造反派，已是大势所趋。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的群众纷纷获得平反，而各级党委则纷纷检讨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甚至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也被红卫兵印成了传单，到处散发。工人纠察队陷入了困境。

二

11月28日，重庆城内各交通要道、车站码头，到处张贴出了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定于12月4日在重庆市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的海报。

在当时，有关召开大会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海报随处可见，不足为奇。但是这一海报却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原来，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就是工人纠察队总部更改的名称。面对滚滚而来的造反浪潮，工人纠察队已经军心动摇。为了稳住阵脚，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工人纠察队总部决定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接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同时更新组织名称，重整旗鼓，以利再战。

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传出后，重庆造反派和首都三司等外地

驻渝红卫兵都认定这个大会是“阴谋”，是“假批判、真包庇”，决定要对大会造反。

到群众集会上去造反，是当时的一种时髦行为。只要稍有不同意见，便可纠集一些人，呼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冲上主席台，抢夺广播话筒，发表造反声明，使你这个会开不下去……而这种举动又往往会导致群众间的冲突。

中共重庆市委对“一二四”大会可能导致群众冲突十分担忧。11月30日在潘家坪，12月1日在小温泉召开的干部会上，市委领导就谈到一定要说服工人战斗军不开这个大会，如果他们一定要开，就通知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不去参加。12月2日上午，市委两位领导人在重庆钢铁公司招待所约见工人战斗军司令部负责人，劝告他们，目前少数派（造反派）与多数派有对立情绪，如开大会，少数派来冲会场，则很可能发生冲突，所以12月4日的大会切不要召开。但是工人战斗军负责人表示大会非开不可，只是保证绝对不发生冲突。当天下午，市委即在电话上通知各部委和各区委，一定通知所属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不参加12月4日的大会。自然，这些通知也同市委领导对工人战斗军负责人的劝告一样不起作用。原本是组织起来保卫各级党组织的工人纠察队，这次却不听党组织的招呼了。他们召开“一二四大会”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挽回政治声誉，甩掉“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帽子。若按市委的意见不开这个会了，岂不正好授人以柄，招来造反派的嗤笑？广大工人纠察队员早已憋了一肚子气，坚决要通过这次大会来向公众表明，他们是忠于毛主席、党中央的，他们也是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的。12月3日白天和夜晚，市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仍多次劝说工人战斗军负责人不开大会，结果无效。

就在中共重庆市委苦口婆心劝说工人纠察队停开“一二四大会”的同时，造反派则加紧了对大会造反的策划。

12月3日上午,离大会还有一天时间,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了八一五派(即重庆造反派)联席会议,制定了对大会造反的方案,并决定如果到主席台发言造反不成,则将队伍拉到市中心解放碑另行召开真批判大会,与工人纠察队的假批判形成对比,以争取广大中间群众。但是另一些人却认为这一计划太“温良恭俭让”,太“右”了。当天下午和晚上,工人造反军总部和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组织的少数头头又制定了另外两套强行冲击会场的造反方案,还特别安排了要在主席台后边马路上先停放三辆救护车以运送伤员……

眼看一场流血冲突爆发在即,正在重庆协助市委工作的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文珍和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专程去到重庆大学,向八一五总团负责人进行劝说,希望他们不要到“一二四大会”上去。但是对于坚信“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来说,这些劝告自然是毫无作用的。武斗之势已如箭在弦上。

三

12月4日是星期日。天刚亮,人们便从四面八方涌向重庆市体育场。到会者除了来自各地区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外,还有他们请来的同样反对造反、同样是由“官方”组建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学校教职工组织)、文艺兵(文艺界职工组织)等,当时这些组织被造反派统称为“保皇四军”。他们都已听说了造反派要来冲会场的传言,早已是义愤填膺,严阵以待。为防止造反派的破坏,工人战斗军司令部还组织起了数千人的大会纠察队伍,层层设防,作好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准备。

大会尚未开始,摩擦便已发生。一会儿是首都三司的红卫兵发现了工人纠察队写的“谁反对工人纠察队就砸烂谁的狗头”与三司

提出的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不同，“工人纠察队”竟把自己与伟大领袖相提并论，是可忍孰不可忍？一会儿又有几个首都三司红卫兵刷写挑衅性的标语“工人纠察队必定垮台！”“工人纠察队总部必定完蛋！”引起工人纠察队员的义愤，双方发生了争执和抓扯……

按照当时惯例，任何群众组织集会都要“欢迎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参加”，以示“大民主”。工人战斗军司令部的海报上照例也写了这样的套话，而且在会前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还一本正经地派代表到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去联系过参加大会、“支持革命工人运动”事宜，工人战斗军负责人自然也礼貌地表示了欢迎。因此，尽管大会组织者十分不情愿，也不得不让造反派的一些组织挤进了会场。

在双方都剑拔弩张、摩拳擦掌的气氛里，大会终于开始了。

大会刚刚开始，发言尚未进行，还没有任何依据可以说明这次大会是“假批判真包庇”，急不可待的造反派就借口“主席团成员未介绍家庭出身”开始造反了。本来，无论大会发言还是街头辩论，首先自报家庭出身，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血统论”流行时的一个不成文规矩，若是“出身不好”，马上便会被轰下台去。但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血统论已开始受到批判（主要是因血统论的鼓吹者谭立夫及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力保老干部而违背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实际上，造反派大多是“血统论”的受害者，但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要抓到一个借口就行了。

先期进入会场的造反派人数虽少，但却是最具有造反精神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他们摇旗呐喊，拼命向主席台冲击。被阻隔在会场外的造反派大队人马，闻知场内已经起事，便也奋力向早已水泄不通的场内发起冲击。一场混战就这样开始了。率先爬上主席台的重庆大学八一五两个头头要抢夺话筒发言，被早有准备的

大会纠察人员推下台去。一个冲上了台的首都红卫兵曾一度抢过了广播话筒高呼“八一五好得很!”但仍被抓走。台下的两派群众,也从起初的推挤、谩骂发展成扭打,旗杆、标语牌等都被当成了斗殴的武器。双方还出动了上百个摄影师,站在汽车、宣传车顶上和主席台、看台的高处,抢拍各自所需的镜头。会场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带领工人纠察队一派群众高呼“八一五坏得很!八一五滚出去!”那些坐在看台上的红小兵(小学生)们,也在老师带领下紧张地挤在一起,涨红着小脸拼命用稚气的声音加入这个狂热的大合唱……

为了尽量制止冲突,中共重庆市委事前已派了市“文革”办公室干部到会场了解情况,打听了体育场各侧门出口是否畅通。为了及时掌握情况,市委“文革”办公室还架设了专线电话。冲突发生后,被派到会场观察的“文革”办公室干部一方面竭力劝说双方停止斗殴,一方面打电话向市委反映。市委当即派了一位书记处书记和“文革”办公室负责人赶到现场做劝解工作,并要求把所有的门都打开,迅速疏散群众。

由于重庆市委的干预,这场持续2小时左右的大规模流血冲突总算平息下来。但是会场外的武斗却又蔓延开了。两派群众都被“惨案”所激怒,或出于报复,或为了抓“凶手”,掀起了打、砸、抢、抄、抓的狂潮。至此,局面完全失控。

“一二四”大规模武斗事件发生后,早有准备的造反派立即大造舆论,称之为走资派一手制造的“镇压造反派”的“惨案”,并断言造反派被打死了人。当天下午,造反派就举行了抗议集会和游行,第二天又在体育场召开了控诉大会,重庆大学八一五代表在大会上说:“西南局、省市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阴谋策划其御用工具——重庆工人纠察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军,赤膊上阵,拳打足踢,挥戈扬矛,大打出手。他们用钢钎、木棍、铁锤、

铁矛、旗杆、主席语录牌……等等，打死打伤‘八一五’派二百余人，造成世所罕见的流血惨案。”有关“工纠打死造反派”的所谓“目击者”的揭发、控诉也大量出现在传单、小报和大字报上。

正如当初反对造反的一方力图以“八二八事件”为突破口一举搞垮造反派一样，此时造反派也力图以“一二四事件”为突破口一举搞垮保守派，并进而搞垮市委。于是，造反派便一心要证实“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说法，到处搜寻证据。有人传出了“市委要毁尸灭迹”的谣言，造反派便马上派人到市郊石桥铺火葬场去将正待火化的14具尸体“查封”。一些造反组织还在交通要道口设下检查站，检查是否有人转移尸体。

“死人”问题一时成了双方关注的焦点。

造反派组织了庞大的调查团，从数十人发展到近300人，大部分是充满革命激情的年轻人，相信了“工纠打死造反派”的传言才来参加调查的，但是查来查去，却一无所获。

在相互攻讦中，工人战斗军一方发现造反派在“死人”问题上陷入了窘境，便抓住死人问题展开反击，强烈要求市委公布“死者”姓名和单位，使造反派更加被动。

这时，一批“敢字当头”的造反派与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外地驻渝红卫兵一起，采取了一个在造反派内部也遭到不少人反对的极端作法：于12月6日下午从火葬场强行抢走了4具尸体，连同当晚从一家医院抢出的1具尸体（死者是因心脏病去世的八一五派红卫兵）一起，作为“可疑尸体”，从7日下午开始在体育场展出。

因造反派内部分歧，体育场的尸体展览草草结束，一些造反派又将5具尸体强行抬进中共重庆市委院内，抬到市委办公厅楼上机要室屋里，陈放于办公桌和值班床上，以此进行要挟，要市委交出所谓“黑材料”。后来通过一些红卫兵出面工作，好不容易才说服

他们将尸体抬走。

四

“一二四”事件发生后，外地赴渝红卫兵早已将舆论造向了全国——在那天同重庆造反派一起冲会场的就有首都三司、首都一司、四川大学八二六、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派及西安交大、西北工大等外地红卫兵。各地造反派见到传单，认为有利于搞垮“保守派”，也不问青红皂白，纷纷加以翻印、转抄。

1966年12月17日，重庆造反派有关“一二四”惨案的宣传造成了最大的影响。这天由首都三司发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了大会。重庆造反派的“一二四惨案赴京控诉团”也参加了大会。因为首都三司红卫兵直接参加了“一二四大会”上的造反行动，又参加了事后的“联合调查团”和“赴京控诉团”工作，还有的三司红卫兵以“目击者”身分发表过控诉“工纠打死造反派”的文章，所以在首都三司负责人所致的大会开幕词中便特别出现了这样一段话：

“在这场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同志们，在重庆，在成都，在长沙，在上海，在北京等地，我们的一些革命战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是真正的人民英雄，他们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在这段话里，重庆被排在第一位，足见当时重庆“一二四”事件在全国同类事件中的分量。

在全体起立为“殉难的革命战友致哀”之后，一些群众组织代

表分别发言。其他发言都是声讨首都近来出现的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林彪的所谓“反革命逆流”，而重庆代表的发言却是“愤怒控诉重庆市委血腥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制造‘一二四’血案的滔天罪行”，并声称在这次血案中革命群众被打死了人，强烈要求“严惩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立即解散重庆工人纠察队，打倒重庆市委，解放重庆山城！”

随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发言中又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准备为人民牺牲，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好同学，好同志，但是革命在前进。”这个讲话实际上等于肯定了有关重庆“一二四”惨案中“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谣传。

在这样一个有当时几乎所有常在公众集会上露面的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派”的大会上控诉“一二四”惨案，这就使得重庆“一二四”事件的影响迅速扩大到全国。在大会当天，重庆工人战斗军（工人纠察队）的赴京告状团驻地便被首都造反派查抄，人员被赶走。报道这次全国造反派集会的《首都红卫兵》报和大会发言录音被迅速带回重庆，广为传播。“工纠打死造反派”的说法以积毁成山之势沉重地压到工人战斗军等群众组织头上。造反派以“抓凶手”、“镇压反革命”等名义到处抓人，私设公堂和监狱，不仅报了“八二八”之仇，而且为造反派组织的发展壮大和下一步的夺权赢得了条件。

西花厅组织机构和人员序列情况

张 作 文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改称国务院——笔者注）总理兼外交部长。不久即成立了政务院总理办公室。后来列入国务院直属机构。称总理办公室并非仅为周恩来一人服务，同时还为陈云、邓小平和陈毅等服务，因为他们也在西花厅办公。所以办公室的人员较多，除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员外，又从各地区、各部门先后调来了20几位同志，并成立了8个秘书组。即：财经、政法、外事、军事、情报、文教、机要、行政组。其中财经组、外事组、机要组、行政组是最早就成立后来没有变动的，其余的组或分或合最后成为一个综合组。

办公室领导和各组的成员是（以到任时间为序——下同）：

先后担任办公室主任的是：

张唯一（1950年—1953年）

齐燕铭（1953年—1958年）

童小鹏（1958年—1965年）

先后担任办公室副主任的是：

阳翰笙（1950年—1957年）

李琦（1951年—1956年）

段云（1953年）

罗青长（1954年—1965年）

刘 昂 (1954年—1960年3月)

张 彦 (1955年—1958年)

许 明 (1960年—1965年)

财经组:

刘 昂 组长 (1949年—1960年3月)

吴群敢 (1950年—1956年)

王伏林 (1951年—1958年, 1964年—1966年)

顾 明 (1952年—1966年)

杨 纯 (1955年—1957年10月)

戚剑南 (1952年—1966年)

许 明 (1954年—1966年)

李 岩 (1956年7月—1965年6月)

外事组:

陈 浩 组长 (1949年12月—1957年11月)

邓 光 (1950年5月—1958年)

马 列 (1950年10月—1966年)

浦寿昌 (1954年—1965年)

王甲芝 (1955年—1957年)

政法组:

于 刚 (1949年—1953年)

李 琦 (1950年—1956年)

王 泓 (1950年7月—1957年2月)

史 坚 (1950年—1955年)

刘 华 (1953年—1956年)

姚 力 (1953年—1957年)

军事组:

雷英夫 (1950年—1952年)

郭英会 (1950年—1956年)

周家鼎 (1956年—1973年)

情报组:

张唯一 (1950年—1953年)

朱明 (1950年—1953年)

文教组:

康英 (1950年—1957年)

韦明 (1951年—1957年)

机要组:

孙岳 副组长 (1949年—1954年、1956年—
组长 1962年、1966年—1968年)

许文清 (1949年—1952年)

郑勤 (1949年10月—1953年)

王海清 (1951年—1958年)

白志勳 (1952年—1956年)

李玉芝 (1953年—1954年)

刘云杰 (1953年—1955年9月)

刘震海 (1953年—1957年)

董翰杰 (1954年—1955年)

刘三源 组长 (1955年—1958年)

王甲芝 (1957年—1962年)

赵炜 (1955年—1965年)

邓东来 (1956年2月—1966年1月)

赵茂峰 (1956年—1976年)

行政组:

何谦 (1949年—1962年)

成元功 (1949年—1965年12月)

韩福裕 (1949年—1954年)
张永池 (1949年—1958年5月)
张树迎 (1949年—1976年)
姜贵春 (1954年—1962年)
赵行杰 (1954年—1961年)
乔金旺 (1955年—1957年, 1961年—1968年)

在各秘书组成立前办公室还有:

杨超 (1949年—1950年)
罗迭 (1949年—1950年)

临时调去参加某些专项工作的还有:

杨刚
范若愚

办公室成立后,周恩来根据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对办公室人员进行了两次大的精简。一次是从1956年到1958年,因为政府各部门组织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已逐步建立和趋于完善,同时各位领导同志的工作方法和要求不同,陈云、邓小平和陈毅也不常到西花厅办公了。这样办公室的人员就显得多了,就调出了16位同志到基层或政府其它部门工作。1955年之前还先后调出了11位同志。这时各秘书组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

60年代,又调出6位同志,调来了8位同志。调来的同志是:

高振普 (1961年—1976年)
李庚奇 (1962年8月—1965年12月)
李福润 (1962年—1966年)
王亚志 (1964年8月—1965年2月)
钱嘉东 (1964年9月—1976年9月)
王维澄 (1964年—1965年)
张作文 (1965年4月—1971年5月)

纪 东（1968年8月—1976年9月）

第二次精简是1965年初，毛泽东在1964年12月对一位领导同志的秘书误了一件事很不高兴，说：“秘书太多会误事”。周恩来知道后即于12月15日出席政治局会议讨论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撤消总理办公室，减少秘书。随后即与有关人员研究撤消办公室，减少秘书的有关事宜，并于1965年2月2日召集办公室人员开会宣布解散办公室的决定，布置解散后的工作。即将总理办公室撤消，改设总理值班室。办公室人员也大部调走，只留5位负责秘书工作的同志，即：王伏林、李庚奇、赵炜、赵茂峰和张作文。还有二位负责警卫工作的同志，即：张树迎和高振普。这样实践了一段时间证明这个班子不行，难以适应工作的需要，又把周家鼎、钱嘉东和孙岳同志调回来。

有些同志长期在西花厅工作如乔金旺等同志，但是他的编制不在总理办公室就没被列入。

改革开放正向广度深度发展，机构改革也已提到日程，重温周恩来关于机构设置的指示和精简人员的实践不是没有意义的。

需要说明的是：办公室各位负责人和有些同志的任职时间，是根据本人或有关同志的回忆整理的，如有差错当以档案记载为准。

毛泽东、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蒋 建 农

毛泽东曾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高度概括为：“两头好，中间差”。所谓“两头”，一般是指1921到1927年和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到1943年。这是从总的方面看，大致如此。但如果具体分析，在“好”的时期，双方也有不融洽甚至是对立的情况；在“差”的阶段，双方的分歧也不是绝对的，而是在总目标基本一致的前提下的分歧。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本文试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过程这一个侧面，记述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段时间里，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根据苏联提出的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对立是“国际关系的核心”的论断，积极响应苏联所谓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是进攻苏联的序幕的观点，提出要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他们认为，只有首先推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直接地毫无阻碍地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关门主义，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坐失九一八后国内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良机，使自己陷入孤立，并在强敌的围攻下遭受严重损失。

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最重要的内容是季米特洛夫所作《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大会根据这个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指出：为了战胜法西斯，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统一战线，共产党必须消灭自己队伍中自满自足的关门主义。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根据这一新方针，经集体讨论、由王明执笔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审阅通过后，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正式发表。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军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呼吁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并提出抗日救国的十大方针。《八一宣言》于同年10月1日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办的《救国报》第10期上发表，先是在海外华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随后在国内的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中秘密传播，有力地促进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与此同时，1935年11月中旬（一说是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张浩），化装成小商贩经蒙古抵达瓦窑堡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12月13日，指挥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回到瓦窑堡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听取了张浩关于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精神的传达。以此为契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7日召开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从这个过程看，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对中国共产党

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自遵义会议起逐渐确定了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毛泽东，也日夜思索着抗日救亡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既不是照搬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也不是泛泛地发号召，而是综合考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归纳分析各阶级在外敌人侵时的态度和利害关系，因而他提出的主张显得更切实可行。1935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①。这就初步明确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关系，把民族革命战争摆在了第一位。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首先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蕴藏在中国各阶层人民中的巨大潜力与积极性等方面，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性。接着，报告分析了国民党阵营的分化，即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动摇和转变，阐明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向党和全国人民切实地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战略任务。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把持着中央政权，掌握最大多数的军队，对外代表着国家，因此，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是实现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和关键，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标志。对这个问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认识得比较早。1935年8月25日，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不久，中共代表团就开会讨论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报告中认为，在中国的情

^①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7页。

况下,革命力量应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的斗争,但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只要蒋介石“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也不排除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①。王明的这种认识传回国内,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肯定是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相对而言,一直在国内率领红军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的毛泽东,对此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剿”共的立场,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是抗日反蒋并提。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虽然在行动上仍坚持抗日反蒋并重的方针,可他在理论分析中却得出: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触犯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时,中国地主买办阶级中的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毛泽东在阐述“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时进一步指出:“这个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②毛泽东告诫全党切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毛泽东依据中国的阶级关系在新形势下所发生变化的实际作出的理论分析,显然较单纯地贯彻或发挥上峰的指示,更切合实际。

1936年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56页。

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发言，批评中国共产党过去在对待南京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政治方针是错误的。根据他的发言，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强调决不能同时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整个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本的同盟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据此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正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先后发出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这表明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共进一步修正政策，促进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共产国际的指示之所以能够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接受，并产生积极的效果，或者说能够引起共鸣，这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在国内探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分不开。

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发表后，国共两党中央先后通过几条渠道探讨合作抗日的可能性。除蒋介石派驻苏联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外，其余渠道都在国内。1936年2月27日，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的董健吾，和受上海地下党委派来汇报与国民党代表团曾养甫等谈判情况的张子华，一同抵达瓦窑堡，带来了蒋介石亦有和红军妥协共同抗日倾向的信息。这印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他事后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①3月4日，毛泽东更明确地转告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停止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76页。

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等五项具体意见。^① 4月9日，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又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重申“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② 5月5日，毛泽东在著名的回师通电中正式放弃“反蒋”口号，提出“为了促进蒋介石及其部下爱国军人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队撤回黄河西岸”。此后，在接到共产国际最新指示以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提得更明确、更具体了。他“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和主要的对手”，“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③。8月25日，他亲自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建议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不仅在共产国际关于改变“抗日反蒋”并提的指示下达之前，已经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对争取蒋介石集团合作抗日有认识和准备，而且在实践上也已经采取了一整套的措施和行动。他一方面在全党和全军中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思想的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肃清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号召全党都去做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他也不是一味地、无条件地求和，他指挥红军坚决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打破了蒋介石消灭红军和用军事力量压迫中共同意其收编红军的幻想。与此同时，毛泽东既领导全党为广泛建立下层统一战线而积极努力，又以很大的精力亲自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他多次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左派，表达对他们爱国行动的敬佩和赞赏；他广泛联系地方实力派，如西北军的杨虎城，东北军的张学良，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华北的宋哲元，云南的龙云，以及失势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10页。

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34页。

③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68页。

的地方实力派首领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争取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给蒋介石以外部的压力。他还直接致信、电给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邵力子、宋子文、孙科、于右任、陈立夫、覃振和胡宗南、王均、汤恩伯、陈诚、贺耀祖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并通过他们影响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理论上的明确认识和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准备，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置十年血海深仇于不顾，作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决策；冯玉祥、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和李宗仁、刘湘、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就不会声援西安事变；在南京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的亲信大员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也不可能抵制亲日派讨伐西安的叫嚣；更不可能有以西安事变为转折点的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出现。

二

研究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自然离不开苏联。当时苏联是从其本身的利益出发考虑中日战争问题的。一方面，随着欧洲局势的日趋紧张，希特勒从其反共本性出发，同时也为了同英、法等国讨价还价，不时表现出或者说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要发动对苏战争的姿态与行动；英国等西欧国家也希望能祸水东引，试图通过某些让步以换取德国向东发动对苏战争，防止其向西行动危害西欧自身利益。而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和扩张，也严重威胁着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因为，苏联是列强中唯一与中国、日本领土相邻的国家，中日战争的发展对于它的国家安全有着直接的影响。假如中国被征服，日本拥有中国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将对苏联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面临着东西线双向作战威胁的苏联，希望借重中国以牵

制日本。所以，援助中国对日抗战便成为苏联远东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另一方面，苏联虽然与中国共产党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但它认为中共的微弱力量对于抗击日本的强大侵略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它把牵制日本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南京国民政府。这种认识和要求与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政策是一致的。这与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愿望，尽管在出发点上不同，但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

这种出发点的不同与总目标的一致的矛盾状况，在如何处理西安事变的细微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两次致电共产国际，介绍事变的情况和中共拟采取的措施。毛泽东在翌日凌晨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们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围绕这一环，我们要向人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稳定黄埔系、CC派，推动元老派、欧美派以及其他杂派赞助西安事变。对英美应很好联络，使它们对西安事变在舆论上表示赞助。最后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做结论时，又强调：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①会后，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除通报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1—662页。

拟采取的措施以外,还要求共产国际:(一)在世界舆论上赞助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抗日义举;(二)争取英、美、法三国赞助中国革命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苏联大力援助中国。

苏联虽然也是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但对西安事变性质的认识,却与毛泽东大相径庭。从12月14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和共产国际的《国际新闻通讯》等发表了大量的报道、评论,把西安事变说成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把张学良和杨虎城说成是“叛徒”、“强盗”。12月16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给苏联驻华代表打电报,要他转送如下声明给南京政府:“(一)苏联政府得悉发生西安事变后立即表示明确而肯定的立场,谴责张学良这一客观上只能有利于企图分裂和奴役中国人民的一切敌人的行为。(二)苏联政府……不仅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与自日军占领满洲之时起,从未与张学良保持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三)鉴于各种虚假和诽谤性报道仍不断出现,苏联政府……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①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针对中共中央对事变性质的分析指出:“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来电建议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在电文的最后强调:“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联盟的口号。”可惜,这封电报因电码差错难以译出,中共中央只好于12月18日要求共产国际重发这封电报。直到20日,中共中央才终于再次收到并译出了这封来电。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评价上与中国共产党有很大区别,但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上与中共的主张基本相同。尽管他们是出自苏联利益的考虑,但是这坚定了中国共产党

^① 见《苏联及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反应》,《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6期。

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心,使中共中央的思想更加趋于统一,促使中共加快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步伐。从这个角度讲,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事实上,在此之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妥善解决西安事变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

12月1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地发展其胜利;

12月14日,毛泽东同朱德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张学良和杨虎城,建议由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

12月15日,毛泽东同朱德等红军将领致电南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诸位先生,呼吁他们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

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敢乞周旋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

12月18日,在接周恩来关于西安情况和国内各派对西安事变态度情况的电报后,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国民党立即开放政治,实行抗日救国;

12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结论时强调,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同日,毛泽东致电在外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

亡国惨祸。”^①

.....

毛泽东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去争取西安事变能有一个最好的结果。比如12月19日这一天，他除了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处理日常工作外，共起草并发出的电报达10余份，其中给周恩来的就11封。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由“审蒋”、“罢蒋”到确定和平解决，这一决策变化过程是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根据错综复杂的形势，审时度势独立自主作出的。12月21日，中共中央回复共产国际来电：“来电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方针。”

毛泽东虽然十分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但他在处理问题时从来都是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允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但由于蒋介石由其反共立场所然，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如果不对他进行必要的斗争，联蒋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话，难以实现。12月26日，刚刚离开西安抵达洛阳的蒋介石果不其然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只字不提他在西安“以人格保证”作出的允诺。12月28日，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出：“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何应钦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

^① 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22—626页。

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①他警告说，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毛泽东认为，中共在西安事变之前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和平；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的任务是巩固和平，而要巩固和平，就必须发展民主。为此，他和中共中央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可见，他在争取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对蒋介石不是一味的让步，而是以“逼蒋”促“联蒋”。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十分担心来之不易的中国国内和平的局面会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极力挑动内战的走狗在搞阴谋”以及中国共产党采取“错误的步骤”而不能持久。为此，共产国际于1937年1月19日和20日两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不要就蒋介石在西安的许诺大发议论，不要提出立即对日宣战要求，不宜强调同苏联结盟口号。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中国共产党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变自己的方针：（一）将苏维埃政府改为人民革命政府；（二）将红军改为人民革命军；（三）仅在城市中心区保留苏维埃，并且不作为政权机构，而作为群众组织；（四）放弃普遍没收土地做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虽然不尽赞同，但基本上是接受的。这见诸此后中共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等文件和行动中。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等一系列事件中的态度和行动，并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和中共的意愿。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有些令人失望。在长征后期毛泽东和中共有“打通国际线”的计划，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7页。

望能和苏联连接在一起，依托苏联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这个计划后来未能如愿，得不到苏联的实际援助不能不是原因之一。西安事变前，中共同东北军、西北军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有可能得到苏联的支持是毛泽东在谈判中的重要砝码。但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与中共的期望是根本相反的。进而，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毛泽东和中共除了在政策上得到若干指导性意见外，在事实上也很难得到苏联方面实际的甚至是口头的声援或帮助。但是，一个强大的邻国——苏联的存在，特别是这个邻国与中共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由它实际主持的共产国际又和中国共产党有着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再加上苏联在世界人民面前一贯保持爱好和平和进步的姿态，这对于在艰难困苦中不懈奋斗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那里是希望和重要的精神支柱。因此，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始终把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看做是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第一位的外部条件。他在1937年7月23日，即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次正式阐述中共的外交方针时，非常鲜明地提出：“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①

三

毛泽东认为，中国夺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断巩固和发展。我们在前面已经比较多地叙述了毛泽东在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贡献。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成分非常复杂。它既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阶级,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以及海外华侨中的广大爱国人士,更有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的各阶级和各阶层,既有合作抗日的共性,又有各自的个性,甚至是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代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两翼,他们在抗战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即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直至鸭绿江边,还是只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的局面?在实行什么样的抗战路线,即是全面的抗战路线,还是片面的抗战路线?在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即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是游击战、运动战,还是正规战、阵地战?以及在抗战的外交、抗战时期的政治改革和战时的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上述问题上的分歧及其实行后的结果将直接关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巩固与发展,决定着抗日战争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毛泽东当时就深刻地指出:“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①他对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企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方向与分化等问题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在刚刚开始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就旗帜鲜明地向全党提出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任务。他说:“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4页。

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①

他这个时期有一个鲜明的观点，即阶级投降主义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毛泽东首先是对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的阶级投降主义的倾向，进行了斗争。他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在统一战线形成后产生的松口气的思想，以及表现在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抗日进步一面估计过高，对它动摇妥协一面认识不足，在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工作中无原则地迁就国民党等现象，告诫全党：在我和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容易发生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时候，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他提醒全党注意在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影响的同时，防止右倾投降主义的蔓延。193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时指出：谈判的方针，无疑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的方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这样，我们便要失去信仰。同年5月，他在苏区党的代表会议上，又针对党内同志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把持全国政权，共产党的力量不居支配地位而产生的对争夺领导权问题的疑惑，进一步阐述了实现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任务的四条具体的原则，即：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奋斗目标；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成为实现奋斗目标的模范；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与同盟者建立联盟；共产党队伍的发展、坚强和思想统一。这样，就使保持和争取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目标具体化和理论化。七七事变后，毛泽东根据各阶级对抗战的态度，把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阶级和各阶层分为左、中、右三个集团。其中，他认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右翼集团，“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他们一方面害怕战争对他们财产的迫害，另一方面害怕民众起来。他们中间有些人暂时地加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页。

人民族统一战线,是被迫的、勉强的。“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①

毛泽东为防止阶级投降主义倾向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在抗战初期遇到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及其政策的忠实执行者王明的严重挑战。

七七事变发生后,苏联《真理报》等报刊立即发表文章,报道事变是由日本军队挑起的,中国军队是被迫进行自卫。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也在8月1日的《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法西斯主义——就是侵略》,他强调,要保持国际和平,就首先要使法西斯强盗在西班牙和中国遭受失败。这和英美等国报刊在事变后的所谓“中立”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国内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问题。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发言,他除了号召发动国际无产阶级采取各种措施援助中国人民之外,同时认为:中国共产党过去领导红军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现在同是这些人,却要实行另一种新的政策。如果我们详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可以指出其中有使党迷失方向的因素,这些内容是必须纠正的。可是,从我们这里纠正错误的可能性是有限度的,必须有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共中央。会后,王明根据会议精神写了《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一文,他说,“中国共产党现时大多数干部,是在国内战争中教育和锻炼出来的,其中许多人社会出身是农民……很多干部完全缺乏在没有苏维埃和红军的区域内进行群众工作的经验,甚至有些人连大城市中工人运动的一般概念也没有。因此,重新教育老干部,使他们能适应新的环境采用新的工作方法,并不是一件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6页。

容易的事。”^①10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了《关于援助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决议》，指出：“必须使保卫中国运动具有广泛性，无论如何这种运动不应带有狭隘的共产主义性质，不应主要靠共产党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必须利用一切直接或间接的后备力量，利用日寇在欧美国家各居民阶层中特别不得人心这一情况来保卫中国。……在反日斗争中，必须利用那些从经济角度关心维持中国的秩序、安宁和正常经济生活条件的组织和个人。”^②在这种情况下，1937年11月14日，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启程回国，于11月29日飞抵延安。回国前，王明等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并同季米特洛夫讨论过中国的局势和中共的政策问题。

王明的到来，受到毛泽东等的真诚欢迎。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9日至14日召开会议，讨论和总结党的工作。王明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的身分出席，并做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发言。他自称代表国际路线，是传达斯大林对于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和新见解。他的发言认为：第一，中国抗日战争具有国际意义。中国如果能够给日本以有力抵抗，使日本无力进攻苏联，解除日本在东方对苏联的威胁，这将对世界革命大为有利。第二，中国共产党应该主动同国民党密切合作，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国防军，这是保障抗战胜利的最重要条件。第三，国共合作应是永久的，真诚的，彼此之间应是互谅、互让、互助，我们不应该谈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第四，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此外，王明还明确表示，在国共统一战线问题上他完全同意季米特洛

① 巴黎《救国时报》第123、124期。

② 马贵凡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援助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决议》，《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夫所建议的在中国提出这样的口号：“一切服从抗日”。会后，王明率中共代表团到武汉同国民党谈判，他依据他个人的理解公开发表一些过头的言论和文章。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王明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的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会后，他又发表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观点。王明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为缓解苏联因受东西法西斯两面进攻的压力而制定的政策。为密切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他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抹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原则区别，反对毛泽东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有左、中、右三种不同政治集团的划分，认为只有抗日与降日的区分。因此，他不讲斗争，只讲联合。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反对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他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完全对立起来，认为搞阶级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在军事上，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认为只有打阵地战才能拖住日本人，所以王明也强调统一听命于国民党，轻视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重视国民党的正规战，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的正规战。

王明的言行与毛泽东和中共的既定方针、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很快在华中和华东地区的斗争实践中造成了危害和混乱。因此，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立即起程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的情况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加强相互了解。4月14日，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递交了书面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5月17日，他又专门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就书面报告做了说明和补充。这样，使共产国际方面对中国抗战以来的实际情况和中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有了较全面的客观了解，从而部分地纠正了他们的一些错误认识和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讨论，做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

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和不能有限制参加统一战线各党派在政治上及组织上独立性之目的”，“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其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的斗争的基本保证。”^①7月，季米特洛夫约见任弼时和在苏联治病即将回国的王稼祥。他郑重地说：应该告诉全党，要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共产国际还拨出30万美元托付王稼祥带中共中央。^②9月14日，从苏联回到延安的王稼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季米特洛夫的重要谈话。这样，共产国际态度的转变，就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彻底纠正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在会上作了《国际指示报告》，毛泽东则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毛泽东着重从理论上阐明了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及如何正确处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他指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是一致的，不应当把它们对立起来。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但是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否认它的存在是错误的。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一致性表现在：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以不破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② 徐则浩：《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

裂合作为条件；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抗日的出发点。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也是同样道理。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各党派的相对独立性，才有利于合作，才有所谓合作，否则，统一变为“混一”，统一战线不存在了。在毛泽东的积极斗争和耐心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被很快克服了。全党上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领导做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领导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实践中，同蒋介石集团操纵和控制统一战线的企图及其民族投降主义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努力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贯彻到抗日战争进程的每一个阶段和主要方面。

历史证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是坚持和捍卫无产阶级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如果不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而是像共产国际和王明一度所主张的那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让蒋介石国民党去统一指挥，将3万红军集中使用、打正规战，而不是分散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那么，就不会有人民军队的壮大和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全国的抗日就会因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而陷于失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会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和日寇的诱降而瓦解，等待中国人民的将是“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

中国人民之友——史沫特莱

梁 海 江

史沫特莱是享誉国际文坛的作家和记者，她一生的大部分活动和主要成就，都和中国相关。除自传性小说《大地的女儿》一书外，她的几部传世之作和几千篇通讯报导文章，写的都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国的革命斗争。她是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知心朋友。

一、去中国的第一站——上海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年2月23日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奥斯古德以东2英里的地方，她的童年是在苦涩艰难的生活中度过的。

1911年9月11日，史沫特莱作为一名旁听生进了坦佩师范学校，还参加了学校周刊《师范学生》编辑工作。第二年被选为首席记者。后来又当选为该刊主编。

1917年，史沫特莱担任了印度政治家拉伊帕特·拉伊的秘书，她开始钻研印度历史和文化，参与反击美国政府对印度激进分子的迫害和被驱逐的威胁，还利用组织的印度自由之友和写文章为印度的民族解放奔走呼号和呐喊。

1927年—1928年的那个冬天，史沫特莱作出了作为一名记者到中国去的政治性的也是事关个人命运的决定。她相信亚洲民族主义者和欧洲帝国主义之间的革命斗争就要发生，并认为中国将

是这场革命风暴的中心舞台。

史沫特莱于1928年12月末越过苏联边境进入中国东北。

史沫特莱要为《法兰克福报》采写的第一批题目之一，是妇女在中国的地位。她从满洲发出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是《沈阳五女性》。由于她在美国和欧洲长期关注女权运动和节育宣传，当看到在三座大山压榨下的中国妇女惨状时，大动感情，并决心为之改变做出努力。在沈阳，史沫特莱既考察社会问题，也研究政治现实。

寒冬将尽时，史沫特莱开始南下，先到日本人占据的旅顺和大连，然后前往北京，再越过黄河直奔南京。1929年5月初到上海。

当时的上海既是黑社会势力和特权巨头的安乐窝，也是国民党实力的最大集中地和中国共产党地下总部的活动处所。这就使得史沫特莱在这座城市里，连续居住7年，并且为她的第一部有关中国社会的纪实性著作《中国人的命运》（1933年）提供了创作素材。

史沫特莱接触的第一批中国人，是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如诗人、学者和作家：胡适、杨铨、徐志摩等。后来，在陈翰笙（时任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和路易·艾黎（新西兰人）的帮助下，开始真正接触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国工人、农民的劳动和生活状况。1931年，她通过和宋庆龄一起营救被捕的牛兰夫妇的过程，认识了当时最杰出的小说作家——茅盾。通过茅盾，她认识了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鲁迅。

1930年9月7日，史沫特莱和左翼作家联盟在法租界一家餐馆举行聚会祝贺鲁迅50寿辰。她对那次晚会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有精辟的描述，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紧张的政治气氛以及她和她的上海朋友们一同感觉到的强有力的人格和文化启示。1931年2月7日夜晚，左翼作家联盟5名重要成员，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处死。史沫特莱把被害的作家胡也频的妻子——作家丁玲，偷偷送出

了上海。她和茅盾一起，将鲁迅写的呼吁援助的公开信，安排人带到纽约、柏林、莫斯科以及其他地方。这封信在国外发表后，数以百计来自世界各国作家、艺术家的抗议函电涌入国民党总部。

史沫特莱曾于1928年11月在莫斯科会见过宋庆龄。1929年，这两位女性在上海重逢，有一年的时间，史沫特莱帮助宋庆龄处理来往信件和撰写演讲词——特别是有关反帝大同盟的部分。到了1931年，史沫特莱和宋庆龄在各种工作上的合作已经非常密切，以至不少人认为她是个正式的讲稿起草人和助手。

1932年，史沫特莱把发表的一些作品整理结集成为一本《中国人的命运》(1933)；并着手撰写一部有关江西苏维埃的著作——《中国红军在前进》(1934)。

史沫特莱很想访问江西苏维埃根据地，但始终未能如愿。不过从1932年起，她却掩护过不少来自江西的地下人员，藏匿他们的文件，为他们请医找药，同时也详尽地向他们询问各种问题。其中有两位红军指挥员，一位是周建屏，另一位是陈赓。根据以这种方式收集到的材料，史沫特莱发出了一批以西方语言写出的有关江西解放区生活的文章。这引起了国民党和英国警方对她更进一步的监视，史沫特莱也开始在法租界内频繁地更换住址。她熟悉苏区发展状况，而且能够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农民而取得成功的深远涵义以及国民党军事围剿的严重性日益增长。为尽快把全部故事写出来，她受莫斯科一家出版社为此书预付稿酬之邀，1933年5月前往苏联，去完成这部著作。

二、从西安到延安

1936年9月中旬，史沫特莱到达西安。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史沫特莱带着一张军事通行证在街上做起了救护工作。当

400名被俘的红军(还有妇女儿童)被释放时,史沫特莱成了唯一的医务随从,帮他们处理化脓溃烂的伤口,直至把这些伤员送进医院。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送到延安去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等代表来到西安,史沫特莱和周恩来等人作过短时间的交谈。几天后,史沫特莱便在张学良总部作每晚40分钟的英语广播,向大家报道西安每天的重要新闻和对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采访。西安英语广播使史沫特莱成为国际性人物,同时也显示了她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辩护者的特色。

1937年1月,史沫特莱得到一份邀请她访问延安的请柬。这是史沫特莱已经等待多年的好机会。为她饯行的有贝特兰、王炳南和他的德国妻子王安娜。

史沫特莱经过3个星期在崎岖道路上的颠簸,冲破各种障碍和阻拦,终于在红军一军团总部见到了左权将军,并受到从延安派来护送她的丁玲女士的热烈欢迎。在丁玲的陪同下访问了贺龙和彭德怀。

史沫特莱和丁玲到达延安时已是黑夜,立刻便被带去见朱德和毛泽东,他们都住在山上各自的窑洞里。第二天,史沫特莱在延安正式欢迎她的群众集会上发表一个小时的演说。声称美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精神,并指出,“你们的斗争是全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高度评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这时的延安有点像美国西部那些简陋的小镇,史沫特莱对这里的地理和社会环境竟奇怪的有种像在家里一样自在的感觉。

史沫特莱在最初几个星期里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朱德、周恩来等人。她在自带的打字机上整理采访记录常常到深夜。这时,她在年轻的翻译吴光伟(人称吴莉莉)的帮助下工作很顺利。到4月,史沫特莱已经着手较长期的写作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红军传奇式农民总司令朱德的一部传记,她经常在晚上去对他作长

时间的采访，书名定为《伟大的道路》，这本书在史沫特莱死后6年得以出版。近年来，已经有数百万册新译本售出。

史沫特莱并不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采访和写作，她还同时投身于另外好几项工作。她呼吁国际社会向延安提供物资和医务人员。著名的加拿大外科医生、共产党员、西班牙内战中的英雄诺尔曼·白求恩到中国来，应该部分地归功于史沫特莱的呼吁。后来，她成了一名干劲十足的图书馆员，负责扩大新建不久的窑洞鲁迅图书馆外文部，以服务于延安人口中不断增加的学生群。她努力吸引外国记者来访延安，鼓励他们突破西安的国民党封锁。她甚至还发动了一场节制生育运动。成绩比较突出的是史沫特莱发动的灭鼠圣战和有关卫生重要的宣传。毛泽东对此给了她大力支持和鼓励。不久，从上海和北京运来的捕鼠器就对延安古老的“鼠王国人口”产生了严重影响。

8月下旬，史沫特莱骑马摔伤了脊背。1937年9月，她启程前往西安，并在考虑到前方八路军去和朱德、周恩来会合的途径。她决心继续为中国革命而战斗下去。

三、战斗在继续

1937年9月中旬，史沫特莱到达西安，住在八路军办事处，还参加了办事处在9月26日举行的庆祝平型关大捷的群众集会。

10月初，她收到了要她到八路军抗日前线去的邀请，不到一个星期，就在山西太原追上了八路军。她受到周恩来的欢迎，然后便被继续送往北部山区朱德的司令部去。在以后的3个月，史沫特莱一直留在那里，白天采访、行军，夜间打字、整理记录。除了撰写许多独立成篇的文章之外，她还在把丰富的札记结构成日记体的叙事长篇，从而形成了第二年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的《中国在反

击》一书。在书中，她坦诚地讲到：“我永远也不能充分理解植根在这些工人和农民心底的，为中国解放而斗争的本质真谛。我们仍然是一个旁观者。”“真正的中国故事只能由中国的工人和农民讲述。”

在华北抗日前线，史沫特莱几乎每天都见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她尊敬他、崇拜他。因为朱德本人是在农村的贫困之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史沫特莱对他的认同常常有痛苦的个人背景。当朱德讲到自己的母亲时，史沫特莱向他解释：“你讲的好像是我自己的母亲。”

当在延安时，史沫特莱初和朱德接触，就打定了写一本朱德传记的主意，并诚实地告诉他：“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为什么呢！”他惊讶地问道。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10个有8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农民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有关朱德生平的记录正写到一半的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朱德动身到前线去。

在抗日前线，史沫特莱要尽可能多地在行动中对朱德进行观察。因此，在他的工作中，在球场上，在与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在群众中，对他观察了一年之久。在欢快的生活和紧张的战争气氛环境里，《伟大的道路》这本书开始了。由于抗日战争的原因，这本书没有成稿，史沫特莱离开了抗日前线和朱德，为更急迫的使命而奔忙。

为了谋求对中国人的医疗援助，史沫特莱认识尼赫鲁本人并和他保持着通讯联系。她劝说朱德相信尼赫鲁的国际观点和对中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情。因此，她和朱德都给尼赫鲁写了信，

都指出了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在给养和救护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发出了求援的广泛呼吁。尼赫鲁响应迅速。他公开发表了这两封信，并开始筹集资金。到1938年10月，5名印度医师组成的一支医疗队，在史沫特莱的支持下，到延安去参加八路军救护医疗工作，其中一位柯棣华医师，在为八路军服务岗位上以身殉职。

1937年底，华北抗日前线形势十分严峻，朱德等八路军的领导同志要史沫特莱离开战场到汉口去。在那里，史沫特莱作为一名记者和一名医疗器械供应工作的组织者，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史沫特莱1938年1月9日到达汉口。首先向美国大使和众多武官报告了八路军在山西北部抗日的情况，表达了她那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和对美国官方宽容日本扩张主义的不满心情。同时，展开了她记者特有的广泛游说和筹募活动。

在汉口，她还找到了处于草创状态的中国红十字会的简陋办公处，递交了八路军对于药物供应的申请书。在随后的10个月内，史沫特莱把她大部分精力都用于为中国红十字会筹款和宣传中国伤兵英雄故事与悲惨境遇的工作中。她的文章最初发表在《曼彻斯特卫报》和《密勒氏评论报》以及后来的《今日中国》、《民族》、《现代评论》、《亚细亚》、《时尚》等中外刊物上。为了筹集到基金，她从汉口一切可以设想得到的财源搜索出捐款，甚至公开使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捐出一大笔款项；她还写信给美国 and 香港英国当局，特别是香港的华人索要捐助。在汉口，她很成功的一项工作就是在汉口的一些知名的中外记者广泛接触和联系，交流他们之间的新闻和对当前抗日战争形势的认识，以及应当做什么工作。

汉口1938年10月17日陷落。前此几天，史沫特莱已经悄悄动身，去找新成立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部队新四军。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4月，史沫特莱跋涉于武汉以东长江两岸广阔地区的山陵之间。从南边的湖南、湖北到北边的安徽、河南，她的大部

分时间花在访问共产党和国民党所领导的抗日部队上。她成为外国记者在中国战区访问时间持续最长的一个。不过那也是史沫特莱记者生涯中最艰苦、最危险的时期，她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健康逐渐恶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佳战争报道著作之一——《中国的战歌》（1943年）中，史沫特莱极为详尽地叙述了她18个月的经历。战争与革命是她的主题。她以壮阔的、激动人心的笔触，描绘了一系列关于战斗、日本人的残暴和中国军民英勇抗战色彩纷呈的生动图景。

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战歌》一书的巨大力量之一在于，描写了作为战争的后果，在中国农村中发生的社会转变：中国农村妇女如何被组织起来在军事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如何通过开展群众性的教育运动，使摆脱文盲状态的人数增多起来；民主实践如何被介绍到乡村的政治生活中去，成为动员民众抗日的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源泉。

1940年3月，史沫特莱的健康状况已经恶化，而且由于日军对游击队的钳形攻势加紧收缩，李先念劝史沫特莱离开战场到重庆去。在那里，她可以一边恢复健康，一边去实现她那最重要的使命——把华中的抗日斗争告诉全世界。

1940年3月，史沫特莱来到重庆。面对处在日机狂轰滥炸中的一片废墟和弥漫着国民党消极抗战的腐败政治气氛，她感到沮丧。史沫特莱恢复健康后，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过演讲，也作过几次广播讲话。为进一步进行手术治疗，1940年8月26日凌晨，史沫特莱飞抵香港作胆囊检查并动了手术，并在那里治疗休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统一战线遭到蒋介石的破坏，为此，史沫特莱改变了重返内地的计划。当她得知她最了解和热爱

的新四军遭到严重损失时，感到震惊和痛苦不堪。1941年春，史沫特莱大部分时间是在香港市区度过的。5月初，她搭乘一艘开往加利福尼亚的挪威货轮回国了。

四、最后的日子

史沫特莱于1941年5月下旬回到了洛杉矶，她多次参加集会，登台演说，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的抗日斗争，向美国听众、官员、各团体大声疾呼，唤醒远离亚洲的他们，从道义上、物质上给予援助。她因此不时遭美国反对势力的骚扰和攻击，但仍坚强地战斗下去。

1943年9月初，《中国的战歌》终于出现在纽约全市各家书店。发行当天，史沫特莱在当地电台两次接受采访。美国的部分刊物发表了书评，使美国人民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的抗日斗争的。

1944年6月，史沫特莱已经开始了朱德传的撰写工作。这一年，她由于《中国的战歌》和巡回演讲的成功而心情满足。

1945年夏，史沫特莱接待了2名重要的中国来客，董必武和他的翻译。史沫特莱和董必武早在延安时就相识了。这次，董必武是以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中一名共产党代表的身分，出席6月和7月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史沫特莱花费了好几个小时陪同董必武在雅都的树林里散步，详细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董必武还给她带来了她所要的撰写朱德传所需的一些材料。她还和董必武讨论了美国1945年8月6日在日本广岛扔下第一颗原子弹的影响和后果。她所关心的是亚洲人民的命运，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命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史沫特莱非常高

兴。11月15日，陈翰笙夫妇和斯诺夫妇等在纽约码头送史沫特莱上船。她先到法国，后到英国。一旦伦敦和北京重建外交关系，就安排到中国去。她在英国住下后，就开始修改书稿。她同中国保持着直接联系，经常给王安娜（王炳南夫人）写信，通过在香港的龚澎转寄给她成包的书籍、胶卷和唱片。

1950年3月中旬，史沫特莱的健康状况恶化了，长年的胃溃疡导致胃出血，只能靠喝牛奶度日。4月17日，她乘火车到牛津，等候做手术。她在一张便条上说：“我活着全靠一个希望——就是我能到中国去。”

为防万一，史沫特莱也写了几封正式性质的信。信中写到：“……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盛和自由的中国。”“火化我的遗体，将骨灰送交朱德将军，埋在中国。”“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支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与世长辞。

1951年5月6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增添了一块新的墓碑，墓碑上镌刻着朱德的亲笔题词：“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之墓”。康克清女士的题词是：“史沫特莱女士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她是中美两国人民和妇女的光荣，是中美友谊的象征。史沫特莱女士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中央档案馆建馆40年

特约通讯员

编者按:1999年10月,适逢中央档案馆建馆40周年。40年来,中央档案馆在科学地管理党和国家中央机关的重要档案资料,进行史料开发、考证、研究、编纂和出版,为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的真实面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此,本辑特发这一专稿,以资庆贺。

从1959年10月开馆至今,中央档案馆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

党历来十分重视档案和档案工作。早在1931年党中央就在上海成立了地下档案库——中央文库,1937年又在延安设立了材料科,专门保存党的珍贵档案资料。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立即大规模地开展了档案的接管、接收和征集工作,接收了大批珍贵的历史档案。与此同时,随着机关、部队、团体、企事业单位逐步建立健全了档案工作,档案不断积累。因此,建立国家规模的档案事业和各级档案馆就摆上了议事日程。1954年4月,中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机构,中央办公厅随即决定各大区中央局的全部档案集中到北京。在同年12月1日中央办公厅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上提出建立中央档案馆,并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随即成立了中央档案馆筹备处着手进行各项筹备工作。195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建立中央档案馆,为党中央、国务院的直属事业

单位,集中保管党和国家中央一级机关的档案。10月8日,中央档案馆落成,举行了开馆典礼。参加开馆典礼的中央领导同志有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4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中央办公厅的直接领导下,中央档案馆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并为中央领导决策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40年来,中央档案馆经历了初创(1959—1966)、停顿(1966—1978)、发展(1979—)三个历史阶段,逐步发展和完善,做出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主要是:

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造就一支精干的干部队伍

中央档案馆既是科学文化事业单位,又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个工作机构,负责收藏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历史记录,管好用好这些档案,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能否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的真实面貌。这就要求中央档案馆的领导干部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敏锐的政治目光,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政治素养。

档案工作是一项专门事业,要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了培养造就一支精干的干部队伍,中央档案馆除逐年从大专院校选调研究生、本科生外,还对在职干部有计划地进行培养,一方面鼓励他们投考各类业余大学,一方面把大学办到馆里来。在80年代以中南海业余大学名义,依托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开办了档案专业本科班。目前,在全馆业务干部中,具有大专学历的占88.7%,其中大部分担任高、中级专业职务,这就为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和发展创造了十分良好的条件。

二、努力加强基础工作,不断丰富馆藏

档案的收集、整理、编目、统计、鉴定、保管、保护等所有提供利用之前的准备工作统称基础工作,是档案馆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建馆初期,中央档案馆的各项基础工作都比较薄弱,经过40年,特别

是近 20 年来的艰苦努力,基本上改变了基础工作相对落后的状态。

第一,馆藏不断丰富,馆藏结构得到改善。建馆初期,中央档案馆收藏了三个部分的档案。一是中共中央的档案,主要是中央文库时期和延安时期保存下来的中央档案和 6 个中央局的档案;二是少量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主要是撤销的临时机构的档案;三是明清两代中央政府的档案(“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部分档案从中央档案馆移出,后来成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那时,就第一、二两部分档案而言,馆藏的数量与结构都是与中央档案馆的性质和任务很不相称的。所以,从建馆初期起就大力开展了现行机关档案的接收和革命历史档案以及老一辈革命家、著名社会活动家的档案资料的征集工作,先后接收了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统战部、中央顾问委员会、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及中央财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财政部等几十个中央国家机关几十万卷档案,同时也接收了反映这些部门主要职能活动的重要丛书、期刊等资料。从全国各地征集到了大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稿、文稿、书信、诗词、回忆录等;还通过国际交往从俄罗斯收回了一批中共及其领导人早期活动的重要档案。经过 40 年的努力,目前馆藏档案已发展到 249 个全宗、73.8 万卷(约合 1000 余万件)又 18.8 万件,各种历史文献资料及书刊 183 万册,声像档案 1.2 万盒(盘),并且大大地改善了馆藏结构,使之趋向合理。

第二,档案的整理编目是档案馆经常性的主要工作之一,尤其是中央档案馆建馆初期接收和征集的档案大都未经科学地整理和编目,严重地影响了档案的利用,制约了其他各项基础工作的开展,因此,不得不投入相当大的力量重新对它们进行分类、立卷、编制各种检索目录。经过长期努力,特别是近 10 年来采取集中兵力

打歼灭战的方针,终于彻底消灭了零散档案,使馆藏档案全部实现了“有规可循,有目可查”的要求。

在大量编制各种手检目录的同时,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从80年代中期起,有计划地大量编制机检目录,并在著录标引、输入计算机之前逐件重新审定了控制使用的范围。到目前为止,已输入计算机的档案资料目录达120余万条,极大地提高了这部分档案资料的检索速度,实现了周恩来总理早年对中央档案馆提出的“一索即得”的要求。

为了避免反复使用档案原件,并为档案的异地保管创造条件,中央档案馆从建馆初期就开始进行档案的缩微复制工作,购置了先进的缩微复制设备,将馆藏重要档案资料缩微照像进行静电复印,截止1998年,共摄制卷片60万米,平片67630片,共2200万个画面,复印档案达数千万页。

第三,采取“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不断加强对档案资料的保管与保护,以达到最大限度地延长档案资料寿命的目的。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彻底掌握馆藏档案资料的基本状况。为此采取了抽样调查的办法,比较全面地摸清了底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长远规划和专项治理计划,分别采取了改善环境(包括库区大环境和库内小环境以及装具等等)、改造库房(贯彻“结构为主,设备为辅”的方针对库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造)、更新设备(彻底更新控制温湿度设备,基本上达到了恒温恒湿的要求,添制了远程调控装置)、传统工艺(主要是传统的修裱技术与现代科技,如塑模加固、药物还原字迹等相结合)等多种手段和途径,对档案资料进行卓有成效的保管、保护和修复工作,并在此过程中开展了保护技术的科学研究,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获国家奖励或国家专利。

三、积极开展档案资料的利用和档案史料的编研工作

保存档案的目的在于利用,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决策、为中央国

家机关各部门和省、市、区党政机关的工作，为社会各方面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利用档案资料，是中央档案馆的根本宗旨和工作目标。40年来，中央档案馆累计接待社会各方面的利用者近10万人次，提供利用档案资料上百万件。

根据中央档案馆的性质、任务和馆藏档案的特点，为中央领导决策提供服务，是中央档案馆在开展利用工作中的任务之一。长期以来，中央档案馆牢牢把握住了这一方向，经常积极主动地向中央领导提供有关的档案信息，例如毛泽东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重要亲笔批示，就是由中央档案馆从档案中发现并提供的，曾经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中央档案馆经常接到有关部门紧急查档的任务，这些任务往往是只提出一个专题性的题目，不但要求档案馆从馆藏档案中查出有关档案，而且要根据档案里面的有关信息，简明扼要地整理出能够充分说明问题的材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二次档案信息。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如果档案馆不只是被动地这样做，而且能主动地根据历史情况、社会需求和馆藏特点，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经常确定一些题目，组织专人去从浩瀚的档案中查找有关的信息，整理成专题材料，及时提供给有关方面利用，将能更有效地发挥档案和档案馆的作用，既能出成果，又出人才，是一项很有前途的工作。

实践证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对于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研究党史、国史、军史、战史、革命团体史、地方史；编辑出版党的领袖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选集、文集，编写传记、年谱、回忆录，以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决经济建设方面的许多问题，都能发挥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董必武在开馆典礼上所作的题词中说的：“典谟训诰，宝之无佚；只字片言，亦所珍惜。分肌擘理，鉴貌辨色；规圆矩方，依时顺序。创业扩基，前轨可迹；古为今

用,功同史册。”

为了充分发挥档案在各方面的作用,1980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专门听取了中央档案馆的工作汇报,讨论并通过了《中央档案馆关于开展利用工作的请示报告》后,确定了开放历史档案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进一步要求档案管理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这就给档案工作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必须转变观念,扩大视野,把工作基点放在为国家和社会的建设事业服务上来;必须加快各项工作步伐,改变运行机制,把各项工作纳入到开放历史档案的轨道上来,有机地协调发展。10多年来,中央档案馆为开放历史档案做了多方面的积极准备,并已开始开放了一部分历史档案,今后还要进一步扩大开放范围,以满足社会各方面的迫切需要。

40年来,在提供利用的方式方法上,中央档案馆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从向利用者提供档案原件的复印件转变为提供缩微复制件;从提供档案原始信息逐步转变为提供经过提炼、整理、加工的二次信息;从利用者到档案馆来查阅转变为可以远距离电讯查询和提供信息;将来还要逐步转变为由利用者提出课题,档案馆组织编研为综合信息。

中央档案馆继承和发扬了我国档案史结合的传统,历来十分重视档案史料的编研工作。早在建馆初期,就承担了党中央交给的编印121卷《中央文件汇集》的巨大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并加强了编研工作,提出了“以编为主,编研结合”的方针,制定并执行了长远规划,使近20年来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编辑(含与其他单位合作)出版了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等3部大型系列史料汇编为代表的60多种、两亿多字的史料汇编、选编,使史料编辑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近几年来,编辑出版了一系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手迹选,如《毛泽东手书选集》、《毛泽东词、诗墨迹选》、《周恩来手迹选》、《刘少奇手迹选》和《邓小平手迹选》等,编辑制作的《巨人之声》系列光盘,再现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原始讲话录音,都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赞扬。

中央档案馆主持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毛泽东评点〈智囊〉》、《毛泽东阅点〈资治通鉴〉》、《毛泽东评点诗词曲赋》等更是蜚声中外。其中《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被江泽民总书记1997年访美时送给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珍藏,成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礼物。

此外,中央档案馆还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办了《党的文献》,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作编辑出版了《中共党史资料》,从中经常公布一些党的重要文献。

结合史料编辑进行历史和史料研究是中央档案馆多年来取得的一项成功经验,通过编辑,搜集并熟悉了大量丰富的史料,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所出的成果,必然最具有历史价值,因而受到了普遍的欢迎。40年来,中央档案馆发表的历史学、史科学和档案学研究的论文、专著数以千计,是中央档案馆40年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不断提高现代化的管理水平

不断提高现代化的管理水平,是档案馆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首先,要逐步实现管理工作现代化。这就要求建立、健全科学的管理制度。在这方面,中央档案馆是有优良传统的。早在筹备建馆阶段,就制订了一整套有关的规章制度,使开馆后各项工作都井然有序地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又进一步制定和健全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办法和运行机制,提高了科技含量,使各项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其次,现代化的设备、设施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中央档案馆的库房是50年代设计和建造的,其设备、设施在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就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化管理的要求,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造。从1985年起,先后进行了两期大规模的库房改造工程,不但进行了抗震加固,改造了屋面,提高了库房保温和防湿性能,而且改造更新了供电、通风和通讯系统,配备了先进的空调设备,增设了防火防盗报警和遥控系统,大大改善了保管条件,进一步确保了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近几年来对录音、录像、缩微、复印、打字以及消毒、杀虫等设备设施都进行了更新换代。特别是从80年代初期起,中央档案馆就在档案馆系统中率先开展了电子计算机的应用研究和试验,1985年又配制了M—220K中型计算机,随后又建立了微机网络系统,建立了120多万条档案目录数据库,实现了计算机检索,目前正在对档案资料进行电子扫描,光盘存贮,以实现全息检索,使现代化管理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总之,中央档案馆40年来虽然走过了曲折的历程,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过缺点和失误,目前还有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馆藏的数量和结构还与中央档案馆的性质与地位存在距离;基础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的现代化水平还需作出很大的努力。

不斷提高政治水平和
業者水平，充分發
揮一掃案、資料的作
用，為社會主義的
業服務！

朱德

一九五九年
九月廿日

朱德在開館典禮上的題詞

題贈檔案工作

典謨訓誥，寶之無佚；
隻字片言，亦所珍惜。
分肌擘理，鑒貌辨色；
規圓矩方，依時順序。
創業擴基，前軌可迹；
古為今用，功同史冊。
羣眾躍進，計劃落實；
察往知來，視茲故帙。

董必武

一九五九年
九月十九日

董必武在開館典禮上的題詞

題贈檔案館

前事不忘後事師，白來塔與
華先劫。猶能柱下窺蒼
史，呼鳳興芳聽神詩。
步向中探軌跡，民情似以識溫倪。
士林春祀人間滿，前乃出紅梅死
一枝。

一九六〇年一月廿六日郭沫若

郭沫若

二〇



郭沫若在开馆典礼上的题词

山西“反右倾”运动

牛崇辉 贾玉英

1959年8月21日至9月13日,中共山西省委召开一届十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气氛下,做出了《关于响应党的八中全会号召,为提前和超额完成1959年国民经济而奋斗》的决议。在会上,对1959年全省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再次加码,提出钢、铁、钢材和原煤产量要比1958年分别增长32.9%、52.6%、39.2%、7.7%,全省农林牧副渔的总产值要比1958年增长15%的继续跃进计划。会议还根据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的精神,对一些领导干部错误地进行了批判。会议还决定,用半年时间,首先从县级以上干部开始,然后到共产党的每一个基层支部,开展“反右倾”斗争。会后,全省各报刊连篇累牍开展了“反右倾”的宣传,一霎时全省范围内掀起了“反右倾”运动的高潮。

“反右倾”斗争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内生活中的一次重大的政策失误,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山西在前8个月内受到批判的“左”的政策、措施,又被重新肯定下来,而且使1959年底到1960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发展更为严重。

一、山西“反右倾”运动的集中表现

1、错误批斗了一批敢讲真话的同志,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生

活。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在转发湖南省委关于在10个公社中选择10个大队结合生产进行整社试点，即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经验批语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社整风运动。中共中央的批语对山西省的“反右倾”运动影响很大，山西省委在总结前8个月整社整风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前几个月整社整风，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没有把整社整风提高到‘反右倾’的高度来抓，必须重新整顿。”并于1959年11月15日发出《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在农村中开展整社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全省各地党组织要重新进行农村整社整风运动。通知下达以后，全省各地（市）、县都召开了为期10天至20天的三级干部会议，对于所谓存在严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干部进行了重点批判。不少地（市）、县把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当作所谓攻击党的领导、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进行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由此更加助长了个人专断和广大党员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真话、阿谀逢迎的不正之风，使反右派之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进一步升级，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全省参加“反右倾”运动的10.81万名党员干部中，有3.7%的人分别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1007人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①。

2、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言论，使“五风”再次蔓延开来。“反右倾”运动中，被批判的主要观点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论”、“群众运动得不偿失论”和“‘一平二调’伤农论”。这样使“左”的错误又重新发展起来，已经受到批评的“五风”又恢复、滋长、蔓延开来。特别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高估产、高征购，严重挫

^① 《当代中国的山西》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又加之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山西省完成农业总产值28.69亿元,比上年减少2224万元;粮食总产量完成40.75亿公斤,比上年减少5.49亿公斤^①。不少地方除过征购粮任务,连种籽、饲料、口粮都无法保证。还有一些贫困山区,到第二年春天农民就断了粮,发生浮肿病,人口开始外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仍在说假话,欺上瞒下。晋南地委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晋南地区推广闻喜县创造的巧磨、巧做、巧说、巧算和巧保管‘五大巧’经验,在全区掀起了一场计划用粮节约备荒的运动,从而使农村在秋季节节约用粮2700万斤,城市粮食供应下降15%。”左云县实行粮食高征购,强迫农民在15天内超额完成任务,当时县委领导好大喜功,对农民的疾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结果1960年春天发生严重饥荒,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不少农民背井离乡走出内蒙^②。

3、全面发展公共食堂,强令取消农业生产责任制。山西大办食堂始于1958年8月小社并大社期间,创办食堂最早的是平顺县红星人民公社和汾阳县贾家庄人民公社,《山西日报》作为典型重点报道,向全省各县、社推广其先进经验。到12月底,全省办起了8.75万个公共食堂,参加食堂的户数占全省农户总数的85.6%,农村基本上实现了食堂化^③。

由于创办食堂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从它开始的那天起就一直伴随着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和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首先是集体食堂的场地问题,许多农业社没有闲房作食堂,便动员群众强行搬家,一些农民很不情愿地搬出了世代居住的房屋。其次,桌子和餐具也要从农民家里拿,农民口粮也要全部交到食堂,这样

① 《山西经济》,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3—94页。

② 《光辉灿烂的十年》,1959年10月10日《山西日报》。

③ 《当代中国的山西》上卷,第114页。

做使农民很不满意。加之，农民居住分散，集中就餐很不方便，有的还要翻山越岭，过河淌水，遇到冬天，天寒地冷，农民苦不堪言。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缺乏严格的规章制度，管理混乱。有的食堂事务长一人说了算，财产无数，账目不清，而且从不公布收支情况，群众称之为“豆腐账”。有的食堂粮食无专人保管，随便乱放，随地抛洒，随时受到老鼠的糟蹋。有的炊事员私心太重，小偷小摸，经常把食堂的食物、米面拿回家。有的炊事员从不和社员吃一样饭，背着社员喝酒吃肉，而且在卖饭时不收自家人的饭票。由此，大部分食堂表面上看起来热热闹闹，实际问题成堆，群众意见很大。到1959年上半年，因粮食供应紧张，全省农村解散了一部分公共食堂。

“反右倾”运动以后，各地又重新恢复和发展了食堂。1960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认为食堂“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各级党委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中央要求大力发展公共食堂，山西省又兴起了大办食堂的热潮。截至1960年3月底统计，山西农村总共办起了88100个公共食堂，参加公共食堂的户数达297.87万人，占到全省农村总户数的84.52%，参加食堂的人数达1113万余人，占全省农业人口总数的81.9%^①。本来是“左”倾错误的东西被当成正确的接受下来，而正确的措施、制度反被当作错误来批判。1959年全省整风整社中推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也被否定。《山西日报》在1959年12月17日第三版公开批判左权县石匣人民公社马厰管理区实行“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破坏集体化，使人民重新再过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穷的不平等生活”。这样，全省刚刚推广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被完全取消了。

^① 《山西经济》，第94页。

4、大办“小洋群”、“小土群”，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这是山西省“反右倾”运动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当时省委提出凡有煤炭资源的县市都要搞以煤、铁生产为中心的“小土群”和“小洋群”基地，有条件的人民公社应尽可能地搞一些“小土群”的采煤、采矿、炼铁企业，并以发展“小土群”和“小洋群”作为全省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当时还提出什么“五小成群”，即小煤窑、小铁矿、小高炉、小转炉、小铁路遍地而起。有条件的地方，还要求办小化工、小水泥、小水电等等。到1959年底，全省发展小煤窑1100多个，发展小型化工厂1090个，发展小铁炉9.4万座，修成土铁路34条，约108公里。^①随着“小土群”、“小洋群”的建立，全省各地普遍掀起一个大搞半机械化、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高潮，从工具、设备、生产流程的改革到新产品和原材料的技术革新。到1960年4月，全省革新产品46万件，革新设备21万台(件)^②。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效率，但在技术革新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偏差，主要是浮夸、乱改，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奋斗目标以及盲目采用和推广新技术等。

5、大办社有经济，提早实现由区基本所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1960年3月，山西省第二次六级干部会议之后，省委又提出小社并大社，由管理区基本所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并确定了过渡的5个条件：一是社营经济占优势，其产值占到全公社工农业产值一半以上；二是社员由集体分配的收入每人每年平均达到120至150元，大体接近县(市)营工业工人的最低收入水平；三是穷管理区的经济水平接近或赶上富管理区，穷管理区的社员平均收入比全公社社员平均收入相差不超过10%左右；四是初步实现机械

① 《山西经济》，第163页。

② 《山西经济》，第163页。

化、半机械化；五是广大社员群众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3月底，省委批准运城、稷山、侯马、芮城、洪洞、临汾、临猗、乡宁、长治、沁源、晋城、襄垣、陵川、阳城、榆次、阳泉、平遥、太谷、汾阳、交城、原平、五寨、忻定、大同、太原等县市的34个公社，作为第一批“过渡”试点。这些试点，重犯了“一平二调”的错误，向管理区随意摊派资金，抽调劳力，抽调土地。直到11月全省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才停下来。7个月时间，全省共平调各种农具、牲畜、劳力、车辆、房屋总价值达8亿多元^①。

二、“反右倾”运动后的继续“跃进”

在“反右倾”运动的影响下，“大跃进”的第二次高潮从1959年8月开始，持续到1960年10月，前后14个月。这次“跃进”是在有了一次沉痛冒进教训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一）工业。1959年山西省开始新的“跃进”，结合增产节约，从第四季度开始了超额完成省计划的竞赛活动。1960年第一季度开展了“开门红”、“月月红”活动，第二季度开展大战“红五月”活动，第三季度开展为“七一”和国庆节献礼活动，如此等等，生产运动一个接一个持续不断。

为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大大增加了投资。1959年、1960年山西省经济建设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由“一五”期间的23%上升为60%。两年时间由地方财政支出基建投资比重由“一五”期间的8.68%上升为20.26%。工业生产的大发展，要求更多的人力投入。全省职工人数为151万人，1959年上半年压缩26万人，由于

^① 《山西经济》，第103页。

工业的盲目发展,到年底职工人数又大大回升,不仅占去了大量劳动力,而且造成了资金、粮食的巨大浪费^①。

(二)农业。1959年秋后,全省掀起大办水利的热潮,这一年,动工修建的水库、渠道、水井、挖潜截流、机灌工程达99000多处,全省水利建设投资6亿元,其中从农村社队征集4亿元,相当于“一五”期间全省水利建设的投资总额。从10月下旬开始,全省200万青壮劳力投入水利建设工地,占全省总劳力的50%。晋南、晋中地区在1960年夏收大忙季节仍投入85万人大搞水利建设,当时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农民,农民苦不堪言。

(三)文教卫生。山西的文教卫生工作一直发展缓慢,主要原因是山西自然条件较差,家底薄,农业生产不过关,难以负担太多的非农业人口。这就决定了山西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不能太急太快。但在“大跃进”中,这些部门也进行了超越负荷的大跃进。1958年到1960年3年间,高等学校由4所发展到48所,比1957年以前增加12倍,在校学生由1881人猛增到18751人;中等专业学校由37所发展到156所,学生由23195人猛增到63039人;普通中学由249所发展到824所,学生由150487人猛增到336186人;小学由3.6万所发展到4.8万所,学生由162.8万人猛增到230.4万人。^② 全省医院、疗养院等卫生单位由2818个增加到3200个,卫生技术人员由20328人增加到33087人。此外,农村社队中还有从事文教卫生的民办人员9万人^③。

总之,在“大跃进”高潮中,山西的工业、基建、水利、文教等部门都在“跃进”,都从农业战线拉人,又一起吃农业,把农村经济搞得极其虚弱,成为以后连年粮荒,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的重要原

① 《山西经济》,第104页。

② 《山西经济》,第511页。

③ 《山西经济》,第530页。

因。

三、“反右倾”运动酿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局面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以来，由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错误地进行“反右倾”运动，继续大搞瞎指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等，再加上农业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因而使山西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一)工农业比例关系失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最明显的后果之一，是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60年山西粮食总产量倒退10年，下降到33.72亿公斤，比1951年的31.9亿公斤略高1.81亿公斤；棉花下降到2416万公斤，比1957年减少2359.5万公斤；耕畜比1957年减少5.1万头；生猪存栏数比1957年减少36.73万头^①。在工业方面，虽然1960年钢总产量达到74.95万吨，原煤总产量达到4412万吨，但这是在挤掉轻工业、压垮农业的情况下取得的。由于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致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57年，农轻重的比例是53.5：13.7：32.8，到1960年，三者的比例变化为26.1：16.3：57.6。3年中，农业所占比重下降27.4%，轻工业比重仅上升2.6%，而重工业比重则增长24.8%。这种畸形发展是难以持久的，到头来重工业被迫大幅度下降。1961年，钢的总产量仅达到39.08万吨，原煤总产量只有3258万吨^②。

(二)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积累率急剧升高。1959年，山西基本

^① 《山西经济》，第94页。

^② 《山西经济》，第41—42页。

建设投资上升到1463亿元,比1958年增加1.4亿元,到1960年基本建设投资额又上升到15.3亿元,比1959年增加1亿元。1958年到1960年,山西财政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一五”期间的33.1%提高到51.1%;消费由“一五”期间的66.9%下降到48.9%。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太大,超过了财力物力的实际承受能力,不但直接挤占了当年的消费资金,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由于缺少后续资金和各种物资的供应,造成被迫下马后难以再利用的工程总值高达1.2亿元^①。

(三)城市职工人数大量增加,农村“一平二调”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1958年全省国营企业职工人数达154.3万人,比1957年增长392.86%;1960年又比1958年增加0.83%。加之工人素质低,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不仅使产品成本加大,而且使财政负担过重^②。此外,全省在3年中从农村平调总额达9亿余元,每个农民平均平调67元,以后退赔3亿多元,使财政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③。

(四)财政发生严重困难,银行信贷失控。从1958年开始,山西财政连续4年出现赤字,收支差额共达2.38亿元,每年平均赤字近6000万元,1960年赤字高达1.46亿元。而银行信贷却是重放轻收,甚至提出“为了支援‘大跃进’,需要多少贷给多少”,1958年山西农业贷款高达4.44亿元,1959年至1962年总共发放农业贷款6.52亿元。财政赤字和银行贷款过多,使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出现紧张局面^④。

(五)粮食严重短缺,人民生活遇到极大困难。“大跃进”期间,

① 《当代中国的山西》上卷,第119页。

② 《山西经济》,第531页。

③ 《山西经济》,第103页。

④ 《当代中国的山西》上卷,第119页。

城市人口由 1957 年的 251 万人猛增到 1960 年的 337 万人，致使粮食供求发生尖锐矛盾。1960 年虽然征购粮食 9.43 亿公斤，但供求仍不能平衡，销售大于征购 3.73 亿公斤。为了保证人民的生存需要，被迫挖掉库存 3.25 亿公斤，但还是不能制止粮食脱销。城乡发生浮肿病，人畜出现非正常死亡^①。

1959 年的“反右倾”运动，把党内认识的分歧看成是阶级斗争，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同时打断了经济上纠“左”的进程，致使“左”的思想长期统治党内，经济一直处于低水平发展，直到 60 年代经过国民经济调整，才从根本上扭转了经济困难的局面。

更 正

《中共党史资料》第 70 辑《西北革命的播火者——王懋廷》一文的作者应为高中哲、薛生德。特此更正。

^① 《当代中国的山西》上卷，第 119 页。

解放战争中南下干部的两次派遣

王伟红 李翠艳

解放战争时期,为迎接民主革命在全国的最后胜利,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南进,党中央和各中央局两次大批派遣干部南下,不仅巩固了解放战争的成果,而且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次大规模派遣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解放战争从此拉开了帷幕。经过两年的浴血奋战,到1948年6月,人民解放军总计歼敌264万,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由120万发展到280万,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领导发动了土改和整党,解放区日益巩固、发展和壮大。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即将到来。在这种形势下,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绘制蓝图,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经会议讨论通过,于10月28日发出《中央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要求华北局、华东局、东北局、西北局、中原局等即刻着手训练干部,准备派往解放后的广大南方地区,建立新生的政权,进行当地的各项建设工作。这是第一次大规模派遣。

(一)派遣人数及各区分配情况

《决议》指出:估计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

含有1亿6千万左右的人口,500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和大的城市。到1950年6月,可能发展到3亿3千万左右的人口和1000个左右的县市。根据过去发展新区的经验,每个新开辟区,至少需要县级及区级干部75人左右,500个县,则需干部37500人左右。平均5个县设一地委,每一地委至少需要干部60人左右,500个县有100个地委,共需干部6000人左右。平均30个县设一区党委,每一区党委至少需干部80人左右,500个县有17个区党委,共需干部1360人左右。500个县左右的地区需成立4个中央局,每一中央局至少需要干部300人左右,共需干部1200人左右。此外还需准备7000左右的干部在大城市工作。以上所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共约53000人左右。

《决议》规定:所需上述53000个左右的干部,分配华北17000人,华东15000人,东北15000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决议》还规定:各级各项工作中负主要责任的干部,最低限度,大约需中央局一级160人,区党委一级255人,地委一级1000人,县级350人。此项干部,必须在各地区所抽调的干部内按比例分别列入。如:华东在应抽调的15000名干部中,必须包括中央局一级48人,区党委一级75人,地委一级300人,县委一级1050人。为使干部派遣工作有组织有领导,各地所调干部均应组成完整的区党委架子,整体调出。^①

为贯彻、落实上述规定,华北局于10月29日给各区党委发出指示:除已给中原局调走近千人及华北大学准备2000名学生外,北岳、太行、冀中、冀南、冀鲁豫5个区党委,各配备1个区党委架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375页。

子；太岳和晋中两区党委共同配备1个区党委架子；不足部分由华北局党校准备。12月15日，中央发出的《关于调干职别最低基数指示》规定，一个区党委架子为3362人。1949年2月6日，华北局致电中央，报告2月底第一批集中南下的区党委地书干部配备名单：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徐运北，组织部长郭超，宣传部长申云浦，社会部副部长张金波，行署主任万里，地书陈朴如、白潜、常颂、谢鑫鹤、金风、赵淘。冀南——区党委书记王任重，组织部长郭森，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乔晓光，秘书长韩宁夫，行署主任高元贵，行署秘书长王建德，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卓夫，地书杨新一、周惠、朱效成、柴保忠、刘国平、王含馥。随着中央南下政策的调整，原分配华北的南下干部17000人增至21499人，扣除先期集中的17629人和已送中原的1245人，还差2625人。2月11日，根据形势的变化，华北局对南调干部做如下调整：冀南、冀鲁豫各出1个区党委架子，察省与冀中、太行与太岳各合出1个区党委架子，晋中出半个区党委架子，冀东出1个区党委架子（只4个地委2500人），共17629人。3月21日，华北局做出决定：所缺的2625人，按3个地区架子配备，察哈尔、冀中、太行各一，共555人；其余2070人，由华大革大中调补。以上干部于4月15日前集中。

东北局1949年1月10日做出抽调干部计划：冀东出1个区党委架子，松江与嫩江、合江与黑龙江、吉林与安东、辽宁与辽北、热河与冀热察各合出1个区党委架子。每个区党委架子按中央规定的2500人计算，共15000人。

（二）南下干部训练情况

为了满足抽调53000个干部南下的需要，各区各级党委一项重要任务便是：有计划地大量培养、训练和提拔干部。各地训练干部的方法主要有：第一，教育启发，解除南下顾虑。不少干部对于南下存在着畏难情绪。华北的冀鲁豫区党委由领导讲形势，积极分子

带头学习，在过党日时开展思想斗争，明确南下态度，使阶级觉悟、政策观念提高一步。第二，开办党校，集中学习，提高与统一干部对马列主义及党的政策策略的认识水平。尽快使上下级熟悉，以便配备整套架子，方便南调工作。第三，增设副职，加强锻炼。一般是从下一级的干部中提拔到上一级担任副职。这样，老解放区在大量抽调干部后，不至于造成干部严重缺乏或不适应工作的情况。第四，开办军校、中学、大学和各类专门学校，培养各方面的人才。这些学校还可附设大量短期的速成学校和训练班，以应急需。如，华北局开办了华北大学，一方面接收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还吸收蒋管区的学生参加，进行政治训练后，或留华北工作，或准备南下。第五，吸收解放的城市中原为国民党服务的公教职员，加以改造训练，以补城市工作干部的不足。第六，整顿队伍，练习行军，保证南下干部派遣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正确对待和解决派遣工作中的问题

基于干部南下要背井离乡并且前途未卜，因此积极报名南下的只有少部分阶级觉悟较高的干部。大部分不积极报名，但能服从组织分配，他们中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或顾虑。另有少数人抗拒南下，闹情绪，装病，强调家庭困难，甚至准备半路逃亡。另外，有些做动员工作的干部对于南下困难估计不足，强调吃大米坐汽车火车等；有的按严格干部条件不够，要审减好多人；有些地方组织工作不细致，偏重于自上而下确定名单，发生不服从调动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本位主义，把调干工作当作顶差事，人选不根据工作需要来决定，却采取举手表决甚至抓阄儿的形式来确定。

以上种种问题，各中央局和区党委都提起了重视，并采取了具体的措施。第一，进行整党，反对无组织无纪律，使干部的阶级觉悟和纪律观念大大提高。第二，思想教育和干部带头相结合，把南下工作做为一项光荣的任务来完成。第三，适当解决南下干部的家庭

困难、私人问题，解除干部的后顾之忧。如东北局规定：东北本地进关干部家属一律按军属待遇，一般工人职员则按原职原薪发给。第四，严格把关，保证南下干部质量。华北局规定地委以上所调干部名单，须按时上报华北局审查。同时，要求各区党委组织部应分出得力干部，专门负责进行南下派遣工作的计划、研究、督促、检查之责。

（四）南下干部派往新区的分布情况

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可能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防。我们应作提早一个月行动的准备。华野、中野准备3月渡江，占领南京和苏杭。根据这种情况，中央对各地南下干部做出布置：华东、华中调动的15000名干部，于2月底在徐州集中待命；华北的17000名干部，于2月底集中8000人于石家庄，交华东局率领随华野、中野向江南前进；东北准备以一批城市工作干部交华东局接收上海；中原的豫皖苏分局及皖西区党委所属干部，分别接收芜湖、皖南地区及武汉。除以上抽调的干部外，各局其余担任抽调任务的全部干部，准备随林罗南下，使用于湘鄂赣3省及两广方面。东北、华北干部于3月底集中；中原干部于4月底集中；哈尔滨、沈阳、唐山、天津、北平的城市工作干部，一部分去接收上海、南京、苏杭诸城，一部分准备接收武汉、长沙、南昌、九江、广州诸城。

这次干部派遣工作规模大，时间长，派往区域限于长江南岸，只有少数较远地区。由于缺乏经验，再加上各地干部本来就缺额，要抽调相当于整个解放区干部人数的人员南下，实在是困难重重。但各地都发扬了服从大局、艰苦奋斗的精神，基本上甚至超额完成了调派任务，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进一步展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大规模派遣

1948年8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次大规模战略决战。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已超过国民党军。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为期不远了。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捷报频传。依照顺利发展的军事形势，除实现1949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所规定的9省（指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编者）外，今年内将有可能和必要占领粤、桂、滇、川、黔、宁、青等7省。为此，中共中央于5月30日和6月11日先后发布《解决粤桂滇川黔宁青等地干部办法》和《关于准备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这是第二次大规模南下干部派遣。

（一）派遣原则及分配情况

鉴于各地刚刚抽调了大批干部，已很难在短期内再次抽调大量干部南下。但形势紧迫，中央不得不第二次做出派遣布署。为解决形势需要和干部不足的矛盾，中央规定：第一，华北、东北及山东省立即训练干部。第二，华东局、山东分局及上海、南京、苏州、无锡等市委担负帮助二野经管川黔两省的干部。第三，华东、华中在第一批南下干部配备中改变数目，第一步只配备大中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干部，尔后就地训练招集，以便匀出一批干部用于粤桂滇川黔诸省。第四，由粤桂滇3省党及游击区自筹大批干部。第五，第一时期只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以减少干部的支出。根据以上筹派原则，总共需抽调干部38000人。

对于此38000人的分派，中央作出以下布署：第一，宁、青两省及甘肃部分地区需要5000个干部，原派往西南的3000个老干部

抽出 1000 给四川,其余 2000 留西北。另从华北抽调 3000 在校中学生给西北。第二,川黔两省需要 16000 个干部,华东负责解决大部分(9000 人),基本从刚解放的城市如南京、上海、苏州等地抽出老干部和招收新干部。其余,由山东分局抽调 200 个县以上的老干部,1000 个新干部;华北局(包括中直)抽调 500 个老干部(其中县级以上 400 人),1000 个新干部;东北局抽调 100 个县以上老干部;西北局抽调 1000 个老干部(县级以上 200 个);华中局将在中原的川干队 300 人抽回四川,其余由二野部队干部中抽补。第三,粤、桂、滇 3 省需要干部 17000 人,由以下几方面筹派:原派华中的李楚离队 2900 人(其中有 700 个新干部),华中各省抽调 700 个老干部,武汉训练 3000 个新干部,从南下工作团和华北局补充武光队的学生中抽调 4000 人;由香港及粤、桂、滇 3 省自筹 5000 个老干部(县级以上干部 200 人);东北局调派 400 个老干部(县级以上干部 200 人),华北局调派 300 个老干部(县级以上干部 100 人);不足部分由四野部队(包括两广纵队)干部中抽调。^①

华东局抽调的 14000 个干部,分派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

	华支	南京	山东	苏南	皖南	上海 学生	上海 各机关	合计
新干部			1000	1000		3000	2700	7700
老干部	3000	2000		140			1000	6140
县以上 干部			200	45	50		100	395
总计	3000	2000	1200	1185	50	3000	3800	14235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第 659—661 页。

(二)此次派遣的新特点

此次大规模派遣工作与第一次比较,有其新的特点:第一,时间短。中央要求在7月底前征调完毕,从发出指示到完成征调不足2个月。第二,任务重。这次派遣是在已抽调了53000人之后进行的,老解放区干部严重不足,派往新解放区的干部尚未完全就位,再抽调38000人,对各地是一次十分严峻的考验。第三,地域偏远。这次派遣地域主要是南方5省,南下干部思想顾虑更甚,派遣工作更为困难,需要解决更多的问题,如干部要求带家属等。第四,重点派遣。经过第一次派遣,老解放区各级组织均已极大削弱,不能再全面调派。南下干部首先保证派往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尔后就地召集训练培养当地干部,逐渐推广到各占领区。第五,派遣与自筹相结合。为减轻老解放区负担,南方各省党组织和游击区须配合派遣工作,招收和训练本地干部。第六,新老结合,以便达到迅速、高效的目的。第七,有经验可循。根据第一次派遣中出现的问题,这次派遣工作做得更为细致,考虑到种种因素,适时采取解决办法。如:针对这次南下行军更艰苦,干部还可能水土不服,易闹病等,采取了配备医生、发放蚊帐等生活用品的办法。

解放战争中两次大规模南下干部的派遣,共派出干部近10万人。这些干部在南方新解放区开展工作,迅速巩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果实,支援了南方的建设。老解放区在本地干部短缺的情况下,能够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精神,打破地域界限,克服重重困难,两次大批派遣南下干部,反映了党中央的强大凝聚力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风貌。这不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建国后全国各地区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苏关系的恶化

——俄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三）

马贵凡 译

1959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邀请我正式访问华盛顿，我接受了邀请，并于当年秋天访问了华盛顿。但是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却越来越恶化了，不过当时分歧还限定在两国领导人的内部谈判范围之内，没有在报上公开。突然，中国向印度发起了侵略行动。我们同印度有很好的关系。我们高度评价印度人民的领导人、政府首脑尼赫鲁先生及其坚持加强同苏联的友好关系的方针的战友。

我们的代表团访问了印度，我们了解了这个国家。当然，要真正了解像印度这样的伟大国家和它的人民，短暂的访问显然是不够的。但是我们对这个美好的国家还是有了比访问前更具体的概念，而主要是更了解了尼赫鲁及其战友。

中国人对印度的态度基本上也是友好的。他们共同倡导召开了万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会议通过的宣言号召实行和平共处。这也加深了我们对世界形势的理解，并且还带来了加强中国同印度的友好关系的希望。在国际问题上他们取得了共识，好像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们的友谊会遭到破坏。因此我们很高兴，并且我们自己也朝着这个方向作出努力，加强同这两个国家的联系。我们访问印度之后，同尼赫鲁的关系更加巩固了。

* 本文选译自俄国《历史问题》杂志1993年第3期。

尼赫鲁也来到苏联访问，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然他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具有自己的政治观点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活动家、民主主义者。我们知道，虽然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拥护苏联的国家制度，但是他想为自己的人民做好事，想把印度的生活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当时他还声音很轻地谈到社会主义，我们很难理解他指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其实，“社会主义”这个术语用得很庸俗，甚至希特勒也使用这个词。暂时还不清楚印度沿着怎样的战略方向发展。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表现出有耐心，不要急于在谈话中涉及这个题目。要让生活本身迫使尼赫鲁站到满足人民群众要求的正确立场上来。当然，我们是千方百计地在实践中促使印度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何况我们同当时由高士领导的印度共产党有着良好关系。

但是现在发生了印中冲突，后来冲突规模进一步扩大，投入了大量军队，争夺有争议地区，彼此都有人员伤亡。中国的报纸痛骂尼赫鲁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被谴责的人身上，中国人善于公开给人加上这个称号。我们不赞同他们的看法，我们的报纸表现得很谨慎，采取了这样的表述方法：据说，对我们友好的印度人民与兄弟的中国人民之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冲突。就是使用了“友好的印度和兄弟的中国”这些词，以此表明中国与我们更接近。实际上也是这样：中国确实在思想上，在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目标上与我们更接近。印度在尼赫鲁时代没有提出这样的目标。因此我们从文字上对这两个国家做了相应的区分。

他们边境上的战斗在不断升级。我从华盛顿回到莫斯科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国庆祝国庆日。我们应派代表团去那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认为，我应率团前往。他们考虑到，在我们同中国的关系迅速恶化的情况下，如果我这个在我们党内地位最高的

人不去那里,北京会认为这是轻视中国国庆节的作用和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同志们对我说:“因此,尽管您刚从华盛顿归来,您也要鼓足干劲去中国一趟,在那里代表苏维埃国家和它的共产党出席庆祝大会,顺便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相应的会谈(这是主要的事情)。”

印度边境上的战事在日趋激化,我们必须对那里发生的事件表明自己的态度。莫斯科发表了塔斯社声明,声明中说,我们对兄弟的中国和友好的印度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感到遗憾,并希望各方作出努力停止军事行动,恢复以前的关系。我出现在北京时,中国领导人表面上对我招待得十分殷勤,但我感觉得到,他们心里对苏联的政治路线和我本人很不满意。我们举行了会晤,中国人在会谈中始终让某一个人担任主要论敌的角色,也就是并非所有人都同我交谈,其他人是坐在那里默默不语。毛一般不承担令人不愉快的话题,这类谈话他责成某一个人进行。如关于苏联拨款修建经由新疆同我们相连接的铁路问题,就是周恩来谈的。毛还责成他进行了关于将旅顺口无偿移交给中国的问题的谈判。周进行会谈很有礼貌,有很讲究的外交风格,从不使用粗鲁语言,不仅对对话者是这样,而且对第三者也是这样。

外交部长陈毅的举止则不同。我不知道,这是他的性格特点,还是根据政治上的考虑要求他这样做的。他表现出是一个在语言表达上很尖锐,在态度上很粗鲁,在行为上很笨拙的人。对他的这个结论,我是根据同他的具体交谈得出的。请看我们的交谈是怎样进行的吧。他一开始就说:“为什么你们通过塔斯社发表这样内容的声明?要知道,尼赫鲁是个没有出息的人”(并开始大骂尼赫鲁)。现在我想不起来了部长骂人的话。当然也没有这个必要。陈毅说了各种有损人的尊严的话,直至对尼赫鲁的个人侮辱。他给尼赫鲁作出了政治评价,说尼赫鲁是社会主义的最坏敌人,是美帝国主义

的代理人。印度不赶走或者不消灭尼赫鲁就不可能有今后的进步和发展。

当然，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对尼赫鲁的社会作用及其人格作出这样的评价。我论证说，我们有另一种看法，我们对尼赫鲁先生是另一种态度，我们认为，在印度的所有资产阶级人士当中，他恰恰是最进步的人，他在实行反帝政策，没有同美国签订任何反人民的条约，而作为印度的邻邦，巴基斯坦却同美国缔结了军事同盟。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尼赫鲁推开。相反，我们需要巩固尼赫鲁在印度的地位，因为在那里如果推翻尼赫鲁，反动势力就会执政，他们就会改变印度的政策，同帝国主义接近，而这对苏联，对中国都是不利的。我还说，我们不理解目前两国军事冲突的起因：两国争夺的地区人烟稀少，地处高寒地带，根本不为人所知，这些地区有什么意义呢？这些地区的问题应该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接着我举出了早在列宁时代我们同苏联周边非社会主义国家解决边界问题的各种例子。如列宁迅速解决了同土耳其的边界争端，向它让出了俄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占领的很大一片地区。这片地区居住着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的国旗上有带有阿拉腊山图案的国徽，而阿拉腊山现在已在土耳其境内。甚至土耳其人还向我们提出质问，为什么亚美尼亚在其国徽上绘有阿拉腊山，这不是对土耳其领土存有野心吗？我们回答土耳其人说：为什么你们在自己的国旗上绘有新月图案？要知道，月亮有一半不属于土耳其。你们怎么想把宇宙划归己有？因此画上月亮作为象征？争论停止了，伊斯坦布尔撤销了质问。然后我还举了其他例子。当时正好我们结束了同伊朗的具体划界谈判，我们又作出很大让步，根据互让原则解决了领土争端。我们高兴的是，结束了持续多年的争论。“为什么中国现在需要在边界问题上进行一场战争呢？对此我们不理解”。

但是被鼓动起来的陈毅，反复说：“尼赫鲁、尼赫鲁、尼赫鲁！印度在实行帝国主义政策。中国人将把战争一直进行下去，不消灭印度军队不罢休。”这种声明使我们感到不安。还需要记起的是，在那之前还发生了令中国不快的西藏事件。那里发生了暴乱。一开始中国人在那里的力量不大，而西藏人在斗争中表现出色，甚至一度掌握了政权。当时印度采取了反华亲西藏立场。它虽然不是直接地但很明显对西藏人表示了同情。我对中国同志说，对待此事应该宽宏大量和给以理解。要知道在西藏问题上尼赫鲁很难从政治上给中国以支持。应该考虑到，西藏同印度接壤，独立的西藏作为一个弱小的国家对印度更有利，不构成任何威胁。而中国的西藏令它生厌。

虽然我们完全站在中国一边，但我呼吁北京表现出理智，希望它理解，尼赫鲁不是共产党人，不同情我们的终极志向，因此很难想象，他在中国反对西藏叛乱分子的斗争中会站在中国一边。然而我是枉费心机，他们没有同意我的意见。会谈就是这样进行的。而他们是怎样欢迎我们代表团的呢？那完全是“东方风格”。迎接是很客气的，宴会时的交谈也是很客气的。可是会谈进行得很紧张，甚至也很尖锐，但没有影响到送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毅都来到机场与我们话别。

后来中国对印度的军事行动是怎样发展的呢？中国军队装备精良，很有纪律性，不久前又受到了严格的作战训练，这些都是印度人所没有的，自然，印度人遭到了很大的失败。在那里，具体的作战行动是怎样进行和结束的，我现在就不谈了，这从报纸上可以看到，而且我也是利用了几乎整个世界舆论所利用的那些材料。与此相联系，我只想再谈一个方面，这就是军事冲突给印度的进步社会团体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印度共产党处境艰难。该党在如何对待同中国的战争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多数党员跟随主张捍卫祖国并

支持尼赫鲁的行动的高士，但部分很优秀的共产党人、党中央委员（我本人认识他们并尊敬他们）采取了亲华立场，表示赞成打败印度军队。北京则开展了强有力的宣传鼓动运动，反对印共多数派，因而也是反对采取了类似立场，主张不分胜负停止战争的苏联共产党。战争最终还是结束了。

不久也出现了我们同中国的边界问题。那里有早在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前确定的边界，并且我们在严格坚持这条边界。一开始中国方面没有守卫，而我们方面驻有边防军。当然，我们对这条边界的守卫也是象征性的。中国的放牧人经常赶牲口过界到苏联领土上放牧。他们向来都这样做，而我们从未就此提出过任何要求，更不要说抗议了。好像还有某种协议，规定在哪些地方中国公民可以在我们的边境地区放牧。与这个问题有密切联系的是中国同蒙古的关系问题。我也想谈谈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在苏中两国代表的一次会晤中提出的。中方由毛泽东率领，而问题是由周恩来向我们提出的。当然我们知道，周恩来所说的都是毛泽东口授给他的。

周恩来好像转弯抹角地提出了问题：“让蒙古加入中国版图，你们怎么看？”我反驳说：“对你提出的问题很难作出回答。它涉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因此你应该去问蒙古同志。这与我们无关，我们是第三方。”看来，中国人预计到了这样的回答，因为周马上说：“好，那你个人是什么意思？你本人对此是怎么想的？”我回答说：“我们对此事的态度取决于乌兰巴托怎么看。但我想，恐怕这样的建议未必会使蒙古人感到高兴。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已经存在多年，它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和议会。对他们来说，现在加入中国版图，那就意味着失去独立。这未必能合他们的心意。此外，现在蒙古就要加入联合国了。许多国家同它有外交关系。所有这一切蒙古应该失去吗？为了什么？我认为，你们的建议还会

给蒙古领导人造成困难。但我根本不想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说什么。”到此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中国人未再重提。

而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更加恶化时，北京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领土要求，还指责我们占领了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中国人从故纸堆中找出一个问题：说什么苏联又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纳入俄国版图的土地，即波兰部分土地、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并为己有。一句话，苏联政府正像中国人在无线电广播中所极力宣扬的那样，在实行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即掠夺别国土地的政策。

我认为，对此苏联政府作出了很合理的解释，它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如果现在宣布历史上形成的边界无效，不承认我们兄弟国家社会主义政府拥有从帝国政府、沙皇政府或王国政府继承下来的领土的合法性，并开始到远古时代各民族分散居住的地区去寻找民族边界，那我们就会迷失方向、互相争吵，也未必能理智地解决这个问题。要知道，那样一来，现在拥有自己国家的各个民族都要失去其领土，因为他们来到了新的地方，居住在不属于他们先祖的土地上。所有这些人都是在某时从某地迁徙过来的，现在在这里居住。今天也不能把他们赶到月球上去呀？所以重新审定边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它不是追求合理的目的。抛出这种理论是要离间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混水摸鱼，对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侵略性政策。这是错误的方针。遗憾的是，中国仍在实行这种方针。

蒙古本身决定进一步明确它同中国的边界。这也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蒙古的土地由两部分组成。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蒙古人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国家，而另一部分蒙古人居住在中国境内。那块土地叫内蒙古，因为它位于里面，夹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的非蒙古领土之间。这里如何划界呀？这里很难寻找民族或历史的地界，因为目前的边界是硬割断了蒙古人民的身体和蒙古

国家的古代领土。所以蒙古同中国交换了地图，已开始进行谈判。应坦率地说：我感到惊喜的是，争论的问题解决的很迅速，而且中国人没有特别坚持他们最初的建议。不久，双方达成了双边协议，标定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都感到满意的更详细的边界线。他们签订了这方面的条约并确立了两国都正式承认的固定边界。

我们这里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这个时候中国报纸开始怀疑早就确立的苏中边界。在同我们的顾问们交谈时，北京领导人简直是敌对地宣称，俄国人从中国夺走了远东和其他相邻领土。我们想同北京就所有边界问题达成协议，永远消灭这种论调。我们之间对沿乌苏里河和其他河流走向的边界发生了某些误会。众所周知，随着时间的推移，河流在改道，形成一些岛屿。按着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条约，边界是沿河流的中国岸边走向，而不是像通常的国际惯例沿主航道走向。因此如果形成新的岛屿，它们就属于俄国。确实，在某些岛屿上我们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居民的利益。他们在那里打柴、放牲口。我们兄弟般地对待和理解这种生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边防军对侵犯边境的行为是睁一眼闭一眼的。

但后来情况激化了，中国人开始开枪射击我们的边境巡逻艇，我们的边防军同中国“农民”发生了冲突。我们的边防军长官报告说，这些人根本不是农民，而是化装成老百姓的边防军。他们，即所谓的农民，揪住我们边防军的衣襟，用武器相威胁。而我们的边防军需要对他们作出应有的反应，我们的边防军很有纪律性，严格执行指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挑起军事冲突。因此开始时这些冲突基本上都是和平结束的：互相抓住衣服不放，拉掉了衣扣，有时甚至发展到打嘴巴子的地步，但没有使用武器。

我们正式向北京提出：“让我们达成协议吧！我们为什么让我们的边防军去等待发生对两国都有害的大规模冲突呢？”我不记得书信来往进行了多长时间，中国答复说，同意举行会晤。我们成立

了政府委员会，并建议中国选择会晤地点。中国人建议会晤在他们领土上举行，我们同意了。谈判开始了。一开始北京口头说明了他们的领土要求。他们要求把海参崴和苏联中亚共和国的很大一片领土划给中国。我们当然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要求，或者那怕以这种要求作为进行谈判的基础。我方对问题作出说明并对业已形成的边界作出解释。最后商定，双方提出各自的地图和改变现存边界的建议。我们制定了这样的地图，政府审定后责成全权代表交给了北京。中国人也提交了自己的地图。

当我们看到中国的地图时，发现他们已不把海参崴标作中国的领地，这个要求被默默取消了。但标出了中国要求的一些界河上的岛屿，而主要一点是要求河上边界不沿中国岸边走向，而沿主航道走向。我们同意这个方案，因为按照国际惯例边界多半都是按界河主航道走向。总的来说，我们在同中国解决争议问题时是尽量根据国际惯例办事。最后，我们同意把中国要求的多数岛屿交给他们，此后在我们之间实际上就不存在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了。唯一的例外是：北京主张，中国轮船可以利用黑龙江在哈巴罗夫斯克地区的主河道。而按同俄国签订的老条约，他们只有权在靠近中国岸边的水流上航行。现在北京要求有直接在哈巴罗夫斯克城下航行的权利。我们想维持老协议，因为我们的关系很紧张，我们不想让不友好的人接近这样重要的地点。中国人不同意我们的意见。这一条没有达成协议。

至于其余边界线（它长达 2000 多公里，而且许多地方的陆地边界是沿着只有猎人才会光顾的山脉走向的），我们看了中国的全部要求后，建议我们的代表团持中间立场，有争议地段不大，无论对于我们，还是在我们看来对于中国，都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想用直尺划线，把它们一分为二：有的地方我们让给中国，有的突出部分割给我们。这样做的结果，不是简单地做补偿，而是拉直了

边界。当然，就地不能用直尺划定边界，因为边界不是为可以飞越它的鸟儿划定的。理想的边界应该是沿着边防军可以达到的地方走向，所以分界线当然应该到当地具体划定。我们的出发点是，最好不要由于微不足道的东西得罪人，而要达成和睦的协议。我们觉得，在这里正如通常所说，是正负相抵：在一个地方是我们作出让步，而在另一个地方是中方作出让步。我们希望，将找到一种既不损害两国的威信，也不损害两国的基本领土的总的解决办法。

我们的代表团说明了苏联政府的这种立场。但北京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议，坚持所有问题都只能按照中国的地图所标明的那样去解决。签订边界条约的主要障碍，现在已经不是中国人拒绝接受我们的建议，而是别的因素。最后，我们准备接受他们的新建议，永久地解决有争议的问题。主要问题是，北京要求在条约文本中承认，苏中边界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确立的，当年中国很弱，沙皇政府用武力把对俄国有利的边界强加给了中国。北京要求在条约中写上边界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要求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要知道，以前的俄中条约是由双方签订的，一些条约已有几百年，另一些条约已有几十年。如果同意北京的意见，那就要放弃俄国以前得到的所有领土，并且为了中国的公正，要退回不平等索取的领土。北京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现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当我们看到不能达成协议，并且他们可能向我们提出新的要求时，我们真诚而坦率地声明，中国要求的领土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曾在那里派驻人员，依靠武力从当地居民身上收取贡赋，因此北京现在认为那些土地是中国的。但是过去和现在在那里生活的根本不是中国人，而是哥萨克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以及其他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民族。在滨海地区，中国人只有一些居民点，试图将这个边疆地区殖民地化，主要是猎人和商

人。他们也享有俄国人所享有的那些权利，后来俄国人渗透到那里，并从经济上逐渐把中国人排挤走了，而从政治上把滨海地区并入俄国的事情早就发生了。现在要重新审定历史上形成的边界，对它们提出怀疑和试图加以改变的任何尝试都是徒劳的，都不会有助于改善国家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不可能解决国家间的任何争端。

结果，我们的代表团从中国返回，没有达成协议。下次会议应在苏联举行。我国政府研究了所有需要研究的问题，并给我们的代表团作出了相应的指示。代表团将由苏联边防军司令率领。此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稳健、有理智，能够完全明白事理地进行目前的谈判。这以后我们询问中国，何时我们两国代表团能够举行会晤。但北京根本没有答复我们。直到我的国务和党务工作结束，苏联也没有收到答复。现在相应的事态在如何发展，我只能从报纸上了解到。从报纸上可以看出，苏联的立场是明确的，没有任何变化，而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仍在实行我在任时所实行的方针。

我要补充说明一点：最模棱两可的问题是帕米尔问题。沙皇政府和中国所签订的任何条约都没有对帕米尔的地位作出规定。现在就出现了问题。我们指示我们的代表团作出说明：帕米尔在历史上有塔吉克人居住，所以应该属于他们。无论现在还是过去在那里都没有任何中国人。这里突然谈到了什么问题呢？是说那里的边界应该是历史上形成的那样。中国人对这个说明作出了怎样的反应？我说不好，因为在我任政府首脑期间，我们未再举行会晤。

现在由库兹涅佐夫率领的我国代表团又在进行谈判。谈判进行得怎样？北京提出了什么要求？我不知道。但根据中国报纸上的说法可以看出，北京仍在像以前我领导苏联政府时那样，对苏联实行不友好的政策。很遗憾！但我相信，终归会有一天（虽然我不

知道这一天何时到来),中国领导人明白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为了自己人民的利益,为了在世界上争取和平,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团结起来的必要性。到那时双方会明智地消除冲突,开始尽一切努力加强共同的友谊,共同向马克思和列宁提出的目标前进。

谈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史时,我主要谈的是国家问题。但国家间的争吵不能不涉及党际间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想举出一些事实说明中共同苏共、同其他兄弟党关系的发展情况。如果说在万隆会议之后,中国是在统一的争取和平和争取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士队伍之中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开始分出己的政策,最后发展到开始破坏这个运动本身的地步。大家知道,各种社会阶层、各种宗教和各种经济地位的人士都参加了争取和平的斗争,他们是为了一个愿望,即保障人民之间的和平而联合起来的。我在自己的工作中毫不退缩地遵循了这个原则,尽力宣传这个原则。我过去和现在都相信,这样的政策既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也符合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

中国还在50年代就开始逐步破坏这个运动,不同意和平共处的论点,宣称和平共处会导致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削弱人民改变世界现状的革命激情;只有非常积极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行动能够促进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应该更加强有力地进行革命工作,不要分心去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因为这种斗争会解除人民群众的武装和削弱他们的力量。北京还反对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这种运动,宣称同他们的联合是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我们则认为,削弱这种运动,使相信我们并尽一切努力保障世界和平的人与自己疏远,这是不明智的。例如,伊顿是个大资本家,但他是个明智的人,他真诚地拥护和平,主张美苏和平共处。我们为什么要与他疏远呢?因为他是资本家?愚蠢。许多有很高地位的宗教人士也站在和平共处的立场上。我们也认为使他们与自己疏远是不明智的。

与此相联系，我想提及一个出色的人物，即法国的一位通读教规的人基尔。此人现已去世。我访问法国时，同他交谈过。此人曾为组织爱国主义者进行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做了很多工作，后来直至生命结束始终忠实于争取和平的事业。怎么能把这样的人推开呢？相反，应该动员所有这些力量，让他们同共产党人在同一方向上工作，并为保障世界和平和争取更好的社会重建而斗争。但对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改造和变革，这是每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组织工人阶级，同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联盟，努力争取马列主义的改造社会思想的胜利。我们也在为此做工作。

北京则在竭尽全力破坏争取和平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建立宗派集团，在各国和平代表会议上制造种种困难，阻挠通过统一的决议。在中国国内，他们也在做大量的工作要搞臭整个苏联的政策，特别是苏联的在华专家。结果出现了我们的专家已经不能在那里进行正常工作的情况。不相信他们，简直在嘲弄他们。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专家继续在中国逗留已无助于改善我们两国间的关系。我们追求的目的是，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提供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而现在这一切都变成了用来反对我们的东西：有意侮辱我们的技术建议、我们的机床和我们的设备。我们有相当多的人员在中国工作。为他们制造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生活、工作条件。因此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怎么办？须知，我们向那里派遣了优秀的专家和出色的工人，甚至有损于苏维埃国家；我们割舍了在国内工农业部门培养出来的最好干部。可是现在不是珍视我们的友好援助，以前的朋友反而用来反对我们，败坏我们的声誉，侮辱我们的同志。

作出召回专家的决定时，下面这个情况也起了作用。当时中国同北越发生了意见分歧。这之后中国人从那里召回了自己的所有专家。而现在我们处于的状况是：我们的人在中国的逗留没有达到

派他们去所要达到的目的。除了让这些回国，没有别的出路。但当我们把他们召回时，中国人便开始大肆鼓噪，在兄弟党的共产党人面前进行表演，说什么苏联采取了这种行动，取消了对中国的援助。北京有进行这种宣传的能手。当然，我始终强调这样一点：我讲“中国人”时，绝不是指整个人民。中国人大多数是受人尊敬的友善的和非常勤劳的人民。我所讲的只是针对毛泽东集团。是毛实行了这种反对我们的政策，首先正是他应承担同我们决裂的责任。整个中国共产党，更不要说中国人民，在这方面是没有过错的，他们本身也是不理智政策的受害者。

在我们发生分歧的第一阶段，北京同我们的斗争，还没有超出党际间关系和内部接触的范围，关于这场斗争的材料没有见诸报端。但他们进行的这种大范围的反对我们的工作，当然不能掩人耳目，到处议论纷纷。国外吹起了反苏号角，说中国同苏联的决裂已为期不远，它们的争吵在日益加剧。这使马列主义政治的敌人感到高兴，而且他们有有力的根据。在报纸上的公开论战开始之前，我们发现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转到中国的立场上去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正是在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我们认为，这种访问从原则上讲始终是有好处的。我们也满意地访问过中国并准备还进行工作访问。我们把所有兄弟党代表的访问都看作是建立个人关系的有益方式，这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在战斗中坚持共同的马列主义锐利武器。

然而，原来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这次具体访问是追求另一个目的。我们了解到中国人同这个代表团进行了怎样的谈话后简直惊呆了。谈话是秘密进行的。但是代表团路过莫斯科时，一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来到安德罗波夫处，她坚持同苏联友好的立场，对进行的会谈感到气愤。这位坚定的女共产党人以前曾受到同意大利法西斯作斗争的严峻磨炼，经受过监狱里的拷打。她在

狱中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她是一个非常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她像其他真正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一样，拥护同苏联友好，并同志式地讲述了在北京举行会谈的情况，对他们的反苏方针感到震惊。她说，会谈的发起者是中国人，但阿尔巴尼亚人心甘情愿地作出了响应，并接受了北京的反苏论点。

我们当时则表现出了很大的幼稚性。那时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在我们这里住院治疗。好像当时主管苏共中央一个部的工作、专管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联络工作的安德罗波夫去看他，对他说，我们得到了什么什么消息，甚至告诉他，是谁向我们提供的。我们认为，谢胡和霍查是我们的真正朋友，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没有怀疑这种消息会使他们同我们一样感到震惊。我们以为，他们不会赞同这种观点，但我们大错特错了。我们的人刚一离开，谢胡就立即脱掉病号服飞回阿尔巴尼亚去了。在那里对主张同苏联友好的人士真正展开了大追捕，宣布他们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敌人，是自己祖国的敌人。而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位女共产党人被清出了政治局，好像还被开除了党籍。最后，一般说来会把她逮捕，我想也会从肉体上把她消灭。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如真正的野兽，他们残酷地镇压了所有不合他们心意的人。他们成立了由巴卢库领导的臭名昭著的三人小组，由他们作出判决和亲手执行。

当我们了解到在阿尔巴尼亚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我们再也忍耐不了了，我们决定要采取一些措施。这方面情况我在后面再说。这个时候中国人在我们国家开展了宣传活动。他们的学生开始在学校里散发反苏书籍或传单，试图在街道和广场上组织反苏示威游行。我们根据国家间交换原则派到中国学习的学生遭到种种嘲弄，实际上已无法学习。我们决定把他们召回，同时建议中国学生离开我们国家，要求北京撤走那些在苏联的行为举止不体面的人。当这些人返回中国时，在进入蒙古之前的最后一个火车站上举行

了不合体统的示威活动。这简直是卑鄙的行为！而且这是“文明的人”干的事情，但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样做有失观瞻，他们什么都清楚，他们这样做正是要对我们作出独特的越轨举动。

当然，不能对公众隐瞒这种举动，我们认为这是误会，期待一切都会正常化。我们同北京的关系已紧张到了极点。我告诉你们，还在关系密切的时期，我们签订了在核能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包括向中国转让制造原子武器工艺的秘密。我们基本上向中国提供了一切。我们对中国没有秘密可言，而且他们从事原子问题研究的学者、工程师和设计人员同我们的原子弹专家肩并肩地工作。当中国请求我们提供原子弹时，我们责成我们的学者接待它的代表并教他们如何制造。我们的学者建议为他们做一个适当的模型。我现在无法说明，这个模型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做模型。这里有国家秘密问题，只能点到为止。最后确实制造了一个威力不大的原子弹模型。

正是在我们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有关的中国专家的学习结束了，模型也已经包装好了。苏联原子能工业部长（职务是另一种叫法）报告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包括发送模型的决定，他们准备把模型发出，请给信号吧！我们举行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我们很难决定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撕毁协议，不发出原子弹模型，中国就会利用一切情况来反对我们。但另一方面，他们这样辱骂我们，向我们提出了难以想象的领土要求，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像顺从的奴隶那样给他们提供原子弹吗？我们决定不发出原子弹模型。我们刚一这样做，中国人就马上利用这个情况，当然是让兄弟党再次起来反对苏共了。他们抱怨说，苏联不同中国分享他们的国防成就，不想向中国提供帮助。当然，这是谎话，因为中国拥有的所有现代武器，都是按着从苏联得到的样品并在我们的全面协助下制造的。它了解射击、火炮、坦克、导弹、空中、海上等任何种类武

器的整个生产工艺。基本上北京要求的一切我们都给它提供了，包括最好的样品。

虽然一开始我们的思想对抗是通过内部渠道或采用影射的方式进行的，但北京也认为任何方法都可以使用。当时中国和苏联都遵守的唯一一条是，我们都不诉诸报端，尤其不要涉及领导国家和党的生活的个人。但是，当我已经退休时，我在报纸上看到并从无线电里听到中国人对我，对苏联新领导人的谩骂语言。谩骂得如此尖锐，就是从阶级敌人那里也不是经常听得到的。更不要说，还有“不友好的”声明，还有怀有敌意的推翻苏联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了。这方面情况我就不讲了，因为我们的报纸对这种现象给予了足够的注意。

遗憾的是，就这样形成了我们的新关系。对于真正的、诚实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很痛心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我个人也很痛心。我曾衷心地信赖中国，也愿意信赖中国，曾为它的胜利而高兴，曾怀着钦佩的心情注视着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旗帜下所进行的争取解放的斗争。确实，那时我们大家都为中国同志取得胜利而高兴，认为这是所有进步力量的巨大胜利。遗憾的是，现在我们的力量分散了，因此社会主义阵营也削弱了。但我相信，肯定这不会持续很久。中国共产党会在自身中找到健康因素，战胜折磨它的疾病。

唉，目前在中国共产党中发生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是斯大林当年对我们共产党所做的事情的重演。斯大林也是以为革命，为社会主义和为反对人民的敌人而斗争作掩饰。但谁是“人民的敌人”？是共产党中的最优秀分子，是同列宁一起创建党并在列宁的领导下在从事地下活动时期和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做工作的那些干部。就是把这些人宣布为人民的敌人。现在已为他们恢复了名誉。其实他们的名誉还没有得到彻底恢复，我们还没有以历史和公正所

要求给予的那种注意力去对待他们的名誉。但是这方面的发展进程是确定不移的，真理必胜。在党的二十大上，我们表现出勇气，讲了真话。现在则应当密切注意不让斯大林的这种行为在将来重演，因为总的说来，这种行为还没有被彻底根除。应当采取专门的措施来保护人民，消除在国内建立独裁的可能性。主要是要有民主，要有党员和全体人民的高度文化、道德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自己就能保护自己，避免发生暴政和滥用权力现象。

现在中国发生的情况很像以前我们这里发生的情况。毛泽东，据说为所欲为，在战胜蒋介石之后，他积蓄了力量并牢牢掌握了政权，而现在他开始迫害那些同他一起夺取了胜利的人。为了消灭党的干部，他正是采用了斯大林使用过的方法，尽管这些方法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遭到了揭露和谴责。毛赞成我们的决定，并本着决定的精神发表许多谈话，但后来却想出了“文化革命”。关文化什么事呀？问题不在于，在什么具体口号下把诚实的人送上断头台，而在于，这样做是为了确立一个人的政权。在我们这里是斯大林，在中国是毛泽东。而且这种危险威胁着所有兄弟国家并可能在任何一个共产党内重演。没有任何不重演的保证。任何话都不能阻止暴政的侵入。只有党，只有人民，如果他们意识到自己对历史的责任，并且尊重人的尊严的话，那么他们不仅以集体形式，而且单独每一个成员都能够设置障碍阻止实行个人独裁。否则就不能与个人独裁相对抗，不能为了人民的利益和马列主义的胜利而去进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

提出“百花齐放”口号后，毛为在口头上或在报纸上，在党内或在民众之中自由发表各种意见打开了闸门。实质上，这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一种恶毒的挑衅。他让人们交心，然后开始把那些他认为其思想是有害的人消灭掉。在这种情况下他始终以同有害的思想作斗争作掩饰。但是谁来确定有益或有害的呢？毛本人。因此每一

个顶撞过他的人都成了对新制度有害的人。在我们这里，斯大林把最应受到尊敬的人打成了“人民的敌人”。而昨天为这些人鼓掌的人，今天却要求处死他们，赞扬滥用权力，不要求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斯大林找到了善于歪曲事情真相，捏造事实并加以传播的人。现在毛的做法与斯大林如出一辙。

毛对斯大林个人态度的变化是很有意思的。斯大林去世后，我们同毛会晤时，他很不高兴地对斯大林作出评价，指责他不了解中国革命实质，低估了人民的能力。我很难理解毛对工人阶级的看法。在同蒋介石打仗时，毛更多的是依靠农民，基本上认为农民比工人阶级更革命。为此斯大林批评过毛。而后者举出具体事实，援引斯大林给蒋介石和给他的信，从中得出，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进行活动的共产国际，对中国起了很有害的作用，因此共产国际设在莫斯科，斯大林建议什么，它就干什么。毛气愤的是，曾建议他不要同蒋介石进行特别的争斗，而要想方设法同他建立联系，联合抗日。可能有这回事。从这种建议中也可以看出历史的逻辑，因为当时对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日本方面，需要联合抗击入侵者。这并不意味着力量合并。需要暂时把重心转移到反击敌人的入侵上。

当时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是王明。他现在还健在。我始终尊敬王同志。我认为，他正确地理解了中国革命进程，并是制定正确指示的人之一。毛以前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斯大林，同时也针对王明，他认为王明对中国形势作出了错误的理解，他在30年代初领导中国共产党时作出了错误的行动。从他的话中可以感觉到，他在为推翻王明寻找辩白的理由。

可是毛为什么一开始对斯大林去世后所形成的苏联领导那样客气，而后来发生180度大转弯呢？为什么开始他一直说，他是苏联共产党的朋友，而后放弃自己的说法呢？为什么我们谴责斯大林时，一开始他支持我们，而后过分地称赞斯大林呢？这种行为的基

础是狂妄自大。其表现还在苏联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我们就发现了。毛患有斯大林整个一生所患的病症。斯大林不承认任何人与他相当。他把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看作是他用来吃饭、坐着和睡觉所必需的家具。当他认为家具用得有些旧了的时候，他就心安理得地把它们换掉。现在毛也是这样做的。

斯大林去世后，最初他想用爱抚来收买我们，说了许多客气话，抓住苏共二十大决议，说我们英明，揭露了斯大林的滥用权力行为。而当他看到用爱抚收买不了我们，我们有坚定的观点，希望实行我们所理解的那种严格的马列主义政策时，当他确信用任何手段都不能对我们施加影响，使我们变成顺从他的人，以确立他的领导权，并通过我们党把他的这种权力推广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他丢下了以前的希望，开始寻找另一些方法来展示自己的天才和比周围人具有的优势。

这时他就想出了“大跃进”和公社。他想展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方法和毛派的领导风格，以便在最短期内解决列宁提出的任务：按人均产值超过资本主义世界并使社会主义世界变成不可战胜的。毛认为，中国能在几年内赶上英国，然后着手赶美国，顺便也要超过苏联人民取得的成就。他想以较少的费用和在最短的期限内达到这个目标。在搞“大跃进”和成立公社以前，中国非常迅速地积蓄了力量，对此我很钦佩。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这就是印度。中国同印度作比较是非常突出的。下面是有利的证据：在中国人民政权取得胜利之前，这两个国家几乎处在一个发展水平上，而且印度还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但后来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较快。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呀！

当中国进行“大跃进”时，毛决定通过“小冶金”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奇迹，要在多少年内超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当他把人民搞得一贫如洗，建立了公社，然后把公社发展成半军事化的居

民点时，中国经济就崩溃了，工农业生产开始下滑。这个时候需要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斯大林或毛泽东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吗？斯大林就是在农业实行集体化过程中犯了一些大的错误，违背了加入集体农庄的自愿原则，还发表了标题为《胜利冲昏头脑》的一封信。那是令人惊讶的背信弃义行为呀！可是我们承认了“胜利冲昏头脑”口号的正确性。而且它载入了史册。然而真正的没有胜利的胜利冲昏头脑能是什么样子呢？那不是胜利，而是失败！应当实事求是，调整工作。但斯大林未能这样做，而把罪过推到那些一开始青云直上，而后丢掉了脑袋的干部身上。毛发动“文化革命”时也采用了这种办法。这种革命实际上是反革命。我难以说明，中共对人民是如何作解释的，而具体表现是什么，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

毛消灭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毁坏一切，目的是使国家处于能够承认他是上帝（不是领袖而是上帝）的状态。他特别提醒我说，过去我们这里开会时一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大家都起立鼓掌，就像在教堂里提及上帝时在自己胸前画十字祈祷一样。而这些行动在我们这里只是像会议上作的某种体操：起立、鼓掌、坐下。毛做得更简单：他下令印他的语录，宣布它们为信条，逼迫所有人像白痴那样背诵这些语录。所以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背诵，人们都变得发呆了。这甚至从电视里的电影镜头中也可以看出。这种侮辱人的尊严的做法是不可思议的呀！我曾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强迫外科医生在做手术前读几遍毛的语录。难道在人类已踏上月球的20世纪能允许这样做吗？在我们的时代，需要相信这种咒语和赋予一个人超自然力吗？怎么能说手术做得成功是因为外科医生背诵了毛的语录和在手术开始之前看了语录里是怎么说的？

毛干出了前所未闻的事情，宣布以前当过演员的妻子为中国主要思想家和文化生活领导人。我不知道，那里给她罗列了哪些优点。作为演员，也许不错。对这种人往往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一些

人说，她是有才能的，而另一些人则说，她没有什么才能，只不过是毛喜欢她，她的优点仅此而已，荣誉是后来有的。而文化人士，即作曲家、作家、学者、教师等所有知识分子的真实状况，则是不断地受到前所未闻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侮辱。那里出现了大量的舞弊行为。但民众在忍受着。由中国青年组成的一些工作队，整顿学校“秩序”，用棍棒来维持对科学原理的讲授和评述，同时用同样方法来推行“文化革命”。

有一次我调无线电频道，偶然碰到中国的俄语广播。我听了一会儿，很讨厌，因为反复播讲同一内容：一个姑娘讲很蹩脚的俄语，然后是小伙子谩骂我们。我觉得他们的声音耳熟，可能是在中国时或毛来到我们这里时他们当翻译。我这样想是因为一调到中国，往往马上就会听出他们的声音。后来我不听了，因为我不愿意听到他们的声音。中国的广播像祷告那样单调地重复毛的语录和对毛的赞美。我还要说：遗憾的是，我们在斯大林时代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在党的会议和一般会议上，大家无休止地反复说：“斯大林、斯大林、亲爱的父亲！”我也不例外。我现在对这种做法尤为反感，我是毛派分子几乎按照同样方式重复这种做法的证明人。

我想谈谈我与之打过交道的另一些中国领导人。刘少奇：他这个人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同他进行过愉快的交谈。我同他谈话时感觉到我们有同样的思维方式，我们彼此之间虽然也是通过翻译交谈，但心息相通。我们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报告和对当时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任务的说明。刘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及理解同我们一样。但后来他开始反对我们，第一次发生在他同阿尔巴尼亚人谈话的时候。我认为他是迫不得已这样做的。实际生活证明，我的怀疑是正确的：要知道，刘本人也成了“文化革命”的牺牲品。现在他在那里是第一号受害者，尽管他是继毛之后的最有影响的人物，我认为也是最明智的领导人。

周恩来：我们把他置于刘少奇之后，居第二位。现在他采取了有害的立场，是毛所创造的血腥政策的某种支柱。但是过去我们同他会面的时候，周表现出是一个令人喜欢的交谈者，他懂经济问题，对政治问题头脑也很清楚。的确，我们同他基本上未谈过农业问题，但工业问题他一清二楚。

朱德：我认为，他已经不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而大致占有像我们这里以前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所占有的地位。我不知道，加里宁在列宁时期做了什么实际工作。但在斯大林时期他挂名签署所有命令，而实际上很少参加国务活动。有时让他参加某个委员会，但很少考虑他的意见。看到这种情况令人难过，甚至感到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很可怜。这是人民所说的贤明的人，是劳动人民的代表，很了解工农的需要。所以列宁推举他担任国家司法首脑角色。大致朱德在中国也是担任这种职位。我见到他同他谈话时，他给我留下了很善良的印象。我觉得朱德和加里宁在性格上也很相似。

陈毅：我对他了解很少。据说，他作为原集团军司令员在军事工作方面是有才干的，现在他的地位也有些提高。我不知道，实际上他占有什么地位，因为他遭到了疯狂的红卫兵和毛的其他禁军士兵的攻击。

邓小平：他给我留下了很强烈的印象，并不是因为他是中国领导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甚至毛也曾给他作出了很出色的评价，称他是未来的领袖，并说邓是他的战友中最杰出的，是主要的新兴力量。而当我们在苏联以及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同邓会面时（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就召开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必要性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邓在那个时候自然不得不采取错误的立场，他代表的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而是毛的观点。

康生：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好的方面。他是个斧头，是中国的马

留塔·斯库拉托夫。他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在毛那里起这种作用。

彭真：原北京市委领导人，工人出身，是个聪明人。我喜欢他，虽然我同他曾就召开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问题进行一次很大的争论。他当然也采取了毛的立场。但是我同他争论时，有时在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一种忧虑，发现他在沉思，他引起了我的同情。好像他本人需要同情，内心深处经受着什么痛苦。也许当时他的内在悲剧已经开始？其实他看到了毛正在把国家引向何处。但没有下决心采取什么行动，而是盲目地执行指令。然而他已经是个双重化的人。他的命运最后会如何？目前大家知道，他被免去了一切职务，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的话，他住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

彭德怀：我不止一次同他见过面。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人。实际上他就是这样的人。

下面我谈谈对中国发生的一些事件的起因和它们对其他国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的看法。我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经历过许多事情。就是现在在评价在我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时也在思考，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需要作出分析。这里就需要有政治经济学理论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来做工作。许多材料需要消化，需要全面地作出研究，不要怕对将来作出结论。这些结论本身真叫人想写在纸上。可能生活在我们时代的人还不会这样说，但我相信，新出生（或已经出生）的人，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分析过去的问题时，是会发表自己的看法的。希望如果不是我这一代，那么哪怕是现在正在长身体的下一代能完成这个工作也好。

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是个复杂的问题。这样的事态发展在我们这里还是在列宁去世之后，特别是在斯大林站住了脚，积

蓄了力量,感觉到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力量限制他,他可以开始镇压异己分子之后发生的。一开始他做这种事,像我们惯用的说法,是用党的方法,没有明显的镇压行为。但是现在就是这样的方法也应该以新的角度来加以分析。如果国家领导人的观点发生分歧怎么办?一般地说,他们的分歧可以达到怎样的限度?从原则上说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某个政党的领导班子中能不能有这种分歧,即不同的观点?能有,不仅能有,而且不可避免,因为没有绝对完全一样的东西。在世界上和自然界里没有重复的东西,一切都在产生、发展,都具有某种特性。而在大的政党中,在像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中,不可能预先预见到,哪些观点将是绝对正确的,而另一些观点将是错误的。若是认为能作出这种预见,那是愚蠢的。人的观点是在他的生活过程中,在他同其他人的交往中,在他参与新社会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谈论中国问题,我想作为例子引证我较熟悉的并与我较近的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共产党有幸第一个举起了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列宁非常成功地迈出了这一步,因为我们的革命一开始进行得几乎没有流血。不能按电影来判断十月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尽管这些电影是由杰出的电影导演制作的。我在银幕上看到如何冲击冬宫的时候笑了起来。其实根本没有冲击冬宫的行动。我生活在那个时候,看过当时的报纸。没有一家报纸对电影里所展示的冲击冬宫的情景作出过描述,因为临时政府早就失去了对社会的影响,自行消亡了。而保卫冬宫的卫队,刚一向它提出放下武器的要求,就立即投降了。著名的安东诺夫·奥夫先科只不过是众人陪同下走进冬宫,奉命逮捕临时政府。

从历史中可以得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如何拒绝举行起义。我现在为什么要谈这件事呢?我提及这件事只是为了说明列宁的工作方法。好像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出这种表示之后,

他们都不能回到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班子中来了。实际上不是这样，革命取得胜利后，列宁还吸收他们参加工作，他们都是政治局委员，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关键职位。甚至在一切事情发生之后，他们个人仍与列宁交往密切。若是列宁得出结论：他们两人没有用处了，犯了政治错误就不值得信任了，那么在苏维埃政府迁到莫斯科去时，他还会让季诺维也夫担任彼得格勒市领导人吗？而且当成立共产国际时，列宁还建议选举季诺维也夫任主席。

接下来讲加米涅夫。他后来担任作为政府首脑和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的列宁的副手。那时有两个最重要的党组织，即彼得格勒市党组织和莫斯科市党组织。就是这两个组织，以及与它们并列的一些国家机关也是由曾表现出在政治上不坚定的人领导的。但没有不相信他们。若是不相信，列宁能这样做吗？这里表现出他作为人的英明和他对人的特性的理解。的确，人们不能一下子就找到正确的观点和正确分析事态的发展，由此而产生了他们的摇摆。但是列宁相信他们诚实，忠实于革命事业，所以委以高位。

若是比方说，当时党的首领不是列宁，而是斯大林，那会是什么情况呢？会更早地开始进行镇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会是第一批被枪决，而不是后来他们在党的十四大上因采取特殊立场反对斯大林独裁时遭杀害。我现在不分析斯大林分子和季诺维也夫的拥护者在什么问题上有分歧。这里的问题不在分歧上，也不在分歧的程度上。可以有不同意见，因为只有傻瓜当中才不会有任何分歧。有头脑的人们，有创造性的人们，即使对于理论上的某个问题也总会有不同的态度，更不要说实践了。在实践中往往会有许多解决问题的途径。所以如果有什么人采取特殊立场，这决不意味着他就像斯大林有意设定的那样，是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敌人。

观点上的不一致，一般是能够发展到使人变成私敌的地步的。

但是一个人只有完全蜕化变质，他才会背叛他为之贡献了自己一生的事业。而我讲的人并没有蜕化变质。只不过是斯大林试图加强自己个人的权力，称他们是败类，葬送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拉狄克、瑟尔佐夫、罗米纳兹等这些杰出的人物。的确，他们个人都有缺点，有时甚至是很大的缺点，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背叛社会主义事业。有些耍聪明的人说，罗米纳兹是自己用枪自杀的。是的，是自杀。但是他已经明白，如果他不自杀，反正都是要被干掉的。难道在中国不是可以看到同样情况吗？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过程是以怎样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对中国人民的原领导人是流放、监禁，还是实行社会隔离。我也不知道，刘少奇和中共其他著名人物发生了什么情况。这里有很多可能性。斯大林也是采取了各种行动：逮捕、处决、流放、将诚实的人们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在过去的年代，专制制度往往喜欢搞公开处决。例如，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是这样做的。毛经常采用处决方法，与沙皇制度或宗教法庭采用的方法有些相似，给人戴上高帽，在胸前挂侮辱性牌子，把不幸的人拉到广场上，组织人嘲弄他们。能把人搞到如此野蛮的地步，这真可怕。要知道，在中国是学生、年轻人干这种事。我已不用说，为了达到毛提出的目的，粗暴地动用武装力量的做法了。所有这一切都是打着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旗帜进行的。骇人听闻，但是事实！为了人民消灭他的优秀代表，而且还郑重地说，他们这样做是在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专政思想，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斗争。人们为最高理想去死，去流放，去服苦役，但这种最高理想却被当作为野蛮的胡作非为作辩解的理由。

所有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呢？很遗憾，现在没有人深入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只是发表一些表面性材料敷衍一下。其实，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已经遇到了以前很难想象的一种现象，即无产阶级专

政变得不是去反对阶级敌人，而是反对工人阶级本身的优秀代表，反对那些参加革命斗争并在民众当中赢得声望的人们。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如果用庸夫俗子的态度去议论，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相信谁？而另一种情况更糟糕。这样的政策会使人类抛弃社会主义理想，这对于未来，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可能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斗士，在各个国家参加了这种斗争运动，他们要问：以后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实现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那些英雄们到哪里去了？现在你们的布尔什维克国家第一位军事指挥官克雷连科在哪里？他不存在了！而列宁责成逮捕临时政府的那个安东诺夫·奥夫先科在哪里？他怎么结束了自己的生活道路？而同他一起的许多其他人，即使在建立苏维埃国家过程中起了不大的作用，后来也担任了重要职位。就说彼得斯吧，在个人方面是无可指摘的布尔什维克。但他也作为“人民的敌人”牺牲了。回忆那个时代时，像丘巴尔、波斯特舍夫、科肖尔这些名字我常常是脱口而出的。这些人也作为背叛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虽然他们赢得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可以看出一种可悲的规律性：由无产阶级专政几乎在各地产生了党的专政，而由党的专政又产生了个人对劳动者阶级，对赢得胜利的党，以至对自己战友的专政。我认为，那些承认毛的权威绝对不容争辩的人，也会遭到现在毛的许多战友所遭到的同样命运。历史会向施暴者报复。斯大林从敌人策划暗杀基洛夫的事件时起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他宣布基洛夫被杀害是党的悲剧。党自然经受了这场悲剧，人民的敌人杀害了基洛夫。现在每个人都很清楚：为了在普遍恐怖的形势下创造斯大林权威不容争辩的条件和搞掉那些同列宁一起走过了伟大的斗争道路并可能影响斯大林成为唯一领袖的人，需要基洛夫之死。我未看出，这与中国发生的情况有什么重要的区别。

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集中统一的、守纪律的、由统一的热情联合起来的共产党，是为谁，为什么服务的？这样的党可以成为根据社会主义的原理改造社会生活的工具，但是它的组织体制也会使某一个人得以利用它来滥用权力。我觉得，若是列宁还活着的话，他会提出建议排除这种可能性。但这只是猜想。今天我们自己必须这样做。否则就会是抽彩：是耐心听取其他集体成员的意见的忠于职守的人当领袖，还是斯大林这样的人当领袖？列宁来得及建议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党的机关内部出现的争论问题，要在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解决。然而在列宁之后这些机构失去了原来的意义。选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都按斯大林的指示去做，看斯大林的眼色行事，并按斯大林的心意去理解事件。这样的情况目前在中国也出现了，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就是说，这些措施是不够的。需要有下面对领袖的更有效的监督，也就是真正的民主。

我想起已故哲学家尤金。有人对我说，我退休后，尤金在某个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对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为什么恶化和为什么发展到如此糟糕的地步，他谈了个人看法。他说，这是赫鲁晓夫个人的过错。赫鲁晓夫不尊重毛泽东，因此造成了这种关系。尤金作为哲学家在我们这里居主导地位，并长时间在中央主管一个部的工作，现在公开流传着他的这种可耻的说明。其实应该把问题看得更深入一步，而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仅仅一个人的意志和行为。当然，在历史上首领个人起很大的作用。这一点我们都清楚。例如，斯大林个人就起了极为有害的作用。但在所说的场合，如果讲个人的话，那最好尤金也客观地谈谈他自己。他恰恰是给我们传来中国发生了可悲的转变的这个信息的第一只燕子。当时还根本没有发生后来苏联领导人同毛所发生的那些争执。尤金的报告对我们来说犹如在晴天里响起一声霹雳。

主要问题在于，毛泽东妄想得到世界领导权。他本人曾找借口同我们作斗争，并且他也这样做了。因此问题不在赫鲁晓夫身上。没有赫鲁晓夫，我们还会有伊万诺夫、彼得罗夫、西多罗夫，这没有任何意义。毛反正都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就又出现了那个问题：如何使中国人民摆脱领袖滥用权力的行为？难道在我们这里就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吗？若是这样，将来等待苏联的是什么呢？

我就以提出这些看法来结束我对中国的回忆。

中共党史重要著作、论文目录索引

(1998年)

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馆

著 作 部 分

建 国 前

- 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赵喜文/改革出版社/1998.1
- 晋察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1945—1949年/中央档案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3
- 中共温州独立支部与国民革命运动/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3
- 中国革命概论/贺伯清/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8
- 平型关战役/《历史不能忘记》编委会/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8
- 血铸赤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纪事/凌步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9
- 宁都起义/曾庆圭/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10
- 中共山东地方史(第一卷)/陈建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10
- 抗战纪事/傅泽铭/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11
- 广西新四军人物(第一集)/广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11

百万雄师过大江：记渡江战役/鹿彦华/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

12

黄土高原三战三捷：记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战役/吴学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 12

建 国 后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马立诚、凌志军/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3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朱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5

中国改革开放史/朵生春/红旗出版社/1998. 7

让思想冲破牢笼——“真理标准讨论”与新的思想解放/庞元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7

直言：李锐 60 年的忧与思/李锐/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9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萧克、李锐、龚育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9

改革开放 20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学习出版社/1998. 9

经济特区风云录/林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9

巨变 20 年：改革开放在广东/胡中梅/广州出版社/1998. 9

伟大的历程 辉煌的成就：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李改/长征出版社/1998. 9

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 70 年/刘志青/黄河出版社/1998. 9

在旋涡的边缘/龚育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10

20 年重大决策备忘录/龙平平/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10

大旗帜：邓小平理论 20 年(上、下卷)/舒以/改革出版社/1998.

- 宁夏改革开放 20 年/王正伟/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 10
- 浙江改革开放 20 年/章健/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0
-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于光远/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1
- 改革开放大事记(从邓小平到江泽民:改革开放风云录)/黄修荣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 11
- 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朱佳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2
- 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决策的形成和发展/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8. 12
- 1976—1981 年的中国/程中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2
- 改变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重大决策/谢春涛/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8. 12
- 邓小平时代/杨继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2
- 奋进的 20 年/王永生/青岛出版社/1998. 12
- 改革开放 20 年的理论与实践:黑龙江卷/汝信/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1998. 12
- 红墙内的警卫生涯/张随枝/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2

人物著作、传记、研究

- 马文瑞文选(第 1、2 卷)/马文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2
- 郭洪涛文集/郭洪涛/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3
- 胡绳全书(1—6 卷)/胡绳/人民出版社/1998. 4
-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邓力群文集(1—3 卷)/邓力群/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12
- 晚年毛泽东/陈明显/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2

- 毛泽东与陈毅/袁德金/北京出版社/1998. 2
- 毛泽东与红军:从井冈山到古田/黄少群/新华出版社/1998. 9
- 毛泽东与刘少奇/唐振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10
- 毛泽东与南阳/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10
- 我做毛泽东卫士 13 年/李家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1
- 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献给亲爱的父亲毛泽东诞辰 105 周年/毛
岸青/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1
- 毛泽东的爱国情怀/张鹏/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2
- 回忆邓小平/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
- 邓小平理论宝库/邢贲思/中国言实出版社/1998. 2
-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建设/杨超/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 10
-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
社/1998. 11
- 邓小平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11
- 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外交部档案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 刘少奇传/金冲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9
- 刘少奇冤案始末/黄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9
- 走近刘少奇/张文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9
- 刘少奇风云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9
- 历史巨人刘少奇:从工人领袖到国家主席/何光国/海天出版社/
1998. 9
- 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邓力群/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10
- 刘少奇在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10

刘少奇/逢先知/新华出版社/1998. 10

刘少奇和国际友人/国际友谊博物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1

周恩来世纪行/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1

周恩来诗联集笺注/周秉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1

周恩来家世/李海文/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2

周恩来南开校中作文/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央
文献出版社/1998. 2

周恩来旅日日记(影印本)/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革命博物馆/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

周恩来早期文集(1912. 10—1924. 6)(上下卷)/中央文献研究室
南开大学/中央文献出版社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2

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2

百年恩来/邓在军、周尔均/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2

一代伟人周恩来/侯树栋、李海文、白石亮/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 2

缅怀周恩来诗词选: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中共云南省委组
织部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

百人访谈周恩来/周尔均、周秉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2

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回忆/李琦/中央文献
出版社/1998. 2

周恩来与北京/北京市政协史料委员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

周恩来和党外朋友们/赵长盛/团结出版社/1998. 2

周恩来在江西/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2

人民中的中流砥柱: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吴庆彤/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3

周恩来之路/李海文/北京出版社/1998. 5

世纪伟人周恩来: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暨周恩来在潮汕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陈汉初主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 10

周恩来经历记述/曹应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10

任弼时/蔡庆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2

陈独秀传/贾兴权/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10

张太雷/伊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5

赵世炎传/姚仁隽/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3

张国华将军在西藏/赵慎应/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 10

康世恩传/《康世恩传》编写组/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10

一位老外交家的足迹:我所知道的王炳南/程远行/人民出版社/
1998. 12

廖承志传/铁竹伟/人民出版社/1998. 10

开国上将刘亚楼/钟兆云/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9

历史风云中的一代英杰:伍修权/承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10

我的履历书/孙平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6

续范亭传/穆欣/华夏出版社/1998. 8

陈丕显在苏南/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8

白崇禧身边的中共秘密党员/姚蓝/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11

共和国第一号烈士段德昌传/郑远志/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 11

吴晗传/苏双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1

瞿秋白/张琳璋/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

我的选择:63位中共高级干部自述/萧心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7

综 合

辉煌20年: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大事总览/王珏/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2

中共党史专题新探/杨家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7

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名录/沈学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9

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11

中共连云港地方史(第一卷:1919—1949)/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11

中国共产党镇海历史大事记/中共镇海区委党史研究室/1998.12

广东党史资料(第31辑)/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12

中共党史资料(65)(66)(67)(68)/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3、6、9、12

论 文 部 分

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关于五四新文化价值结构的特点/段培君/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民主观新探/朱志敏/北京党史研究/

1998年第1期

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与陈铨亚先生商榷/唐宝林/光明日报/1998年4月3日

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陆祥泉/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5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转变道路与近现代民粹主义思潮/王素莉/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

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引进阶段/张静如 齐卫平/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

试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由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原因/林志友/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五四运动爆发原因补遗/吴玉才/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2期

北京大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梁柱/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北京大学/萧超然/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

“个性的自由与共性的互助”：“南陈北李”建党前夕的思想轨迹/张宝明/河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关于党的一大开幕日期问题的商榷/任武雄/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4期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党内合作”方式再评价/莫志斌 钟莹峰/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5期

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郭荣华 贺瑞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

对“党内合作”方式的质疑/韩广富/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

大革命时期中共北方区委的主要活动/赵秀德 江丽/历史档案
/1998年第2期

关于中共北京党组织早期革命活动的几点新见/萧牲/北京党史
研究/1998年第5期

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运动述论/萧牲/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
3期

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工人罢工: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沈海波
/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6期

中山舰事件后中共的斗争为何未能坚持下去/叶昌友/安徽史学
/1998年第1期

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军的北伐(上)/李玉
贞译/党的文献/1998年第1期

北伐战争胜利原因初探/李晓红/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8年第1期

对大革命时期革命领导权问题的再认识/赵军祥/河南师范大学
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

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大革命的失败/明月/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
年第2期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南昌起义军应选择闽西作为战略发展方向/王铁军/郑州大学学
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

井冈山斗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简论/李大荣/江西社会科学/
1998年第1期

评中央苏区“扩红”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王玉福 高学栋/河南
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

中央苏区文化新透视/王予霞/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6期

- 中央苏区民众政治思想态势浅探/郑志发/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1998年第2期
- 革命根据地学校历史课程设置与改革述论/陈辉/四川师范大学
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3期
- 中央苏区婚姻制度改革与妇女解放/吴小卫 杨双双/南昌大学
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 《红星报》及其历史评价/郝先中/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3
期
- 红四军在鄂豫皖根据地为何失败/商慧明/探索与争鸣/1998年
第3期
- 析长征前期的“三人团”/刘中刚/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 遵义会议和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初步形成/张克敏/沈阳
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
- 长征中红二十五军为什么未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刘思祥/安徽史
学/1998年第1期
- 西路军的形成和西进是中央同张国焘斗争的一种妥协/周忠瑜/
甘肃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 论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及其实践/杨军昌/
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3期
- 红军长征时期的抗战工作及其影响/魏晓东/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1998年第8期
- 简论中共满洲省委解决中东路事件的策略及经验/安振泰/辽宁
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
- 中东路事件中的两国四方/崔萍/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 中共白区工作的转变与张闻天的领导作用/徐波/南昌大学学报
(哲社版)/1998年第1期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秘密交通线的建立及作用/文道贵/党史

- 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4期
- 30年代中期中共“打通苏联”战略方针的演变/王志刚/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 一二九运动中党的领导问题/孙敬文/党的文献/1998年第6期
- 力行社与西安事变/徐有威/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 国外和台港关于西安事变研究的特点和趋势/张注洪/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 抗战前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解体的必然性/沈社荣/宁夏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 抗战前夕的国共关系/刘宁元/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抗日战争时期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共同纲领质疑/方小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4期
- 抗战初期中共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论析/王安平/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
- 我党与东北救亡运动/王连捷 王铁军/光明日报/1998年9月27日
- 抗战时期的东江纵队及其历史作用/金建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 山东沦陷区研究/吕伟俊 宋振春/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第三种力量/闻黎明/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
- 抗战时期的国共宣传战/王晓岚/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1—2期
-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湖南的军事合作/龚赛红/北京科技大学学

- 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2期
- 关于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问题:也谈《项英传》/李良志/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 对皖南事变的另一种反应——《大公报》、《申报》有关报道评析/石建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
- 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考/童志强/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
- 试探1941年豫皖苏根据地反顽失利原因/张卫东/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6期
-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党建工作/周语玲/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
-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的历史考察/马若义/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
- 抗战时期中共在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新发展/薛德枢/安徽史学/1998年第1期
- 1944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徐江虹/广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 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杨奎松/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聿玉/中国青年报/1998年2月7日
- 延安时期理论繁荣的历史思考/冯建辉/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
- 延安抗日民主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回顾/艾义中/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年第4期
- 简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理论的认识和发展/张晓辉/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廉政建设的经验及其启示/王景花/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5期

论中共对抗口民主根据地工会问题的认识与实践/戴文宪/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6期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阳春喜/湖湘论坛/1998年第3期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共对美国统战的几个问题/邓泽宏/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

试论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时荣国/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东北停战与国共战略的调整/汪朝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2期

忆: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彭友今/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年第2期

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与新民主主义土地关系的建立/刘洁衣保中/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

论东北解放区的农业政策/魏芙蓉 刘洁/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

斯大林与毛泽东1949年1月往来电文评析/王真/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特点/雷云峰/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年第4期

析中共中央选择西柏坡作总指挥所之原因/宋文海 王俊华/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四平保卫战是解放战争时期时局发展的枢纽/刘喜发/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解放战争中东北首先解放原因探析/李百齐/山东师大学报(社

科版)/1998年第3期
我党瓦解敌军策略与国民党军队起义/张淑香/辽宁大学学报/
1998年第3期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曹希岭/党史研究与教
学/1998年第1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沈志华 谢·冈
察洛夫/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
解放初期福建镇压反革命运动述评/高绵/党史研究与教学/
1998年第1期
建国初期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禁烟禁毒斗争/庆格勒图/内蒙古大
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
建国初期福建省禁毒运动若干措施浅析/林辉/党史研究与教学
/1998年第4期
土改后的中国农村和党的互助合作政策/范守信/党史研究与教
学/1998年第1期
试析中国出兵朝鲜的主要原因/马英民/河北大学学报(哲社
版)/1998年第1期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兼谈如何看待和运用俄罗斯已
解密的朝鲜战争档案问题/齐德学/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
1期
关于50年代我国从苏联进口技术和成套设备的回顾/宿世芳/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
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及援华方案的签约/康·伊·戈瓦尔著
王水明译/纵横/1998年第7期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贸易活动及成就/王红续/当代中

- 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
- 遏制与反遏制:日内瓦会议上印支问题的和平解决回顾/陶文钊
/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 50年代初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心理变迁及原因/刘晓清/
浙江学刊/1998年第5期
- 武训、电影《武训传》及建国初期开展的批判/王善中/党的文献/
1998年第1期
- 建国初期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和经验/郭凌/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1998年第1期
- 论建国初期的工农教育/方海兴/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2
期
- 50年代我军的精简整编与军队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刘随清/国
防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 50年代前期围绕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党内争论及其影响/李曙新
/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5期
- 对指导50年代农业集体化一个理论的反思/苏少之 张继久/
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
- 全行业合营中清产核资、定息、人事安排和改革改组述评/范守
信/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 对过渡时期我国党政关系演变的历史考察/白贵一/河南大学学
报(社科版)/1998年第5期
- “一五”时期山西经济建设述评/牛崇辉/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5期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时期

- 八大前后关于改进体制的探索/田居俭/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
第2期

- 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思想/杨绍安/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 八大对防“左”的认识/张晓峰/党的文献/1998年第3期
- 对有关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某些问题的历史反思/杨凤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 浅议50年代中期党对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姚洪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
- 对1957年两条道路“大辩论”的历史考察/高化民 刘军/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 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曾红路/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
- 湖北当阳跑马公社的“共产主义”考/冯有林 魏鹄立/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
- “大跃进”运动对中国现代化的两重性影响/陈卫华/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1期
- 论1961年的大兴调查之风/侯德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2期
- 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邓力群/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
- 60年代初精减职工工作的经验与启示/聂福如/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 60年代中期中共转变经济建设的方针的原由/王培/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
- 1956—196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其演变/杨凤城/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5期
- 曲折和复苏——从“反右派”运动到调整时期的“双百”方针/夏杏珍/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李捷/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

关于苏中冲突起因的若干思考/[俄]列·别·杰留辛著 陈夕译/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走向破裂(1960—1963)——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杨奎松/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江西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末/曹力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

60年代长乐与连江的“四清”运动/成波平/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2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

关于“红卫兵”组织兴起过程中几则史实的补证/柳建辉/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的”历史公案/郑澆/中国青年研究/1998年第1期

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唐少杰/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我所了解的陈毅追悼会始末/刘岩/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文革”中整党建党运动述析/柳建辉/党的文献/1998年第3期
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实施/赵月琴 王晓峰 姚甲科/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市经济工作的反思/郭晓燕/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生产波动及其动因探析/郑有贵/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

1966至1978年发展农业三种思路的变动轨迹/张神根/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走向和解的中美关系与“文化大革命”/刘勇/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

“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金春明/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日本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与日本的“文化大革命”/古厩忠夫著 韩凤琴编译/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

从新中国建设史角度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柳建辉/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5期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思想解放和新时期二十年/龚育之/光明日报/1998年5月15日

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历程/石仲泉/解放军报/1998年5月21日

真理标准讨论与中共党史研究/陈述/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8年第2期

最初的突破——1977、1978年经济理论大讨论述评/韩纲/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主题报告”的形成过程/程中原/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6期

共和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拨乱反正/陈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日本学者评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韩凤琴编译/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及其意义/舒文 郑

- 端君 王宜放/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历史的转折/唐培吉/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6期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的原因/李斌/宁夏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的特点及其意义/张寿春/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 指导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历史文献——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制订经过/黄道霞/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 邓小平与中国改革起点的合理选择/关海庭 吴群芳/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 为什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率先进行并首获成功/郑有贵/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 浅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巩玉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5期
-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两代领导核心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路线的坚持和发展/梁志祥/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索/杨火林/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 中共十五大与党史学科发展/张静如/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综 合

- 略论国共两党谈判的历史经验/范小方 毛磊/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 1949年前后中国现代化比较/吴贤辉/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6期

苏共与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确立/刘建平/历史研究
/1998年第1期

试论建国后我党关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认识上的两次飞跃/饶
定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1期

建国以后三十年我国坚持集体主义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龙静
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1期

论两次历史性飞跃之间的逻辑联系及其时代意义/商孝才/华东
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农业合作化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比较研究/董悦华/当
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中国与苏联改革的比较/高放/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社会主义观念的更新/林蕴晖/中共
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对中国农村改革的回顾/杜润生/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毛泽东思想”称谓演变的历史过程/黎军 郑文成/兰州大学学
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

三次巨变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由来/龚育之/人民日报/1998年
2月19日

人物研究

毛泽东与湖南驱张运动/王光远/北京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科
版)/1998年第4期

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的地方自治思想/郑永福 吕美颐/中
州学刊/1998年第6期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领导地位确立和巩固的过程考察/曾景
忠/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

毛泽东指导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思想转折/宋金寿/

- 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
- 论建国以后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历史演变/王玉祥/党的文献/
1998年第3期
- 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期毛泽东关于我国工业化的战略构想
/熊启珍/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
- 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再探讨/徐民华/中共中央党校
学报/1998年第4期
- 论50年代中期毛泽东关于和平共处的国际战略思想/刘德喜/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8年第4期
- 50年代中后期李达与毛泽东的思想分歧/李小萍 李曾/华中
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3期
- 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时间考/陈标/党史研究与教学/
1998年第2期
-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1971年的南巡活动/魏久明整理/中共党史
研究/1998年第1期
- 毛泽东“文革”后期“解放”和任用老干部情况简析/唐洲雁/党的
文献/1998年第2期
- 在周恩来身边当警卫员:回忆周恩来同志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梁
勇智/解放军报/1998年1月5日
- 摄影师眼中的周恩来/陈杨男/文汇报/1998年1月5日
- 相识相知五十年:我所了解的恩来同志/杨尚昆/人民日报/1998
年2月7日
- 在周总理身边的日子/成元功/解放军报/1998年2月27日
- 回忆周恩来/伊·爱泼斯坦著 沈苏儒译/光明日报/1998年3
月1日
-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吴阶平/党的文献/1998年第2
期

特殊的使命:忆 1964 年周总理访问缅甸/程瑞声/外交学院学报
/1998 年第 1 期

周恩来在四年调整时期的重大贡献/吴冷西/党的文献/1998 年
第 2 期

两代情:记周恩来对我家两代人的亲切关怀/阎明复/党的文献/
1998 年第 2 期

教导勉励,永记在心:忆周恩来指导我做情报工作/沈安娜/党的
文献/1998 年第 1 期

西花厅往事忆念/李琦/党的文献/1998 年第 1 期

周恩来与梁启超/张志强/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

论青年周恩来的社会主义观及其形成特点/王永祥/南开学报/
1998 年第 4 期

周恩来的婚恋观初探(上、下):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费虹寰/中国青年报/1998 年 3 月 5、12 日

周恩来与冯玉祥的一次合作/于志恭/人民日报/1998 年 2 月 27
日

周恩来是我军政治工作杰出的奠基人/房忠贤 刘星星/国防大
学学报/1998 年第 2—3 期

周恩来与国民革命/黄振位/广东社会科学/1998 年第 1 期

周恩来对开创人民战争的重大贡献/刘焱/南开学报/1998 年第
2 期

周恩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卓越贡献/陆美珍/北京党史研究
/1998 年第 2 期

周恩来对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的重要作用/李海文/苏州大学学
报(哲社版)/1998 年第 1 期

30 年代初的周恩来与共产国际/郑德荣/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
年第 3 期

- 周恩来与共产国际/姚金果/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 周恩来与幽禁中的张学良/毕万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 周恩来与中央特科/苏智良 白华山/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
- 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试谈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对我党情报保卫工作的贡献/薛钰/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 周恩来与广东抗战/陈弘君 官丽珍/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 周恩来与西安事变/潘利红/学术研究/1998年第2期
- 周恩来与华南抗战/陈弘君 官丽珍/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
- 周恩来与新四军/京学伟/解放军报/1998年2月23日
- 从新四军的几个主要历史关节看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的统战实践/童志强/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1期
- 论抗战时期周恩来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历史地位/高正礼 白建民/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 周恩来对中原突围的历史贡献: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于丽/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
- 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在军事战线上的贡献/周一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 对周恩来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思想的思考/张学福/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 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贡献: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盖军/光明日报/1998年2月27日
- 周恩来与西藏的和平解放/降边嘉措/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 周恩来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庞松/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1期
-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曹应旺/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1期
- 苏共二十大以后周恩来对社会主义的思考/林蕴辉/中共党史研
究/1998年第3期
- 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国民经济/安建设/当代中国史研
究/1998年第1期
-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经济指导思想/巩玉闽/党史研究与教学
/1998年第2期
- 周恩来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刘文杰/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8年第5期
- 最后的使命——周恩来披肝沥胆四届人大/安建设/中共党史研
究/1998年第4期
-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家品格/董俊山/中共党史研究
/1998年第1期
- 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陈扬勇/党的文献/1998
年第3期
- 周恩来与西藏/周敏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
2期
- 周恩来与香港/龚加成/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
- 周恩来在处理1958年“台海危机”中的杰出贡献/余科杰/北京
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
- 反对侵略,捍卫主权:周恩来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的斗争/余科
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 周恩来争取156项大型建设项目所开展的对苏外交/米镇波/南
开学报/1998年第2期

- 周恩来与中苏关系/周尚文 王鹏/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 从中日关系正常化看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的历史性转折/刘建平/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 周恩来对建立和推动中日贸易关系的重要贡献/陈立旭/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 周恩来开拓中日友好事业的宝贵启示/孙大力/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
- 周恩来与中美关系/刘士田 谢士法/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4期
- 试论周恩来全方位外交思想及其实践/李才义/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3期
- 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队伍的形成/骆亦粟/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 周恩来与中国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章百家/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 周恩来对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贡献/刘正英/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
- 周恩来关心林县地方病防治、红旗渠建设和干部的成长/杨增和 郝建生/党的文献/1998年第1期
- 周恩来与新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曾自/党的文献/1998年第1期
- 论周恩来对国防现代化的理论贡献/王元俊/解放军报/1998年2月16日
- 情系国防,心系长城:周恩来对新中国国防现代化事业的重大贡献/王幸生 徐占权/人民日报/1998年3月4日
- 周恩来和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龚育之/中共党史研究/

1998年第2期

周恩来精神风范对中共隐蔽战线的作用及影响/薛钰/党的文献
/1998年第4期

论“周恩来精神”：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石仲泉/文汇报/
1998年3月2日

周恩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又一历史伟人/石仲泉/中共党
史研究/1998年第2期

战争年代中的邓小平/秦基伟/党的文献/1998年第1期

回忆我亲身经历中的小平同志/段君毅/党的文献/1998年第2
期

坦诚教诲，终生难忘：回忆小平同志对西藏工作和我的关怀/阿
沛·阿旺晋美/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

正义战胜邪恶：论围绕邓小平同志出国的一场斗争/刘华秋/光
明日报/1998年2月19日

坚持平等，捍卫独立：记邓小平同志七赴莫斯科/边志海/当代世
界/1998年第3期

论邓小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日]天儿慧著 程慎元译/
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邓小平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杜世伟/理论前沿/1998年第9
期

邓小平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陈志勇/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1998年第6期

邓小平关于制度与体制划分思想的形成及其重要意义/汪青松/
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忆少奇在“文革”的日子里/王光美/瞭望/1998年第41期

刘少奇在中央苏区/黄少群/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8年第4期

刘少奇是怎样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兼论中共第

- 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王双梅/党的文献/1998年第5期
- 刘少奇与华北抗战局面的开创/沙友林/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 刘少奇对发展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卓越贡献/段星/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5期
- 1942年刘少奇的山东之行/申春生/抗日游击战争研究/1998年第4期
- 刘少奇对完善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贡献/沙友林/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 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之缘/石仲泉/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 论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委时期的历史功绩/阎书钦/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 刘少奇与马列学院/王渔/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8年第4期
- 解放战争时期刘少奇关于民族工商业的理论与实践/王亚春/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 对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考证与分析/范守信 许广亮/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8年第4期
- 高饶事件中的刘少奇/《刘少奇传》编写组/党的文献/1998年第5期
- 试论三大改造以后刘少奇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探索/黄金平/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6期
- 略谈60年代初期坚持实事求是的刘少奇/唐根华/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 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蹲点调查的四十四天/唐振南/党的文献/1998年第6期
- 刘少奇1961年东北林区纪行/王春明/党的文献/1998年第5期

期

刘少奇试办托拉斯的思想及其启示/叶耀培 江世银/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6期

我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次尝试:刘少奇与60年代初试办托拉斯的理论与实践/唐根华/党的文献/1998年第5期

刘少奇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两次独立探索/储成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8年第11期

建国后刘少奇对国有工业企业领导制度建设的初步探索/梅丽红/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

政治改革思想的先驱——刘少奇/刘建平 姚力文/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刘少奇与党的旗帜问题/黄—兵/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刘少奇干部队伍建设思想研究/李颖/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刘少奇面对骤然降临的“文革”灾难/朱元石/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

1926:国民革命中的陈独秀/何文辉/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5期

陈独秀科学观述评/孙超/安徽史学/1998年第2期

陈独秀经济思想之轮廓/方小教/安徽史学/1998年第1期

陈独秀抗战主张述评/史远香/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

陈独秀的五次被捕及营救:兼论陈独秀的功过/徐承伦/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

近十年有关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研究/代文新/安徽史学/1998年第1期

关于李大钊致胡适—封信的日期及其意义/陶季邑/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与北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沙健孙/北京
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
- 李大钊哲学思想若干特点的启示/张翼星/北京大学学报/1998
年第2期
- 李大钊与唯物史观的传播/黄职/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4期
- 李达思想论析/李立志/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 李汉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田子渝/党史研究与教学/
1998年第4期
- 蔡和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杰出贡献/李曙新/湖湘论坛/1998
年第1期
- 邓中夏关于收回香港的主张/萧栋梁/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
3期
- 张太雷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贡献/丁则勤/光明日报/1998年
6月14日
- 赵世炎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徐胜萍/东北师大学报(哲社
版)/1998年第2期
- 方志敏被捕前后的一些情况/金午江/党的文献/1998年第3期
- 试析瞿秋白的国情观——读《瞿秋白论文集》/王关兴/苏州大学
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 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吴汉全/河南师范大学
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
- 论张闻天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期间的合作/丁鲁省 沈贵荣
孙永志/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
- 潘汉年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王秦/人民日报/1998年9月1
日
- 也谈刘晓何时到上海任地下党负责人/钱听涛/中共党史研究/
1998年第5期

关于项英“南进”、“南调”、“向北发展”问题的重新评价/房列曙/
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

一个真正的人——深切怀念彭德怀同志/张爱萍/人民日报/
1998年10月24日

彭德怀与中国军事科学/陈宇/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6期
为彭德怀“运动游击战”问题历史公案一辩/田玄/中共党史研究
/1998年第6期

邓子恢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与实践/王正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1998年第2期

聂荣臻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的贡献/曾敏/毛泽东
思想研究/1998年第3期

李维汉与王实味冤案的平反/高曙东/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1998年第11期

论陈毅对新四军正规化建设的贡献/张燕华/抗日战争研究/
1998年第3期

陈毅与“发展华中”战略的实现/罗克祥/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
1998年第2期

陈云在“大跃进”中为减轻国民经济损失所做的努力/蒋永青/党
的文献/1998年第3期

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关于陈云两个乡调查材料的说明/刘家栋
/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

新时期对外开放方针的先声——对陈云对外经济工作思想再思
考/迟爱萍/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

陈云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贡献与启示/石文静/党史研究与教学
/1998年第6期

陈云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的拨乱反正工作/迟爱萍/当代中
国史研究/1998年第6期

- 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确立过程中的历史贡献/朱佳木/求是/1998年第23期
- 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阎明复/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 乌兰夫对解决民族问题的探索和贡献/兰芳/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 胡耀邦同志对爱国统一战线的贡献: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王桂玲/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8年第12期
- 胡乔木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朱佳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 关于胡乔木主持讨论《中共党史教学大纲》的回忆/戴鹿鸣/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